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5061/5600.1

⁹³
JAN '7 1959

中國語文

Zhōngguó Yǔwén

11

1958

总第77期

1958年11月号(总第77期)目录

- 对王力《中国语言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一文的
再批判 朱 星 (501)
- 应该对高本汉的汉语学说重新评价 周 斌 武 (503)
- 批判我在语言学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王 力 (506)
- 民族和民族语的关系问题 徐 荣 强 (511)
- 汉语普通话的音节结构 [苏] A. A. 龙果夫, E. H. 龙果娃 (513)
- 收集和整理汉语方言词彙 詹 伯 慧 (526)
- 大跃进中汉语词彙的新发展 黎运汉、程达明 (531)
- “和、跟、同、与”的用法和分工 贾 崇 柏 (533)
- “和、跟、同、与”有必要分工 蒋 蔭 枬 (535)
- 程度副词修饰动词能不受限制吗? 李春林、余立人 (536)
- 书刊评介
- 略论语言学史的几个问题 黄 心 平 (537)
- 评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 筱 文 (541)
- 评朱星《语言学概论》 赵 振 鐸 (543)
- 语文短评 (522)
- 语言学名词解释(二) 北京大学语言学教研室 (546)
- 语文笔记
- 对“目的”和“为了”一文的意见 毛 西 旁 (532)
- 扬州话里有“讨喜” 刘 垠 伦 (535)
- 动态
- 北京师范大学语言学教研组订出科学研究规划 史 錫 堯 (505)
- 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出《毛主席论语言问题》 彭 維 金 (530)
- 厦门大学中文系师生为工地服务 王 尔 康 (550)

本社迁移启事

本社已由北京西郊中关村迁移至北京西城端王府夹道七号。以后各方来件及投稿,请寄新址。

中国语文杂志社

对王力《中国語言学的現况及其存在的問題》 一文の再批判

朱 星

《中国語言学的現况及其存在的問題》这篇文章(見《中国語文》1957年3月号)本是王力先生1957年1月6日在天津市語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講稿。我当时也在場听講,听完了心里就觉得有問題。这篇文章跟那天报告的内容基本上相同,只是有一些被刪去了。我还記得他报告时說过:“現在一般写学习普通話小册子的算不得科学研究……”当时听講的除会員外,还有許多中学語文教师,以及三个大学的中文系三四年級同学。河北师院中文系三四年級学生正在进行河北省方言調查,編写学話手册,本来是結合他們的科学研究小組的工作搞的,学院方面也批准这是他們的科学研究工作;但是他們听了王先生的报告后,就对这一工作改变了看法,因而工作受了一定影响。同时使大家感到科学研究工作太难,不免增加了大家对科学研究的害怕心情。还有一些搞語法的同志表示很不滿。所以总的說来,这次报告的影响是相当坏的。

現在王晶湖、郭松泉二位同志已写了文章加以批判(見《中国語文》1958年9月号),这是完全必要的。我完全同意他們二位对王力先生的批評。这里再提出我一些批評意見,作为王晶湖、郭松泉二位同志的补充發言。

一 現在中国語言学是否落后的問題

王力先生一开头就說:“中国語文学的成績是輝煌的,至于語言学則还处于幼年时代。”王先生承認中国过去对語言研究有輝煌的成績,但只称它是語文学(是否譯自 philology? 或譯为文献学),够不上語言学(linguistics),够不上科学。他認為欧洲的語言学在十九世紀初才形成,所以中国以前也不見得有語言学;尽管有楊雄的《方言》、許慎的《說文解字》、陆法言的《切韻》、宋元人的等韻,有十七世紀以后顧炎武等人的古音学,等等,也硬說不是科学研究著作。其实,科学并非神秘之物,凡研究客觀事物,能找出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經得起檢驗的學問就是科学。过去洋人瞧不起中国,硬說我国的医学、数学不科学。对于語言学,在十九世紀前他們还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因此更不肯承認我們过去有語言学。国内一些語言学者重外輕中,也隨声附和,实在叫人痛心。不过,这个問題我們暂时可不計較,称它为語言学,也只是一种封建时代的語言

学,它和資本主义国家的語言学都是旧的科学,落伍的科学。新的語言学当然是具有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观点、方法的語言学。

王力先生这些話的問題在于:他認為現在我国的語言学是从外国資本主义国家那里学来的,我国自己本来沒有。这样一說,我国的語言学就成为落后的了。他造出了一个脫节論,生生地把我国語言学的历史斬断了;虽然他也說,大家“對我們祖先的优良傳統又不願意繼承”。到底是誰不願意繼承?王力先生這話的意思,无非要得出这样一个結論,就是若要挽救我国語言学的落后危机,只有死心塌地向資本主义国家學習,走資產階級道路。王力先生又說:“中国語言学的落后,主要是由于我們的普通語言学的落后。”不錯,普通語言学正是欧洲資產階級語言学的法宝。但是,王力先生絕不想想,普通語言学是語言科学中的基本理論部分,資產階級語言学者的某些重要理論是与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是唯心主义的,相反的,只有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才是我們工作的指南,才会引導我們走向正路。我們需要的是馬克思主义的普通語言学,而不是象王力先生所說的“最近五十年来”給了我們“恩賜”的資產階級普通語言学。王力先生虽然在前文也提到斯大林同志的語言学,但是脑子里好像沒有重視。王力先生又說:“在短短五年中,中国語言学能有这样蓬蓬勃勃的气象,是可喜的。再过十年以后,如果中国語言学还停留在这个进程上,就不能再認為可喜的了。”这几句話的口气,也証明王力先生对中国語言学的前途缺乏信心,因而有这样奇怪的設想。王力先生对于党在科学事业中的领导力量,党对語言科学事业的重視,难道都沒有想到么?

二 現在的書面語言大多数真是公式化、 概念化的語言嗎?

王力先生認為我国語言学是落后之后,还进一步有情緒地認為“現在的書面語言大多数是公式化、概念化的語言;不管写給哪一种讀者看(不管年齡、文化水平、职业等等),用的是千篇一律的語言,而且是不很高明的語言,这实际上是大大地降低了語言的交际功能”。这和过去右派分子攻击我們現在的文学作品多数是公式化、概念化,固然不能并論,但是我們必須知道,

今天在各報紙雜誌上發表的書面語言絕大多數是生動有力地反映了各方面蓬蓬勃勃建設社會主義的情況，反映了我們這個偉大的時代，即使偶爾有些寫得較差的，也絕非王力先生所說的大多數。今天全國人民在共同的認識、共同的奮鬥目標下，爭先恐後地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當然大家都具有共同的語言。王力先生是否認為這就是公式化、概念化，不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口味呢？即使王力先生所說的公式化、概念化的語言是指不管年齡、文化水平和職業等的語言，這也不合事實。例如，人民日報社論是給全國人民讀的，也是為全國人民所愛讀的；但是只用一種語言，並沒有按不同年齡、不同文化水平、不同職業而分寫成許多種語言。你能說它是公式化、概念化的語言嗎？公式化、概念化的語言的意思當然指的是語言不能很好地反映現實，對客觀的觀察不深入，詞彙不豐富，等等。王力先生所以感慨地指責現在的書面語言大多數是公式化、概念化，恐怕是指我們用了共同的語言，工人階級勞動人民所喜愛的語言，這正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討厭的語言，認為很不高明的語言。王力先生作為新中國一位語言學專家，當時說出這樣的話來，是很成問題的。這種看法也必然會影響到王力先生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效果。

三 問題越專門越覺得缺乏實踐意義嗎？

王力先生說：“某些語言學的知識的確是和實踐的關係比較間接的，可以這樣說，問題越專門，越令人覺得缺乏實踐意義。”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不管問題多么專門，關係多么間接，也還是不缺乏實踐意義的，如果一種科學研究完全缺乏實踐意義，就不成其為科學了。王力先生強調這一點，也無非是想為脫離實踐的資產階級偽科學打掩護。王力先生還強調“懂得醫治奇難雜症的醫生應該說是好醫生”。這段話也是有問題的。是不是能治普通病的就不是好醫生？普通病要不要治？他還打了一個比方：“……‘行百里者半九十’……解決十分之九等於沒有解決，往往最後的解決會動搖甚至推翻那認為已經解決了的十分之九。”王力先生不想想科學知識是積累起來的，有些走了十分之九，雖經過多次試驗未成功的工作，然而畢竟是最後成功的基礎，不可輕視，不能缺少。總之，王力先生強調這些，這就難免影響青年人誤走脫離實踐的資產階級的學術道路。這也就是輕視普及，想搞脫離普及基礎的提高。這是違反我們科學研究的方針政策的。

四 任何語言規律的發見都經不起吹毛求疵的問題

科學之所以為科學，就因為它的規律是經得起檢

驗的，語言科學也不能例外。王力先生說任何語言規律的發見都經不起吹毛求疵，這話的用意是什麼呢？我們得仔細分析一下。當然，科學規律是很少沒有例外的。原因是：事物是不斷發展的，不斷以新的事例充實或打破舊的規律，此其一；規律難免概括不周，有漏洞，需要隨時用實踐去檢驗，補充，以至糾正，此其二。所以規律總不會永遠是十全十美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們需要吹毛求疵，以使其日益完善，吹毛求疵對科學工作並不是壞事。王力先生為丁聲樹先生辯護，認為有人對他的文章提出不同意見是吹毛求疵。丁先生是語言學界的老前輩，但是否他的文章就絕對沒有一些毛病呢？對他的文章提出不同的意見跟他商榷，是否就是惡意吹毛求疵？我看丁先生自己也未必這樣看。而且從最近發表的討論“弗”“不”問題的文章（見《語言研究》1957年3期黃景欣《秦漢以前古漢語中的否定詞“弗”“不”研究》）看來，丁先生的說法真是“破”不得嗎？恐怕未必。王力先生說這樣的話，是帶着什麼一種情緒？這是值得王力先生自己檢查一下的。

五 對朴學的看法問題

從王力先生對清代朴學的評論中，我們也可看到王力先生一些思想活動。這問題也是很嚴重的。他標榜朴學說：“我們的前輩還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就是朴學的精神。他們為了一個字的語源所寫的文章，所費的時間往往和現代人寫半部書的時間相等。”這和胡適所說，考證一個字有所發現就和發現一個恆星有同等價值一類話，口氣上有什麼不同呢？王力先生把朴學家和現代人（這“現代人”中，王力先生自己可能是除外的）對照起來，必然肯定今人不如古人。這不但是厚古薄今思想，而且是慨乎言之地對今人所搞的科學研究的蔑視。清代朴學家固然有一些成績，但是要與今人的成就（資產階級的所謂專家學者除外）相比，則又當別論。因為我們今天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我們在科學研究上當然可以超越前人。王力先生還強調說：“缺乏這種朴學的精神而想要趕上世界語言學的先進水平，那是很難的。”這真是大錯。在搞科學研究時，如果觀點方法不對頭，徒有那種多費時間輕易不下筆的精神，能解決什麼問題呢？王力先生所以強調這些，其目的無非想把科學研究渲染成高不可攀，神秘莫測，教大家放下筆，好讓少數人獨占。但是我們並不會給王力先生吓唬住，因為黨發動群眾搞科學，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邊干邊學；科學堡壘一定會給我們攻下來的。

王力先生又說，朴學家的“顧朴不破的考證，完全是充分占有材料的結果”。這也是唬人的話。材料固然是科學研究的重要條件，但更重要的應該是立場、觀

（下轉510頁）

應該对高本汉的漢語學說重新評價

周 斌 武

一

在我們的語言學研究工作中，只要談到漢語的歷史音韻學，就會使人聯想到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 Karlgren)的名字。這並不是偶然的，因為多年來高本漢研究漢語音韻學的一系列著作以及他在漢語歷史音韻上所作出許多結論，包括斷代的音韻系統和音值的構擬，等等，我們有些專家學者，往往在闡述漢語歷史音韻現象時，不加批判地介紹過來，甚至採取他的說法。比如，王力先生的《漢語音韻學》就是這樣。

雖然，王力先生在這部書的新版自序中指出：“高本漢在漢語音韻學上雖不能說毫無貢獻，但他是資產階級語言學家，無論在立場上、觀點上、方法上都是有問題的。讀者對於這部書中的介紹高本漢的學說，應該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它。”可是《漢語音韻學》曾正面地介紹過高本漢的學說，並且採取了高本漢的某些說法。這部書對我國語言學界的音韻研究不能說沒有影響。因此，在破除迷信，清算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今天，我們不僅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高本漢的研究方法，同時應該對高本漢的漢語音韻學說的學術價值重新加以評價。

二

我們知道，高本漢雖然在三十年前就以研究漢語音韻著名，可是遠在高本漢運用近代語言學的方法研究漢語音韻以前，早有不少西方學者開始研究。^①例如，荷蘭學者桑克早在1897年開始着手比較音韻的研究，著有《古漢語語音學》(Ancient Chinese Phonetic)。馬伯樂在1917年開始研究安南語，根據安南語中所翻譯的漢字字音，進行比較研究，從而構擬漢語的“切韻”音系。只是他們的成就都不算大。高本漢的漢語音韻研究，嚴格一點說，基本上是遵循着近幾十年來西方資產階級學者的研究路線的，只是在他的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提高了一步。事實也正是這樣，高本漢在他的著作中有时總在批評和修正某些西方學者的論點，有些地方也發揮了別人的學說。因此應該說，高本漢能成為一個具有國際聲譽的漢學家，決不是偶然的。他研究漢語的真正成就恐怕主要屬於這一方面。

應該指出：高本漢研究漢語音韻學的成就與近幾十年來不少西方學者特別熱中於研究漢語是分不開

的，而西方學者所以對漢語的研究特別感興趣，這又與資本主義文化在舊中國的傳播和擴張是分不開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自從帝國主義者插足到中國，同時把資本主義文化也帶進來。尤其近幾十年來，不少西洋教士為了教會傳教的需要而搜集中國各地方言材料，加以描寫和研究，寫成很多方言調查的著作。比如有一本叫做《Giles 大字典》，其中包括十二種漢語方言的記音。做這些研究工作的西方傳教士大部分既沒有充分掌握漢語的實際知識，也不可能多方面地接觸漢語的實際材料。儘管有個別的西方學者做了一點漢語方言的調查和記音工作，寫成專著，實際上也是很成問題的。例如，有人描寫南京方音，把“如”字記成 ʌjê，“威海衛”寫成 ēi-chai-ēi^②那本《Giles 大字典》所記錄的方音同樣靠不住。

高本漢為了研究古漢語，也曾親自在中國進行過方言調查工作，曾寫了不少關於中古、上古漢語音韻方面的著作，這些著作不僅嚴重地影響着中國語言學界，而且也深刻地影響了許多研究漢語的外國學者。外國學者一般對高本漢的評價很高，他們都承認高本漢對於漢語歷史語音的研究有相當貢獻，這也包括蘇聯的漢學家在內。例如《蘇聯大百科全書》的“漢語篇”，其中有一段：

西歐資產階級漢學以其最優秀的代表為首……對漢語的研究事業有過巨大的貢獻，尤其是歷史語音方面（高本漢），古漢語語法方面（Gabelentz）。但是西歐資產階級漢學在方法學上的毛病以及證明漢語落后並從而為帝國主義的“文化普及者”的傳教士辯護的這種企圖，使漢語構造的特點受到歪曲。比如在語音方面他們強調漢語音系退步的理論……^③

再如，蘇聯已故漢學家龍果夫教授在《現代漢語語法研究》中曾經這樣說：

不能在作為語法學家的高本漢和關於漢語音韻的一系列重要著作的作者高本漢之間劃上等號。他的語法方面的見解只能引起我們的否定，但是他在古代漢語音韻方

① 例如，比較著名的有艾約瑟(Joseph Edkins)、居法蘭(Franz Kühnert)、武爾披齊利(Z. Volpicelli)、桑克(S. H. Schaank)、伯希和(P. Pelliot)等。

② Franz Kühnert: «Syllabar des Nanking Dialectes», 1898.

③ 見中譯本17頁。

面的研究（正如我屡次有机会在我讲汉语音韵论文中指出）是很有价值的……高本汉在他的关于古汉语音韵的著作里总是从整个的系统出发，为了解决这个系统他引用大量的材料……①

龙果夫好心地肯定了高本汉在古代汉语音韵方面的研究价值；可是，高本汉的理论是否真的总是从整个系统出发？是否真的总是引用大量的材料从事研究工作呢？以高本汉为首的资产阶级学者，他们怎样得出汉语音系退步的理论？而且要强调这理论呢？这些问题在今天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二

事实告诉我们，高本汉所掌握和引用汉语的材料极其有限。就拿他三十年前出版的最有名的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来说，这部书的中文译本却胜过了原著，因为在这部书里，作者对汉语文献材料的引用很成问题。译者不但为原书作了许多补充，而且替作者改正了不少错误。高本汉研究汉语音韵的最大毛病是选择材料，先入为主，随便推断。二三十年前，他对于汉语的历史音韵所作出的结论今天绝大部分已经站不住了。汉语音韵学中由于高本汉说法的影响而值得考虑的问题，即以中古音韵系统而论：象中古声母的喻化问题；“切韵”纯四等韵的音值问题；中古濁音声母是否送气问题；中古韵母合口呼的强弱问题；“切韵”声母系统的类别问题；以及中古是否已有卷舌声母问题；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现代中国学者通过辛勤的劳动，根据实际材料反复研究，不但认识了高本汉学说的真面目，而且批判了他的错误说法，否定了他那一套主观的解释，得出了比较可靠的结论。各家的意见也因此而逐步地取得一致。可以这样说，过去凡是学者批评高本汉学说的任何方面，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

大家都知道，汉语音韵的研究在我国源远流长。我们过去的学者一直保持着顽强的研究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功力深，效果好。比如，关于等韵分等的大概音值，清代学者江永有过说明；关于上古韵母系统的探讨，戴震早有九类二十五部说。戴氏的体系给后世的古音学家启发很大。再象《广韵》的声母系统，陈澧运用“反切系联法”，略见端倪。钱玄同先生说过：“但我对于高公也有不敬之点。即是戴东原、王念孙以来，从声音研究文字而抛开形体，这一点很新很确很进步的中国语言文字研究，高公尚未梦见……”② 我们的古代学者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就，当然因为积累了许多实际材料，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过去的研究自有很大局限性。高本汉跟有些资产阶级学者一样，通过所积累的实际材料，在某种情况下，单独地细密地观察语言事实，从而得出结论。因此，在他的学说中，个别

的结论可能比较可靠，比较接近语言的客观实际。但是，个别结论的正确和可靠并不等于他的整个学术思想体系和思想方法没有问题。反过来说，高本汉学说中有很多不正确的不可靠的论断和说法，这就得联系到他的整套学说，联系到他的形而上学观点和主观主义方法。

高本汉对于语音的历史发展和历史演变的理解是形而上学的。他死守着历史比较法的一条原则，认为语音的演变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一定是同样的变化，除非不变。认为只有不同的来源在相同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形成不同的变化。他所探讨的汉语音韵变化的历史关系，在阐述谐声原则这一点上，正反映了这种片面的认识。他说：

谐声的部分跟全字不必完全同音。例如咸、减、喊、感四字在古音是 *ɣam*, *kam*, *xam*, *kām* 四个音。假如在上古音的时候是完全同音的，而到古音（中古音）的时候各自变成那四个不同的音了，那照一切语言史的经验上来看是不会有事情。咱们可以无疑的说这四个字在上古音时代已经有甲乙丙丁四种音了，而且甲既然可以做乙丙丁的谐声，咱们也可以晓得那四个音虽然不同，也都是相近的音。不但如此，就假使在古音是绝对可以“单念偏旁”的，例如“奇”“骑”都念 *g'jie*，咱们也不能因此就断定，在早先造“骑”字的时候本来是完全同音的。因为，从近千余年的音史看来，咱们知道总是早一点时代所有的分别，过些时代就混了，所以同样在古音里分不出的音（例如奇骑），在上古音里也许本来是有分别的。③

固然，在汉语的谐声系统里，形声字的字音与声旁字的读音可能原来就不完全相同，可是，高本汉依据了历史比较法这个原则来理解汉语的谐声现象，并且加以绝对化。汉语的语言事实告诉我们，语音的历史变化不仅受语音的生理条件和物理条件的制约，同时也受社会条件所制约。资产阶级学者，包括高本汉在内，把语音变化的条件局限于语音本身（生理因素和物理因素），是不全面的。只从语音本身条件的相同或差异来观察语音发展的规律，是有问题的。因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情况下，民族的兼并，人民的迁徙，异族的同化，正则读音与方音之间的差别，读书音与说话音之间的距离，等等，这一些现象都有可能成为语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外在因素，同样地会影响语音发展的内部规律。其次，语音变化还有两种特殊现象：一是语音变迁有时间性——某些语音成分往往在某一个时期引起变化，而在另外一个时期就不起变化。换句话说，音变的规

① 见俄文本 18—19 页，中译本 12 页。

② 见魏建功《古音系研究》，1935 年，893—4 页。

③ 见高本汉《谐声说》。

律也許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內才起作用。一是語音变迁有时因为空間的不同而变化不同——在同一时期內,可能在甲地是这样变化,而在乙地是那样的变化,或者不起变化。換句話說,音变規律也許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域起着不同的作用。高本汉仅仅从語音本身条件的相同和差异来观察音变現象,从而探討語音發展的規律,这样,必然无法解釋漢語語音史中那些錯綜复杂的音变現象,而在解釋語音变迁的历史关系这方面,势必捉襟見肘,甚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由于他一口咬定語音变化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不同的發展,以漢語这样历史悠久,語言材料的丰富,必然会得出“漢語音系退步”的結論。^①

三

目前,高本汉先生还健在,他还在研究漢語,同时,还参加资本主义世界的語言学研究的活動。他的不少著作还在很多国家流傳。我們不能因为他是一个資產階級語言学家,他的立場、观点、方法反正有問題而放松对他进行批判。可以这样說,今天的高本汉不再是一个了不起的汉学家了。人們不再迷信他。由于高本汉學說傳播極广,影响很大,对于他那一套資產階級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方法,完全有必要全面深入地批判。我們更有必要分析一下,在他的學說中,有哪些地方比

較可靠,或者基本上可靠,哪些地方已經被否定,或者今后很难站得住。同时,檢查一下,在他的學說中,究竟有多少精华,多少糟粕。总之,我們應該重新考虑作为汉学家的高本汉的学术水平和他的許多著作的学术价值,特別要重新估量他在漢語音韵学方面的研究成就和貢獻。

① 高本汉說过:“中国語,在他演化的过程上尽我們所能考見的总是趋向于声音的單純化。”“現代各种方言里,詞类都是很貧乏的,具有多数的同音語詞。北京的國語是一种最可怜的方言,老实說,他只具有四百二十个各异的音綴,而即在四百二十个的音綴中,也有許多彼此容易相混的。”(以上見《中国語与中国文》中譯本)还有,他說过:“中国沒有一种标准的國語,每个方言的地帶,都各自有其中心語,而每一种都各有其文化的專門的術語,本着各自的語音状态來說,毫受他种的影响。”“中国語音,据近今各种方言看来,有極端貧乏的現象,乃是由于历来語音喪失和趋于單純的結果。”(以上見《中国語言学研究》中譯本)

把高本汉这些歪曲漢語語言事实的謬論,联系他所構拟的斷代的音韵系統(上古与中古),很明显,在高本汉的學說中,就反映着漢語的整个音韵系統是:上古的声、韵、調比中古音为繁复,而中古音系又远比近代的官話音系为繁复;在高本汉看来漢語語音的發展是走上了“單純化”的路途。也就是“貧乏”衰退的道路。

北京师范大学語言学教研組訂出科学研究规划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語言組根据校党委在本学年开学典礼大会上所作“关于教学改革和批判資產階級学术思想”这一报告的精神,拟訂出了今后一年內(1958年10月—1959年10月)的科学研究规划。

首先,結合教育訂出了一些学术批判的题目:跟一年級的語音、文字教学有关的有“《國語运动史綱》批判”、“《四十年来的‘注音字母’和今后的‘拼音字母’》批判”。跟二年級語法修辞教学有关的有“《新著國語文法》批判”、“《漢語語法教材》批判”、“《語法修辞講話》批判”、“《修辞学發凡》批判”以及“初中《漢語》課本(語法修辞部分)批判”。跟三年級的古漢語教学有关的有“《馬氏文通》批判”、“《高等國文法》批判”、“《中国文法要略》批判”、“《文言虛字》批判”、“《漢語音韵学》批判”。这些項目都将分別在1959年元旦、“三八”节、“五一”节完成,向党献礼。

語言学教研組还要努力建設新的无产階級的語言科学。在語音方面要写出“方言研究”和“方音、普通話注音詞汇对照表”。在語法修辞方面要經常分析、研究同學們的文章,寻求語法修辞教学如何才能联系实际,指導實踐的途徑;另外,为了研究語言如何“以古为今服务”和如何學習古人的語言的問題,还訂出了“毛主席著作中的古漢語語詞的运用”,“新兴句型的研究”,“解放十年来詞匯的發展和变化”等題目。这些都将在1959年7月1日以前完成。

关于語言学方面的一些基本的理論性問題,如:語言的本質、語言如何为政治服务、語言与思維的关系等也将进行探討。

上述科学研究項目将按內容分別出版“語言学的几个基本問題研究集”、“黎錦熙先生資產階級学术思想批判集”等專册。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語言学教研組还要于1959年10月1日以前編写出新的高等师范院校用的“漢語教科書”初稿。向国庆献礼。(史錫堯)

批判我在語言學工作中的資產階級思想

王 力

在双反运动中是党挽救了我；在党和群众的大力帮助下，我批判了我的个人名利思想和反动政治立场。最近北京大学中文系高年级同学、研究生和汉语、語言两教研室的同志们对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了批判，使我认识到我在学术上的唯心主义是严重的。我决心依靠党，依靠群众，进行自觉革命。对我来说，这是更深刻的一次思想革命，学术思想批判是更痛苦的过程，但是为了揭露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为了在語言学领域的文化革命中做一个促进派，我要求我自己把亲手竖起的白旗拔掉，然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跟着同志们前进。我已经订立了个人的红专规划，决心在群众的经常监督下，走向红专的道路；我希望同志们不断地给我以严厉的批评。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性在我的語言学著作中的反映

从表面上看来，我的語言学（特别是汉语语法学）好象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其实它并不成为什么体系，而只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杂糅，这就是反映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性。

在23岁以前，我还不懂外国語。我没有读过中学，缺乏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我读了一些钱装书，在意识形态上、学术观点上都受过封建主义的影响。我始终宣传乾嘉学派的朴学，这和封建主义学术思想不无关系。但是，应该指出，我的学术思想的主流是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我虽然拿朴学精神做幌子，但是正如同同志们所指出的，我的不严肃的治学态度恰恰是缺乏朴学精神的表现。

我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突出地表现在我对洋人的崇拜。我在汉语的研究上只是为资产阶级語言学家的学说作证明；即使我自己本来有这种意见，也要从洋人的学说中找根据，借洋人以自重。在教学上，我更是简单地贩卖西洋资产阶级的货色。抗战以前和抗战时期，我教了几年“語言学概要”，在讲义中我整段、整节地照抄方德里耶斯、布龙菲尔德、叶斯柏森、德·索绪耳等人的著作。在我所著的《中国音韵学》（后来改名《汉语音韵学》）中，对于中古音系、上古音系

以及这两个音系的音值拟测，我完全用的是高本汉的学说。在我所著的《中国语法理论》、《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纲要》（现在改名《汉语语法纲要》）中，我全部采用了叶斯柏森的“三品说”。在这一点上我甚至开了一个笑话。我同时采用了布龙菲尔德的“中心词”和“修饰语”的学说，以致和叶斯柏森的“三品说”发生冲突。^①我不是说所有资产阶级学者的话都不可以引用，而是说我不应该无原则地大量引用洋人的话，借以吓人。这是和我的买办思想分不开的。有时候，引洋人的话对于我的文章并没有任何用处，只是为了炫耀我看了不少洋人的著作。举例来说，在《中国语文概论》第13页的附注中我引了瑞典汉学家斐安里关于汉语作为单音节语的解釋，这完全是题外的话。1955年这书改名为《汉语讲话》时，我才把这个附注删掉。在一味崇拜洋人的学术思想指导下，我对汉语的研究当然只好跟着洋人走，这种半殖民地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使我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里去。

二 主观唯心主义

我自以为我在汉语语法研究中能够重视汉语的特点；其实，在主观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指导下，我所“发现”的汉语语法特点必然是极端片面的。我拿西洋語言（主要是英語、法語）的语法和汉语语法相比，自以为不但能证其同，而且能证其异，我和某些把西洋语法硬套在汉语头上的语法学家不同。其实，我只拿西洋語言和汉语比较，而没有拿其他語言和汉语比较，这个方法本身就是主观主义的。我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并非真正在于寻找汉语语法的特点，而是在于寻找一种比较满意的汉语语法理论体系。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既然语法学是西洋传来的，那么汉语语法上的术语及定义要完全脱离西洋语法术语和定义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因此，我要尽可能多保留一些英語的术语和定义；如果有所更动，也必须在印欧語系其他語言或古代語言中找出一些根据来。我的目的只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汉语语法理论体系，以期博得西洋资产

^① 龙果夫教授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参看王了一《汉语语法纲要》（龙果夫教授序注本），48页。

階級語言學家的稱許；我只知道斤斤計較術語和定義，並非真的能够科學地發現漢語的特點。我之所以不肯承認“若”“如”“倘”等字是連詞，仅仅是因為英語 if（法語 si）只能放在句子形式的開頭，而漢語“若”“如”“倘”等詞可以放在主語和謂語的中間。其實如果承認“若”“如”“倘”是連詞，同時指出它們能放在主語和謂語的中間，一樣地可以說明漢語語法的特点。這樣，我就只能在一些名詞概念上兜圈子。

我在《中國文法學初探》里說：“我們研究中國文法，該從語象的結構上着眼，說得更淺些，就是體會中國人的心理。”^①這是很露骨的唯心觀點。跟着我就舉出一些聯語為例。我引《文選》序：“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以為既然“所”字和“之”字聯舉，“所”字決不會是代詞。解放後，我僅僅避免了“語象”、“心理”一類的說法，我仍舊用“對對子”作為區別詞類的一個標準。這樣從“心理”出發去尋找語法標準，從文人的修辭去決定詞類，顯然是極端唯心的。

形而上學觀點也存在于我的語言學著作中。我自以為我除了重視漢語特點以外，還重視歷史發展。其實我在詞和仿語的界限的問題上，就缺乏歷史發展的观点。現代漢語的一個單詞，只要其中的詞素在歷史上曾經是詞，我就硬把它認為仿語。例如“香料”被認為仿語，仅仅是由於它被了解為“香的材料”或“香的物質”，我不但沒有注意它的語法標志，甚至沒有注意它的現行意義。這種研究方法顯然是形而上學的。

我的主觀唯心主義又突出地表現在實用主義觀點上。當我想要指出漢語的某一語言事實是漢語語法特點的時候，我就強調漢語和西洋語言相異的一面，而拋棄了相同的一面，例如否認“若”“如”“倘”等字是連詞；當我想要指出漢語的另一語言事實不算是漢語語法特點的時候，我就強調漢語和西洋語言相同的一面，而拋棄了相異的一面，例如我勉強拿漢語的“能願式”和印歐語的 volitive（意願式）相比。解放後，胡適的實用主義受到了批判，我沒有能夠從其中吸取教訓，沒有好好地檢查並批判我在語言學工作中的實用主義觀點，因此，我在《漢語史稿》中還重複了實用主義的錯誤。現在舉出兩個例子來說。第一，我在《漢語史稿》上冊討論語音發展的時候，談到了一些不規則的變化。不規則的變化自然是可能的，但必須是個別的情況。如果“不規則”的情況很普遍，那就不能認為不規則。但是，在不只一個地方，為了維護我的重建系統，我硬說是不規則。舉例來說，由於我拘守高本漢所定刪山兩韻在實際語音有分別的理論，而我又反對高本漢把一個上古寒部擬成三種主要元音（ā, a, ǎ），于是我只好把刪山兩韻的字看成它們在上古是同韻，而以聲母為分

化條件：喉唇發展為 an（刪），齒音發展為 æn（山）。這樣，山韻的“間閑簡”等字，刪韻的“刪潛”等字都被看成了不規則的變化。^②這樣任意製造語音發展規律，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同時也就反映了我的實用主義觀點。第二，我在研究“兒耳二”等字的語音發展過程的時候，感覺得很難處理。忽然異想天開，我想出語言學上有所謂“易位法”（metathesis），以為 [ɣɿ] 變為 [eɿ] 是語音的互換位置；“互換之後，應該是 [ɿɣ]，但是 [ɿ] 在漢語里是不能處於字首的，所以變為 [ə]，至於 [ɣ]，它在現代漢語里本來就和 [ɿ] 是互換音位，所以用 [ɿ] 就等於用 [ɣ] 了”。^③這是極其荒謬的說法。大家知道，現代漢語里的 [eɿ] 只是一個單元音，[ɿ] 只表示它帶有卷舌 r 的色彩，並非先發一個 [ə]，再發一個 [ɿ]，這上面根本不可能涉及“易位法”的問題。退一步說，即使真正是先發一個 [ə]，再發一個 [ɿ]，也不能主觀臆斷它是易位法的結果，因為缺乏任何客觀的証據。實用主義就是要生拉硬扯，製造一些合乎自己的主觀假設所要求的假事實，這是應該深刻檢討的。

在過去，我以為我掌握了一套“科學方法”，其實只是從胡適那里學來的實用主義。我以為我能够分析客觀事實，其實在很多地方我都以“想當然”去代替客觀分析，從自己的邏輯中演繹出一些“客觀事實”來。我在我的著作中常常只要求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就是能够自圓其說，前後不發生矛盾。當然由於我的治學不謹嚴，連這一點也還沒有做到。即使真的做到了，也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因為資產階級學者也能寫出一些“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著作，嚴重的問題在於他們所持的“理”是主觀唯心的。

在研究工作中我受高本漢的影響也很大。我看見他對上古漢語的語音擬測經過了多次修訂，無非要做到更能“言之成理”，更能說得過去而沒有障礙。于是我自己不知不覺地也這樣做了。無論我怎樣反對高本漢，我在研究方法上是跟著他走的。

離開了唯物主義辯証法，在科學研究工作中必然會走上資產階級學者那種只求講得通的主觀唯心主義的道路。馬克思主義語言學所下的結論，必然是客觀事實或客觀材料充分証明了的，是客觀現實的真實反映，而不是人為地製造出來的一些虛構的“論據”所能証明的。在科學研究工作中，正確的結論只有一個，因為真理只有一個；我的工作正相反，我所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怎樣說得穩妥一些，以免被人駁倒，這仍舊是

① 王力：《漢語史論文集》，166 頁。

② 王力：《漢語史稿》，上冊，93 頁。這裡舉“棧”字為例是錯誤的。

③ 同上，162 頁。

实用主义观点。我如果不把实用主义批判掉，我的研究工作是不会有前途的。

我的主观唯心主义又表现在缺乏调查研究，专凭主观臆断上。这种例子可以举得很多。我在《中国语法理论》上册(165页)说明有五种情况不能用“把”字：1)叙述词所表示者系一种精神行为；2)叙述词所叙述者系一种感受现象；3)叙述词所表示的行为并不能使目的语所表示的事物变更其状况；4)叙述词所表示的行为系一种意外的遭遇；5)叙述系“有”“在”一类字。经吕叔湘先生指出，只有2和5两条是没有例外的。^①这因为当时我只是主观片面地想了一想就写了下来，没有把这五条规则在大量材料中检验过，这是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我在《中国现代语法》上册(315页)说进行貌不受否定词的修饰，实际上北方话里的进行貌都可以受否定词的修饰，这是我凭着自己的方言来推测北方话，以致犯了错误。由于我自己的方言是属于粤方言的，所以常常以为自己方言的语法和广州的语法差不多，谈到广州话的时候可以不经检验地憑着自己方言去类推。在《汉语语法纲要》里(74页)，我说：“关于人力车，北京称‘轎’，上海称‘部’，广州称‘乘’，重庆称‘挂’，长沙称‘把’，昆明称‘張’。”实际上广州称“架”不称“乘”。在《中国语法理论》里(上册162页)，我谈到否定的使成式，我说：“中国方言可分为两派：(甲)官话系和吴语为一派，它们把‘不’字插进叙述词和末品补语之间，以表示不可能，例如‘教不坏’，‘饿不死’；(乙)粤语、闽语和客家话为一派，它们把‘得’字插进叙述词和末品补语之间，造成可能式，然后在这使成式前面加一个‘不’字，例如‘不教得坏’，‘不饿得死’。”在沒有经过详细调查研究以前就下这样一个断语，当然只能是主观片面的。现在知道广州就有“教唔坏(教不坏)”、“饿唔死”(饿不死)的说法，其他地方也可能还有类似的情形。这一种研究方法显然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

三 脱离实际

脱离实际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主要表现之一。资产阶级学者强调“为科学而科学”，以为科学研究可以脱离生产，脱离阶级斗争；学术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只是达到名利的一种手段。我受这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影响很深。我公开地宣称：“勿以为语法能使文章写得好”(《汉语语法纲要》序言)；又说：“一个道地的北京人对于本书只有语言学的兴趣，并不能希望从这里得到任何实用的利益”(《中国现代语法》导言)。总之，我认为语法对于语言实践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研究语法只是为了语言学的兴趣，也就等于说“为科学而科学”。解放后，我曾经几次批判过我这种拒绝为人民

服务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②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从我的思想上得到解决。我虽然开始承认语言学应该为人民服务，但是在我思想深处却把语言学分为低级的和高级的。我在《中国语言学的现况及其存在的问题》里说：“可能有人这样说：‘只要有了三分学问，已经可以解决实践问题的十分之九’。”^③其实我自己就是这样想的。在这篇文章里，我一方面强调语言科学要和语言教育密切结合，另一方面也反对狭隘的功利主义，似乎是做到了不偏不倚，不右不“左”，实际上我是把语言的理论和实践割裂开来，把普及和提高割裂开来。我把懂得“高深”的语言学理论的人比做“懂得医治疑难杂症的医生”，这样是把书本的知识提到了不应有的高度，我完全不懂得从实践中提高到理论认识才是真正的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

今天我觉悟到：只有圆满地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提出的语言学问题的理论，才是真正高深的理论。如果说难，也是这些问题最难，因为这些理论要通过实践来证实，一点含糊不得，决不象资产阶级伪科学那样，可以架空立论，只求自圆其说，不管是否合乎真理。

我的理论脱离实际，突出地表现在“为分析而分析”这个研究方法上。当我要写一本书的时候，最关心的是它的体系。我先想好一个目录，也就是最着重在搭架子。至于内容是否充实，材料是否可靠，都成了次要的问题。我常常自负，以为一个问题到了我的脑子里，我就能“目无全牛”。我常常以此勉励研究生们，甚至说“分析就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就是分析”！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教人们深入分析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和我们所谓分析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问题有主要的，有次要的；有一般的，有特殊的；有本质的，有非本质的。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時候，应该区别看待，而不是随手拿着什么就分析什么。例如《中国现代语法》第23节讲“语气末品”的时候，我分为诧异、不满、轻说、顿挫、重说、辩驳、慷慨、反詰等八种语气，其实这些都是词彙意义所决定的分类，这样分析，对语言实践是不能起丝毫的指导作用的。

马克思主义教人在深入分析问题以后，要有高度的概括；概括成为理论以后，才能对实践起指导作用。而我的分析恰恰是概括性不足的，甚至是完全缺乏概

① 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126—128页。

② 参看《论汉族标准语》，《中国语文》1954年6月号17页。在这里我说：“除了‘三品说’犯了唯心论的错误之外，第二个大错误就是忽略了语法书的指导性，过分强调语言事实的客观分析，而轻视规范化的工作。”又《我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中得到的一些体会》，《中国语文》1954年12月号，3—4页。

③ 《中国语文》1957年3月号，3页。

括性的。有同志指出：我在《汉语诗律学》里分析了五言近体诗不完全句的句式，共有17个大类，54个小类，109个大目，115个细目。这样的分析还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为分析而分析”的研究方法必然导致繁琐主义。我在我的《汉语史稿》语音部分作了许多繁琐的分析，自己知道同学们难于掌握，于是叫同学们不必费心思去死记它，又提出“应该掌握的要点”（上册98—99页）以为补救，到了讲“由中古到现代的语音发展”的时候，就连“应该掌握的要点”也没有了。表面上我似乎是要全面和深入，实际上是完全脱离了同学们的接受水平。这种繁琐主义的叙述，不但对教学是有害的，即使从科学研究方面来评价，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的。

四 学术态度

我在《中国语言学的现况及其存在的问题》里说过：“我们的前辈还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朴学的精神。他们为了一个字的语源所写的文章，所费的时间往往和现代人写半部书的时间相等。他们想好了一个问题还不轻易下笔，写好了一部书还不轻易刊行。他们的颠扑不破的考证，完全是充分占有材料的结果。”我在这里过分地颂扬了“朴学”和“考证”，在客观效果上是把青年一代引导到封建主义的学术道路上去，这是值得检讨的。还应该指出：我所颂扬的朴学精神，也正是我自己所缺少的东西。我治学是不严谨的，我的著作是粗制滥造的，对读者是缺乏负责的态度。

不注意材料的真确性，这是粗制滥造的具体表现之一。张欣山同志曾经指出，我把江永《音学辨微》的话引错了。^①这种情形不是个别的。例如我在《汉语音韵学》127页上说：“近世等韵家以匣无三等，喻群无一二等，禪日无一二四等，邪无一二三等；若以《广韵》反切证之，自然应该这样说。但《指掌图》第八图群二等有‘舊’音，第十八图邪一等有‘詞’‘兕’‘寺’三音，又于喻群一二等，禪二等，邪一等，无字处皆加圈，与日紐一二四等无字空格不加圈者不同。”实际上，《指掌图》第十八图禪二等有‘蔡’‘俟’二音，而我忽略了。我在《汉语音韵学》11页上引法国语音学家鲁代（Roudet）的话说：“古希腊语与拉丁语里也有这类复合元音，但到了法语里就变了简单的元音，或后优势的复合元音。”其实原文的真正意思是：“古希腊语与拉丁语里有这类复合元音，古法语里也有几个，后来才变了简单元音或后优势的复合元音”。

我在解放前的著作，除了《汉语讲话》有部分更动以外，其余差不多都是原封不动地重印了。不但其中

有许多错误的观点没有改正过来，甚至有许多误排的字都没有校改。这是对读者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解放后，我写了许多小册子，以为轻而易举，更加随便了。我没有认识到：我的著作是给广大读者很大的影响的，粗制滥造的著作给人民带来了损失。

当我写《汉语史稿》的时候，为了追求“国际水平”，曾经郑重其事，费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这些时间和精力，和艰巨的汉语史工作所要求的时间和精力比较起来，还是相差很远，而且这种艰巨的工作也决不是独力所能成。我自己知道：“在这种草路蓝缕的情况下，要写一部象样的汉语史，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和集体的力量”（《汉语史稿》序），但是为权威思想和名利思想所驱使，我终于让它出版了！在“稿”字的掩护下，我仍然粗制滥造！有许多地方，自己还拿不定主意，就先假定是那样。我好象是说：反正只是初稿，现在先大胆假设，将来再小心求证。我没有认识到草率成书的危害性；广大的读者将从书中接受一些不可靠的知识，甚至由此得出其他不可靠的结论来。

我治学的不严谨，又表现在我满足于利用第二手材料。由于赶任务，我就走捷径，常常简单地依靠工具书：《说文通训定声》、《说文解字诂林》、《佩文韵府》，以及各种字典、辞书、索引，等等。这样草率从事，自然很难保证质量。例如我根据《方言调查字表》把“棧”字误为删韵字，归入不规则的变化（《汉语史稿》上册93页），其实“棧”是山韵上声字（士限切），并非不规则的变化。我所提倡的朴学精神和我自己的学术态度成为鲜明的对比，这也是值得深刻检讨的。

五 解放以后我是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

1950年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发表后，我是很高兴的。高兴的是我不需要学习马尔那一套“新语言学”；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理论是那样平易近人，和我从前所学的东西没有什么抵触（这个想法自然是错误的），所以我乐于接受。除此之外，我还相当关心苏联语言学动向，有时候翻译一些有关苏联语言学的短篇论文和教学大纲、著作目录和序文等，给教研室同志们参考，我还常常对汉语史研究生说，不要专鑽故纸堆，忽略了“天下大势”和语言学“行情”。表面上看来，我是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事实上，我是以对待资产阶级语言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从前我曾经搬弄资产阶级语言学来吓人，现在是搬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一些条文和苏联语言学家的一些学说来吓人。在我的《关于汉语有无词类

^① 《中国语文》1958年4月号，249页。

的問題》一文中，我大量地、毫無限制地引用蘇聯語言學家的言論；在《語文學習》討論主語賓語問題的時候，我甚至引用蘇聯的詞典來作為理論根據。總之，我是以實用主義的態度來對待馬克思主義語言學。

我雖然學習馬列主義，但是我对資產階級語言學還有很大的留戀。我錯誤地認為，語言學是接近自然科學的，因此它就不至於象文學那樣需要很強的思想性，同時也不那樣容易犯唯心主義的錯誤。我仍然崇拜某些資產階級語言學家，以為他們掌握了豐富的材料，作了縝密的分析，絕大部分還是科學性很強的。蘇聯翻譯了一些西歐語言學家的名著，這本來是很平常的事，而我錯誤地認為西歐的語言學（特別是法國的語言學）還是很高明的。我有了這個思想基礎，所以在斯大林受到了批判以後，我在語言學上就犯了修正主義的錯誤。我幻想着“西歐語言學為體，馬克思主義為用”。我在天津語言學會成立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流露了這種修正主義觀點。今天我覺悟到，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和資產階級語言學在立場、觀點、方法上是不能相容的。如果想要以“西歐語言學為體，馬克思主義為用”，結果只能是歪曲了馬克思主義。我們必須在中國建立馬克思主義語言學，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滲透到語言學的各個部門中去。一方面我們要認真向蘇聯語言學家們學習，要做到不是剽竊他們的詞句，而是學習他們怎樣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融會貫通；另一方面，我們要結合中國具體情況，解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實際問題，從實踐工作中發展中國語言學，那樣的語言學才是土生土長的語言學，才真正有可能達到和超過國際學術水平。

在批判我的學術思想的時候，我必須回到階級立場上來檢查我的思想根源。同志們指出，我於1957年3月在《中國語文》上發表的《中國語言學的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和同年6月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漫談高等學校中的幾個問題》，是互相呼應的，不過前者是學術思想問題，後者是政治思想問題罷了。在後一篇文章里，我借口反對思想改造的方式，實際上是反對思想改造；在前一篇文章里，我借口反對教條主義，實際上是隱藏修正主義。學術思想和政治思想雖然不是一回事，但是二者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我必須改變階級立場，然後學術思想才能徹底改變，否則馬克思列寧主義學得再多，也不過當作標籤；蘇聯語言學著作讀

（上接502頁）

點與方法以及社會實踐。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有的由於過去有一些特殊境遇，掌握一些古的或洋的資料，從中販運偷竊一些即可成家；有的就直接用這個來吓唬人，打擊人，等到拆穿了西洋鏡，實在不值一笑。王

得再多，也不過供剽竊之用罷了。

唯有改變階級立場，樹立無產階級思想，然後能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性所反映在我身上的買辦思想徹底肅清，不再崇拜洋人和迷信洋人；唯有改變階級立場，以辯證唯物主義為科學研究的準則，然後可以避免主觀唯心主義的學術觀點；唯有樹立無產階級的world觀，然後能實事求是地追求真理，不至於在科學研究工作中陷入實用主義的泥坑；唯有改變階級立場，然後能使語言科學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不再脫離實際，走資產階級的學術道路。即就端正學術態度這一點而論，也非改變階級立場不可，因為只有馬克思主義者最能忠於學術，最有科學責任感。馬克思本人就從來不滿足於間接得來的材料，他也決不出版一本沒有經過他仔細加工和認真琢磨過的作品。

我從前對青年人自負能掌握材料，對老前輩自負能掌握“方法”。其實，在馬克思主義者的眼裡，我所掌握的材料實在微不足道，而我所自負的“方法”是沒落時期資產階級那一套形而上學的和實用主義的方法，正是馬克思主義者所要批判的。從今以後，如果我希望在學術上能有一點兒成就，就只有老老实实地承認自己的淺薄和無知，依靠黨的幫助，向群眾學習，向工農學習，向青年人學習。

今天我認識到：我的毛病雖多，病根只有一個，藥方也只有一個。非建立無產階級world觀就不可能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能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語言學工作中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貢獻。因此，我下決心參加勞動鍛煉，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主席的著作，積極參加政治鬥爭、教學改革和文化革命工作，從實際行動中改造思想。等到徹底改變了我的資產階級立場，轉變為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時候，我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就能徹底清除，使我成為對人民有用的語言學工作者。

當然，在徹底改變我的world觀以前，我也不能裹足不前。我仍然應該竭盡我的能力來為社會主義服務。從現在起，我應該首先改變我的學術態度，我要嚴肅地對待我的工作，以期減少工作中的錯誤。同時，在大家力爭上游的今天，我也決不能甘居中游。我要以邊干邊學的精神，鼓足干劲，積極參加有利於社會主義的語言學工作。在黨的光輝照耀下，在群眾的監督下，我有決心和信心把自己改造成為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

力先生又說：“高深的科學……和‘微言大義’也是不相容的。”不知這“微言大義”究竟指什麼。總之，王力先生單強調清代朴學家的考證，占有材料不輕易下筆，而未認識朴學家真正的治學精神，這對科學研究的躍進，對破除迷信，對群眾搞科學的大運動都難免起促退作用。

民族和民族語的关系問題

——和林杭敵同志商榷

徐 榮 强

林杭敵同志曾經在《民族与民族語》^①一文中提出对民族与民族語的关系的一些看法，这个問題是涉及語言研究的基本原則的。我認为林同志的看法很不妥當，應該进行廣泛的討論，以便使語言科学前进一步。現在我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見，請大家指教。

林同志的看法是从怀疑謝尔久琴柯的一个論点开始的，他不同意謝尔久琴柯所說“民族語言的形成过程是隨着資本主义的出現而發生的……”这句话，同时，他对謝尔久琴柯从这个論点出發所論証汉民族語形成过程的特殊性的一段話也加以反駁。这段話是說：

既然中国没有充分地、完整地經歷资产階級-資本主义發展的“經典的”形式，那么它發展为民族的过程也就是独特的，它形成为资产階級民族的过程显然是未完成的。中国直到“五四运动”为止，民族語的全民形式（包括口头和書面兩方面）的發展过程，对于汉民族組成員共同的、对整个民族統一的民族語的發展过程，其所以未完成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林同志对这段話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認为“民族与民族語各有自己的發展过程”，“未必”“存在着这样必然的关系”；再者，“語言”或“共同的語言”有“早熟”現象也可証实民族和民族語之間沒有“这样必然的关系”。語言和共同語的“早熟”是毋庸置疑的，当人类祖先成为真正的人的时候，人就是社会的，他需要和其他人交际，因此就要使用語言，而这种語言必然是会滿足当时的需要的，所以也可以說是成熟的。可是很明显，林同志对这两个概念——語言和共同語——有特殊的理解，他說：

只就語言而論，它的“早熟”就說明了兩点：一、民族語的形成可能而且常常与民族的形成不一致……

可以看出，林同志是把語言和民族語等同起来了，因而在涉及这个問題时，他总是有意無意地用“語言”和“共同的語言”来代替“民族語”。依此推論，自然是民族和民族語之間并無本質联系，有时虽然“同时形成”，但也只是偶然的巧合；进一步也可以否定社会發展过程对語言發展的影响，因为民族是人类社会發展的一定阶段。姑且不論他的进一步推論是否荒謬，我們先来看看他的立論根据是否正确。

民族和民族語“各有自己的發展过程”，这是不言自明的。兩種事物或現象，所以是兩種而不是一种的

原因，在于它們各有自己的特点本質，各有自己的發展規律；但是，“各有自己的發展过程”并不能够由此而断定它們之間是否存在着联系和联系的性質如何。

“語言”和“共同的語言”的“早熟”并不能推断民族語也“早熟”，誰都知道，这三个概念是不相同的，應該加以严格区别而不能混为一談：“共同的語言”不一定是“民族語”，后者仅是前者的一种；而“語言”这个概念的内容要比“民族語”的内容更大得多；因此这种論断根本是站不住的。也可見林同志的“根据”仅是概念游戏而已。

其次，林同志还用民族語的三个特征与民族形成并無关系来証明自己的論点。为了說明問題，不得不引一段林同志的話：

民族語有不少特征，統一性（更严格地說，高度統一性）应是其中之一。如果說民族語隨資本主义而出現，那么資本主义时代的民族語應該是極統一的。……民族語与民族的發展可能走相反的方向，只求表面的一致关系，民族語这一逆發展就会从語言學的視綫中遁逃了去，或得不到正确的解釋。

这段話只要稍加推敲，便会有許多叫人想不通的地方：一，民族語既然在资产階級民族形成以后尚未取得“高度統一性”这一个最重要的特征，自然不成其为民族語了；而民族語只可能在社会主义时代才能取得“高度統一性”，也就是說民族語只有在社会主义时代才能形成。这个推論和他的結論很不一致，因为他認定民族語只能先于或同时与民族形成；二，林同志既然認为民族語在資本主义时代“可能走相反的方向”或所謂“逆發展”，那么民族語是在部族阶段，在封建主义时代形成的，而在人类最巩固的共同体——民族形成以后，由于資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發生作用，致使其語言不統一，也就不成其为民族語了。因为一种对全民族并不統一的語言是否能称之为民族語，是人人都知道的。至于为什么在共同經濟生活尚未形成的部族阶段，在自給自足經濟生活的封建时代，統一的民族語倒反而会产生呢？这个問題在林同志看来是很簡單的，因为“民族与民族語各有自己的發展过

^① 見《中国語文》1957年7月号，下引林同志語均同此，不另注。

程”。可是使人模糊的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时代，語言突然会受社会影响而不统一？而在封建时代語言却又突然地不受社会影响而能有“自己的發展过程”呢？这簡直不是在研究問題，而是在隨心所欲地开玩笑。

林同志在談到這個問題时还引証了格拉烏尔院士一段話，可是林同志沒有注意到格拉烏尔院士在那段話前面还有几句很重要的話，这几句話恰恰証明民族与民族語並沒有走“相反的方向”，民族語並沒有什么“逆”社会的“發展”：

这也是众所共知的事实：在人类史中曾經有过统一的时期和分化的时期。在原始公社时期，民族語言有分裂成为几种不同語言的倾向；在奴隶制度时期有过方言集中，某些語言扩展到了宽广的地域；在封建制度时期方言又再起分化；在资本主义时期語言的統一占优势。（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①

格拉烏尔說的是资本主义（民族形成）时期，語言的統一占优势，而不能統一或者說阻碍完全統一的原因，在民族形成以前的封建时代里更严重得多地存在，所以才說“方言又再起分化”。而林同志却錯誤地把资本主义时期語言不占“优势”的分化，当作当时語言發展的全部内容，沒有看到它占“优势”的統一的一面，以至于使他說出“走相反的方向”、“逆發展”的結論。

民族語的高度統一性只可能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才能取得，这可以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得到說明。民族本身是一个历史范畴，建立在社会-經濟基础上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構成。它同部族的差別在于它的內部具有共同的經濟生活，而这个特征又使它的另一个特征——語言發生了变化亦即趋向于高度的統一，这是因为共同經濟生活使民族內部各地区交际日益頻繁，而使各地方言趋于統一的緣故，而“語言的統一和毫無阻碍的發展是使适合于現代資本主义的商業流通获得真正自由广泛的發展，使一切居民能自由而广泛地組成各个階級的一个極重要的条件。”②

这才是民族和民族語在形成过程中的关系。民族語的高度統一性既只能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取得，而反过来又促使民族的生長和發展；它們之間並沒有“走相反的方向”，民族語也沒有什么“逆發展”。

林同志又籠統地把書面形式（文学語言）算作民族語的一个特征。他这样說：

如果說民族語隨资本主义而出現，那么它的書面形式也应该在这时期出現；然而，事实上，如契柯巴瓦所說：“文学語言常常是在民族产生以前很久就形成了。”汉語的文学語言的形式在《詩經》时代已形成，希腊語的文学語言形式在荷馬时代已形成，这怎么能与民族的形成一致起来呢？

文学語言，正如契柯巴瓦所說，是常常“在民族产生以前很久就形成了”，但是，民族形成前的文学語言同民族形成后的文学語言是有重大差別的。

拿汉語來說，在民族尚未形成的年代里，在长达一兩千年的时期中，正統的文学語言是脫离口語很远的“文言文”，而只有在民族开始形成时起（暫以五四运动为界），这种語言已不能符合社会交际的需要，因为民族語的文学語言不是單純的書面形式，而是主要以“口头和書面的形式”服务于全民族，于是“白話文”才代替了“文言文”。俄罗斯的文学語言在民族形成前后也發生了变化：在18—19世紀民族形成以前，俄語正統的書面形式是古斯拉夫語——即古保加利亞語，从罗蒙諾索夫开始，到普希金为止，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古斯拉夫語于是为俄語自己的文学語言所替代。

由此可見，民族形成后的文学語言是不同于以前的文学語言的；它之所以有这种变化，在它自己身上是找不出原因的，只有在社会的發展过程中才找得到原因，換一句話說，民族形成过程賦予文学語言一种区别于以前文学語言的性質，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民族語的文学語言在民族形成前后的变化再度証實了民族和民族語之間存在着“必然关系”，它們是同时形成的。

此外，林同志还用规范化并未与民族同时兴起来証明民族与民族語并無必然关系。这里又是“籠統”这个詞害了林同志。非民族語文学語言的规范化和民族語文学語言的规范化的区别在于：前者只能涉及到書面形式而往往与口語無关，而后者却兩样，因为文学語言是具有口头和書面兩種形式，因此它的规范化也涉及口語。

从上面的分析看来，林同志用来証明民族与民族語之間沒有必然关系的三个特征，正好証實了民族与民族語的形成是一致的。

忽視或者抹煞語言的社会本質是资产階級語言学家的通病，是他們的致命弱点。严格說来，林同志是或多或少地受了他們的影响的。忽視語言的社会本質，看不見語言与社会的关系，使林同志在許多問題上認識片面；把問題簡單化，把一切簡單地归結为語言自身的發展过程，因而“出現許多不妥当的論点”。假使林同志的这些基本論点为語言学界接受的話，那么，許多重要的問題倒真的“会从語言学的視綫中遁逃了去，或得不到正确的解釋”。

我們不必談林同志早期的文章，仅仅拿林同志的这篇文章作例子，也足够說明他这种忽視和抹煞語言的社会本質的观点，比如在談到规范化的时候，他还說：“第一个就是說规范化是汉語自身發展的結果，与

（下轉542頁）

① 《格拉烏尔院士在华学术演講集》，科学出版社，1955年，55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譯本，18頁。

漢語普通話的音節結構

苏联 A. A. 龙果夫 E. H. 龙果娃

本文是作者准备付印的《漢語普通話* 語音学基础的科学实用教材》中一节的概略。撰写这篇論文の观点不是欧洲諸語言所一貫遵循的规范,而是漢語本身,因此本文所依靠的是作为現代中国学者的論著以及注音字母的基础的中国語文学的千百年傳統。近几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家們,結合着汉字改革問題,写了許多有价值的作品,①因而丰富了漢語語音学文献,然而,对这些文献的探索,不包含在本文的課題之内。它的基本目的是讓苏联讀者了解一下漢語普通話語音系統的特点。虽然闡述問題只限于現代漢語的事实,但是在音系描写中也照顧到了历史的根据。

作者希望:这一論文能作为了解漢語語音学的教材之一来使用,并对业已醞釀成熟的汉字改革問題的討論有所裨益。大家知道,中国文字学通常沒有照顧到或忽視了有声語言的那种不易看出的头等重要性的,但是有声語言“…始終是人类社会唯一能作为人們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語言”,②因为“完全沒有語言的材料和完全沒有語言的‘自然物質’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③

I 漢語的基本語音單位

§ 1. 漢語語音系統与俄語不同的地方,首先在于基本語音單位。

大家知道,俄語里以詞或詞的部分(詞素)的形式表示某种意义的最小語音單位的是單个的音素,即輔音或元音。例如,輔音 *c* 能够表示前置詞或動詞前綴的意义,元音 *и* 表示連詞或变格詞尾的意义。謝尔巴院士指出,采用“音位”(Фонема)这一术语的目的,正是为了強調各种語音的語言学本質,即強調这样一点:每一單个的音素在該种語言中均能表示某种意义。④

与俄語不同,漢語里能够表示某种意义的即作为詞或詞的一部分(詞素)来运用的最小語音單位,不是單个的語音(音位),而是声調化的音節,即音節單位(силлабема)。⑤例如,音節 [gāu¹] ⑥表示“高”,音節 [dʒa¹i] 表示“在”,在 [i¹dʒz] “椅子”或 [dʒʊ¹i¹] “桌椅”这些詞中,音節 [i¹] 表示詞根詞素“椅”,音節 [-lə] 可以表示动作完成的意思,等等。

§ 2. 俄語里音位的特点不仅在于大部分均具有独立的意义,而且在于它們全都可以用来区别詞义;試比較 год (年)和 кот (猫), там (那里)和 том

(卷), 諸如此类。⑦ 漢語的整个音節只有其中的第一种功能,音節的結構成分——声母(其中包括零声母)和韵母才具有第二种即区别意义的功能。声母是一个音節的起头,韵母包含所有其余的东西。音節的这些成分整个兒組成了一个整体,即音節單位,只是在發音时带有某种重音,即所謂“声調”,⑧ 声調同时又担负着区别意义的功能。下面我們来举例說明。

1) 声母不同的音節: [gāi¹] “盖”, [mai¹] “卖”, [ai¹] “爱”; 2) 韵母不同的音節: [mi¹] “米”, [ma¹] “馬”; 3) 声調不同的音節: [mai¹] “买”, [mai²] “卖”。

漢語音節之所以能分成声母和韵母,在于:沒有韵母,声母就不能构成音節,⑨ 而韵母甚至在純粹的形式中(指帶零声母)也可以单独地构成声調化的音節,因此,它通常可以作为一个詞或詞的一部分(詞素)而具有某种意义。例如, [ai¹] 意思是“爱”, [u¹] 可以有詞根詞素“五”的意义,例如在 [u¹ gə] “五个”一詞中的“五”。

漢語音節的二分法,是中国千百年来非常流行的韵書的基础。在这些韵書中,詞彙材料不是按字形原則或表意原則編排,而是按韵目編排的。

*按原文为 КИТАЙ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ЯЗЫК, 依字面应譯为“國語”,現一律改譯为“漢語普通話”——譯者。

① 例如,罗常培、王均合著的《普通語音学綱要》(科学出版社,1956年);董少文的《語音常識》(文化教育出版社,1956年);黎錦熙的《論注音字母》(見《中国文字改革問題》論文集,1954年,第2版)。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文本,46頁。

③ 同上書,38—39頁。

④ 見《俄語語法》卷I,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53年,12頁。关于音位是最小的表义的語音單位,參看謝尔巴《俄語元音的質和量》,聖彼得堡,1912年,5—8頁;津杰尔(Л. Р. Зиндер):《謝尔巴和音位学》,載《謝尔巴院士紀念文集》,列宁格勒,1951年,63—72頁(特別是66—67頁);津杰尔和馬圖謝維奇(М. И. Матусевич):《音位学說史》,載《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与語言学部)》,1953年,12卷,第1期,62—75頁。

⑤ “音節單位”这一术语借用自波里瓦諾夫(Е. Д. Поливанов),參看他的《現代漢語語法》,莫斯科,1930年。

⑥ 音标旁边的小数字表示声調(按通行標記法)。

⑦ 參看《俄語語法》,I卷,12頁。

⑧ 根据这里所說的,由音位和音節單位类推,声調可以叫做調位。关于声調的区别問題將在專文中探討。

⑨ 关于 [-z] [-ʒ] 的音節,見 § 26 及 § 51。

根据这一分法，制定了一般汉语字典所采用的一套系统，所谓“反切”法，这种古老的，然而在这方面至今尚未过时的巧妙的方法，是利用两个大家熟悉的字去注某一个汉字：这时从第一个音节取其声母（其中包括零声母），从第二个音节取其带有相应声调的韵母，例如：某字念 $t^c(a\dot{i}) + (s)an^1$ 即 t^can^1 ；某字念“零声母”(an)+(k^c) αu^3 即 αu^3 ，等等。

汉语的注音字母也是考虑到用这种二分法来制定的。

§ 3. 声母不外乎就是一个辅音，它可以是（送气或不送气的）简单辅音，如：[s-]，[g-]，[t^c-]，[m-]，或是复合辅音，如：[dz-]，[tš^c-]；与俄语不同，现代汉语里没有任何辅音群。（声母系统将在下文§§8—14中描述）

§ 4. 韵母可由一个构成音节的元音组成，有时也可以由半二合元音组成，例如：[-a]，[-ə^h]，[-i]，但也可以包含非音节的成分。（韵母系统将在下文§§13—49中详细描述）

[-u] 和 [-i]，或 [-n] 和 [-ŋ]，① 都是韵母的收尾成分，它们跟成音节的元音合在一起构成各种下降的二合元音，例如：[-ou]，[-ai]，[-ən]，[-aŋ]等。至于那些位于成音节元音之前，因而把它和声母隔离的非音节成分，如 [xuα]，[miαu]，[lʃan]，它们叫做介音或“间隔半元音”，对这些成分应进行专门的研究。

§ 5. 介音构成下列系统，其中也包括零介音，就是说成音节元音直接和声母结合，比如 [g^han]（或者，在零声母的情形下，音节元音就是一个音节的起头，例如 [ən]）。

| 舌 位 | 唇 形 | |
|-----|-------|-------|
| | 非圆唇 | 圆 唇 |
| 硬 | 零介音 | [-u-] |
| 软 | [-i-] | [-y-] |

表 1

介音与收尾的非音节成分比较起来，具有更大的自主性，这可由以下两点看出：

1) 拿介音来相互区别的韵母（例如：[-an]，[-uan]，[-iæn]，[-yan]），都是押韵的；

2) 介音可以具有构成音节的性质，因而具有声调，换句话说，它们能以 [-u] [-i] [-y] 的形式同作韵母，例如在下列单词中：[lu⁴] “路”，[mi³] “米”，[y³] “雨”，等等。

介音进入韵母的结构之内，就形成了三合元音和上升二合元音，丰富了汉语的元音系统。同时，许多方言里发生的韵母单元音化过程并没影响到介音：它们或是保留下来，或是在声母顎化（或唇化）的过程中被声母吞并。这样看来，辅音与介音直接为邻的这一事实，对于汉语辅音系统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 6. 可见，汉语普通话的元音音位系统是由以下两类音位组成的：

- 1) 具有双重功能的介音，
- 2) 不带介音的韵母。

汉语音节结构成分和音位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详细情况，将在表13中说明。

§ 7. 既然声母和韵母（后者包括介音）是音节单位的组成部分和结构成分，所以在阐明汉语语音系统时不能只限于列举这些单独的结构成分，而且也需要提出一个音节本身的系统。在许多（现代的和以前的）汉语语音学论著中，通常是把声母排列在一个坐标上，把韵母排列在另一个坐标上，而在表的内部，即这些坐标的交点上，则填上某方言里实际存在的不分声调的音节。②

既然汉语的音节只有在具有某种完全的，或是能化的（所谓中性的）声调的情况下才能表示某种意义，所以无论是汉语普通话的，或是汉语的任何一个方言的音节系统的全貌，都应该包括声调的差别。③

II 声母系统

§ 8. 汉语普通话的声母系统可以用下表来说明。

| 发 音 方 法 | 发 音 部 位 | 发 音 方 法 | | | | |
|------------------|------------------|-------------------|-------------------|-----|---------|-----|
| | | 噪 | | | 响 | |
| | | 塞音、塞擦音 | | 擦音 | 鼻 音 | 非鼻音 |
| | | 送气 | 不送气 ④ | 清音 | | |
| 第一系统 (单纯声母) | 唇音 | p ^c - | b- | f- | m | |
| | 舌尖音 | t ^c - | d- | | n- | l- |
| | 舌根音 | k ^c - | g- | x- | 零(见§11) | |
| 第二系统 唏音 尖音 | 舌 | 前音 (唏) | ts ^c - | dz- | s- | |
| | 后音 (唏) | tš ^c - | dž- | š- | | ř- |

表 2

① 关于 [-ɪ] 收尾音节，见 § 51。

② 在苏联汉学的文献中，这一种语音表（不分声调）可以拿郭质生（B. C. Колоколов）教授的《汉俄简略辞典》（1935 和 1937 年）中的语音表或我们著的有关描写湖南省方言的论文中的表为例。《苏联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学部）》，第 3 期，1932 年，254—257 页。并请参阅表 17。

③ 十一世纪著名的中国学者司马光编的语音表可以作古典的例子。现代中国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拿黎锦熙主编的《国音常用字彙》（上海，1949 年）中的语音表为例。

从上表可以看出,汉语声母即开头辅音音位(共19个)④分为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构成两个并行的平面;第一系统是由12个声母组成的,它们与组成第二系统的4个唏音和3个嘛音不同,可以称为单纯声母。整个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区别,以及行与行之间的区别,都表现在某些辅音和元音的组合性上。

首先,只有单纯声母才能和韵母[-ei]②结合。也可以反过来说:只有在第二系统的声母之后才可有零韵母,零韵母在一个未经受过语音训练的人听起来会产生元音[u]的印象(实际上这是嘛音之后成音节的[-ʔ]或唏音之后成音节的[-ʃ],参阅§26)。

其次,声母各行之间很重要的差别,表现在它们和某些介音的结合上(见§5)。这个问题我们将详细分析。

§9. 表的上面一行包括的唇音有[p^c-][b-][m-]和[f-]。它们和其他几行之所以不同,这是由于异化作用的结果,在它们后面不能有介音(除了负担韵母功能的[-u]以外,见§35)。

在(成音节的或不成音节的)元音[i]之前,辅音[p^c-][b-][m-]不软化,比如,[p^cie][biŋ][mi],但是[f-]和元音[i]一般是不相结合的。④

§10. 表的第二行包含单纯的舌尖阻塞音[t^c-][d-]和响音[n-][l-]。响音[n-]和[l-]可以和任何介音相结合,比如[lan][lan][liæn][lyan][ly],而[t^c-]和[d-]除介音[-y-]以外可以和所有介音相结合,比如[t^can][t^cuan][t^cæŋ]。

这一行的所有辅音,象唇音一样,在与[i]和[y]结合时,它们不软化,比如[t^ciæn][di][ny]。

§11. 象声母[n-]和[l-]一样,“零声母”也可以和任何介音相结合,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它实现的方法是不同的。在“零介音”的场合下,音节或是拿[ʔ-]起头,或是拿喉塞音[ʔ-]起头,或是拿[ŋ-]起头,或是直接拿元音起头(例如,[ʔa^]=[ʔa^]=[ŋa^]=[a^]),但是所有这些不同的语音变体(Anlaut)都是“零”音位。⑤有其他的介音时,或者出现起头的元音,或者出现某些擦音化的介音(例如:[uan]||[waŋ],[in]||[jin],[y]||[jy])。

§12. 舌根辅音[k^c-][g-][x-],象唏音[tš^c-][dž-],[š-][ř-]⑥一样,在北京话里不跟前元音[i]和[y]结合;关于舌根音的进一步说明,请参阅下文。

§13. 与唇音和前元音之前不发生颚化的单纯舌尖音相反,汉语中的嘛辅音具有两种显著不同的联合变体——“零介音”和[-u-]之前的硬辅音[ts^c-],[dž-][s-]的联合变体和介音[-i-] [-y-]之前的软辅音(嘛唏音)[ts^c-],[dž-],[š-]的联合变体。

在汉语普通话中,拿这些软辅音起头的不仅有历

史上来自嘛辅音加前元音的音节,而且还有来自舌根辅音加前元音的音节,即来自[k^ci][gi][xi]和[k^cy][gy][xy]⑦等类型的语音组合。因此,北京话中[ts^c-][dž-][s-]这一列派生的软嘛唏辅音是跟基本的两列硬辅音即[ts^c-][dž-][s-]和[k^c-][g-][x-]相对应的。

在其他的北方方言(例如,山东方言)中,情况就一样了:硬辅音[k^c-][g-][x-]在元音[i]和[y]之前时(随方言而不同)是跟单纯的(颚化)辅音的整个音阶(ramma)相对应的。此外,还有这样一些汉语方言,其中历史上的“软介音”之前的舌根音不跟单纯的辅音相对应,而跟软唏音[tš^c-][dž-][š-]相对应。

§14. 每一位汉语研究者,都应该认真地注意到划清那些有双重起源的软辅音的界线,并且要从普通

④ 这些辅音的特点在于:要是按有无噪音的特征来说,它们属于清音的范畴,要是按气流强弱的特征来说,它们则是弱辅音,就是说在这方面和濁音没有区别,因此,在语音学论著中,它们或是叫做半濁音,或是叫做弱清音(lenes)。这样看来,我们这个表中头一行和第二行辅音之间的差别,不在乎音的清濁,而在乎有无送气。对此应补充一句,北京话的摩擦音全是清音,即没有相应的濁音;换句话说,汉普通话語的辅音没有清濁音的对立。甚至在保留濁辅音的情况下(在吴方言和湘方言中),音节的对立也不在声母的清濁上,而是在不同的声调上。关于这点请参阅前页注②所说的我们所著的论文,247—250页。(514页)

① 关于辅音音位的颚化变体,参阅 §§13—14。

② 关于[dzei²][sei¹]和[šei²][su²i²]等词,参阅531页注②。

③ 在这里[-ou]和[-u^o]似乎是一个例外;可是我们从下文(§23)可以看出,问题在于没有唇介音的二合元音[-ou]在汉语音系中不包括在唇韵母一类之内,而唇声母之后的[-u^o]则是[-ə^o]的一个联合变体(参阅§21)。

④ 问题在于,声母[f-]的发生刚好是由于唇声母吸收唇颚化介音的结果。

⑤ 为了声母表的紧密起见,“零声母”放在[ŋ-]的一格里。

⑥ 响音[ř-]是英语型的舌尖后非颤音“r”,带有俄语ж型音的某些色彩,不仅仅由于现代汉语里有这种发音特点,而且还有历史根据把这个响音和唏噪音放在表的同一行内。然而,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像人们通常所想的那样,似乎[ř]是与清响音[š-]对应的一个濁响音。(关于收尾的[(ə)ɹ],见§51)。

⑦ 前列元音之前的舌根音,早在元代(即公元13—14世纪)在某些北方方言中开始颚化,最先发生颚化的是[x-],而不是塞辅音。使我们了解这个时代的发音的基本史料之一(用波斯文标音的中国医学论著)表明,在当时前列元音之前的[x-]已经发生了颚化,以至于需要用一个专门的字母去表达软摩擦音。参阅龙果夫《用波斯文标音的古代官话》,载《苏联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学部)》,1931年,363页。

教育和实践方面去考虑，其中首先有下列几点是需要考虑的。

假如不估计到这种区别，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欧洲语表达某些中国地名的历史传统形式，首先不能理解中国首都“北京”这个名称本身，因为它读作 [bɛi'ŋ¹]，而现在这个词在北京当地是读作 [bɛi'ʒiŋ¹]。

现代汉字表达非汉语的专有名词和地名的方法，传统上也建立在这种区别点上，例如，管“高尔基” (Горький) 读作 [gɔɹɔɹdʒi]，实际上是 [gɔɹɔɹg'i]，或者管“加拿大” (Canada) 读作 [dʒi'anaɹa]，实际上是 [dʒi'anaɹa]。

上述两列语音的区别，在1920年的规范词典《国音词典》中正式地记载下来，并且不仅在汉语拼音字母第一式的注音字母及“罗马字”中得到了反映，而且在汉语拉丁化正字法中也得到了反映 (比如，ki—ci, gian—zian, xiao—siao)。这种区别也在上面提到过的郭质生教授的辞典所采用的音标中得到了反映 (比如，тъи—ци, дьянь—дзянь, съяу—сяу)。在本文中这种区别由表16和17来说明。

III 韵母系统

§ 15. 汉语普通话的韵母系统 (假如谈的正是它们的系统，而不是简单的列举) 远不如声母系统那样简单，它具有一系列非常值得研究的特点，即使是暂时不提弱化问题和所谓儿化韵的派生系统问题。

汉语韵母 (总数35个) 系统首先可分成三类；其中二类是平行五项式 (“a”类和“ə”类)，一类是不成对的、单项式 (“零”类与“ə”类相毗连)。作为“a”类基础的有韵母 [-a] [-an] [aŋ] [-au] [-ai]；作为并列的“ə”类基础的有韵母 [-ə¹] [-ən] [-ɛŋ] [-ou] [-ei]；作为“零”类基础的有零韵母 (在有构成音节的辅音时)。

此外，每类韵母在某种程度上均有赖于介音 (§5)；有零介音时，韵母以它的基本形式出现，而有介音 [-y-], [-i-], [-y-] 时，韵母则以相应的变体出现，这变体我们将在下文中加以描述 (归并在表13中)。

1. 开口韵

§ 16. 五项式的“a”类和“e”类的基本韵母，组成下列小体系，而单个“零”类与“ə”类相毗连。

| “a”类 | | “ə”类 | | “零”类 |
|-----------------|-----|-----------------|-----|---------------------|
| -a ¹ | -au | -e ¹ | -ou | -ʔ, -ʔ ¹ |
| -a | | -ə ¹ | | |
| -an | -aŋ | -ən | -ɛŋ | |

表 3

§ 17. 韵母 [-a] 位于“a”类基本韵母小体系

的中心，它就是所谓中 [a]，不需要特别地加以说明；例如：[ba] [xa]。

§ 18. 韵母 [-an] 和 [-aŋ] 是鼻化二合元音；前者发音时带前 [a]，后者发音时带后 [a]。

§ 19. 韵母 [-au] 在北京话里是下降二合元音，拿后 [a] 起头，拿非音节的 [-u] 或 [-o] 收尾。韵母 [-ai] 是下降二合元音，拿前 [a] 起头，拿非音节的 [-i] 或 [-e] 收尾。

这样看来，在北京话里，二合元音的结构中有前 [a] 还是后 [a] 与二合元音的第二个成分的性质有关：假如这是一个前列成分，即 [-i] 或 [-n]，那末二合元音拿前 [a] 起头；假如这是一个后列成分，即 [-u] 或 [-ŋ]，那末二合元音则拿后 [a] 起头。

§ 20. 北方和西北许多方言里，有几个单元音 [-ã] [ã] [-ə] [-ɛ] 是和上面已经描写过的“a”类的二合元音即 [-an] [aŋ] [au] [-ai] 相对应的，这无非使相互通话多少发生困难，或者引起那些把这些音节读作二合元音的对话者的注意。

上述情形是由于：在某些汉语方言的音系中，单元音 [-ã] [-ã] [-ə] [-ɛ] 等占有和另一些方言的二合元音 [-an], [-aŋ] [au] [-ai] 等所占有的同一地位，并且很重要的是，大致在同一词根中出现。对于交谈者重要的是，韵母 [-au] || [-ə] 之所以不同于单纯的 [-a]，在于它含有某种唇化的成分 (或是集中在元音的音尾上，或是分布在它的整个长度上)，而韵母 [-aŋ] || [-ã] 则含有鼻化的成分；唇化或鼻化是怎样表现的，从方言之间的角度来看是次要的问题：在北京话中，它集中在二合元音——[-au] [-aŋ] 的第二个成分上，在其他方言中，它分布在读作 [-ə] 和 [-ã] 的整个元音上。这既与成对的音 [-ai] || [-ɛ] 和 [-an] || [-ã] 有关，又与“ə”类的所有下降二合元音有关 (关于这些下降二合元音将在 §§ 22—25 中谈到)。^①

可见，假如不仅照顾到了北京话，而且也照顾到了北方的其他方言，那末“a”类基本元音的小体系就要采用下列的形式。

某些方言的变体

概括

| | | | |
|----------|----------|-----------------|-----------------|
| -ai -ɛ | -au -o | -a ¹ | -a ^u |
| -a | | -a | |
| -an -ã | -aŋ -ã | -a ^u | -a ^ɹ |

表 4

§ 21. 韵母 [-ə¹] 位于“ə”类基本元音的小体系的中心 (见表3)，在北京话里，它有两种发音方法：在非唇辅音 (其中包括零辅音) 之后，韵母 [-ə¹] 以

① 因此，用单一的圆形单位来表达每一个开口韵的汉语注音字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方言际的性质。

“ə”的各种变体出现，即 [-ə^h] [-ə^o] (例如，在 [ə^h] [ə^oə^h] [ə^oə^h] [lə^h] 等音节中)；而在唇辅音之后，韵母 [-ə^h] 发生了唇化，所以读作 [-uə^h]① (例如，[m^oə^h] [f^oə^h])。

§ 22. 韵母 [-en] 和 [-ən] 是两个鼻化二合元音；后者带有 ɤ 型色彩，但通常也读作 [ən]。可见，当“a”类鼻化二合元音不仅在非音节成分的发音部位上，而且在成音节成分的音色上彼此有所差别时，“ə”类各种相应的二合元音之间的差别，不是十分明显的；这两个韵母许多方言里发展成鼻化单元音，而鼻化单元音在某些方言里就归并成一个共同形式 [ɛ]。

§ 23. 韵母 [-ou] 是一个下降二合元音，拿 ə 型 [o] (第一和第二声较闭，第三和第四声较开) 起头，拿非音节的 [-u] 收尾；这个二合元音在发音时常常带有非圆唇的 [o]；单元音化的趋向在这里表现在 [ə] 成分的弱化上。必须指出，现代北京话的 [-ou]，即音位 [-əu]，不是圆唇元音。这点将在 §§ 28—35 中谈到。

§ 24. 韵母 [-ei] 是一个下降二合元音，拿 [e] (第一和第二声比第三、第四声较闭) 起头，拿非音节的 [-i] 收尾；在某些方言里这个韵母发 [-i] 的音。

§ 25. 这样一来，“ə”类基本元音的小体系可以写成下列形式。

| 某些方言的变体 | 概括 |
|--|--|
| <div> <div>-ei i -ou -ou</div> <div>-ə^h</div> <div>-en ɛ -ən ɛ</div> </div> | <div> <div>-ə^h -ə^o</div> <div>-ə</div> <div>-ə^h -ə^o</div> </div> |

表 5

§ 26. 在现代汉语中，与 [-ei] 有密切关系的零韵母 (参阅 § 8)，只出现在硬腭辅音和硬齿辅音之后，并受它们制约；② 它是以一个特殊的所谓舌尖音的形式实现的，但在声学 and 发音方法上并不等于俄语的元音 ɤ，而是摩擦音中腭音和齿音的成音节的变体；它可以具有声调，同时它常常有两种分体，这要看它的前面是腭辅音还是齿辅音：在腭辅音之后，零韵母以构成音节的 [-ʝ] 的形式实现，例如 [sʝ] (思)；在齿辅音之后，零韵母则以构成音节的 [-ʑ] 的形式实现，例如 [dʑʑ] (知)，[ʃʑ] (日) (见 § 51)。③ 在一定条件下的某些非重读的音节中，这些构成音节的辅音，象“零”类的所有其他韵母一样，在发音时是不带声的，往往完全弱化；[iəu⁴ sʑ] (钥匙) 可以念作 [iəu⁴ s:]，[dɔu⁴ fu] (豆腐) 可以念作 [dɔu⁴ f:]，等等。

2. 带介音的韵母

§ 27. 上面我们已经探讨了五项式的“a”类和“ə”类的基本韵母，以及零韵母。这三类音，每一类都可以有和介音有关的四种形式。我们刚刚分析过在

“a”类和“ə”类中，这四呼之间的区别在于：韵母直接和声母 (这里也包括“零辅音”) 相结合呢，还是在前面有一个不构成音节的间隔要素 [-u-]，[-i-] 或 [-ʝ-]。我们来比较下列例子。

“a”类韵母在四呼中保持稳定，而“ə”类韵母随介音的不同发生很大变化 (这在下文中还要分析到；特别请参看表 13)。

| | | | |
|---|------------|---|------------|
| 开 | s an | 合 | s u an |
| 齐 | s i æn | 撮 | s ʝ an |

表 6

“零”类对介音的

依从关系表现在：由于没有基本元音，因此具有成音节功能的正是这些间隔成分，它们以相应的成音节元音 [-u]，[-i] 和 [-y] 出现，在这样的音节中，这些元音就是韵母，而不是介音，例如：[xu]，[mi]，[ly]。

合口韵

§ 28. “a”类合口韵组成下列小体系。

从表 7 可以看出，在非音节的介音 [-u-] 之后，有一些“a”类的不变形的韵母。④ 例如：[xuə]，[k^huəi]，[ts^huən]，[uən]。

| | |
|------|------|
| -uəi | — |
| -uə | |
| -uən | -uən |

表 7

§ 29. 在“ə”类合口韵里，情形略有不同，因为这些韵母组成下列小体系 (与它毗连的是“零”类唯一的圆唇音 [-u])。

§ 30. 我们研究这一小体系是从韵母 [-uei] 来着手的。假如这个韵母就是一个音节，也就是说在它

| | |
|------------------|------|
| -uei | — |
| -ue ^h | |
| -uən | -uən |

表 8

前面的是一个零声母，那末这个韵母在四声中发音的完全形式就是一个三合元音 [uei] [uei]。至于在辅音之后，该韵母依赖于声调：它发第三声和第四声时具有完全形式 [-uei³]；发第一声和第二声时音节峰转变为 [u]，而成分 [ə] 只起从属的作用，于是该韵母就发成 [-uei^{1,2}]。

§ 31. 韵母 [-uən] 中的成分 [ə] 还要弱一些，

① 我们在下文 (§ 34) 将看到，它因而和那些不跟在唇辅音后面的合口元音 (除了 [-u] 之外) 的各成分相一致。试比较表 16 和 17。

② 因为它在这些辅音后起源于 *i。

③ 成音节的 [-ʝ] 和 [-ʑ] 在注音字母和汉语拉丁化方案中不表示出来，比方，[sʑ³] (死) 和 [ʑ⁴] (事) 这两个词在拉丁化正字法中，写成 s 和 sh。

④ 必须指出对于理解汉语整个音系很必要的下列情况：在这个小体系中 (下文所要分析的小体系也一样) 不存在收尾非音节成分与该小体系的介音非音节成分相一致的三合元音 (具体说，这里没有与 [du] 的合口对应)。

它只有在有零輔音的情況下，才發成音節元音的音，在四聲中都是[$\text{u}\text{ən}$]||[$\text{w}\text{ən}$](它是帶零介音的該韻母[-ən]的一個精確的相應音)。音節有聲母時，成分[ə]的第三聲和第四聲弱化，因而韻母發成[- $\text{u}^{\text{ə}}\text{n}$]；第一聲和第二聲的[ə]往往完全消失，於是韻母發成[- un]。①

§ 32. 韻母[$\text{u}\Delta\eta$]中的成分[ə]弱化的程度更進了一步，該韻母只在零聲母後發完全形式的音：在四聲中都是[$\text{u}\Delta\eta$]||[$\text{w}\Delta\eta$](這是帶零介音的該韻母[- $\Delta\eta$]的一個精確的相應音)。音節有聲母時，在四聲中都發成[- $\text{u}\eta$]，於是成分[ə]完全消失。

§ 33. 上述三種“ə”類的合口韻，可歸納成下表。

| 有 聲 母 | | 零 聲 母 | 音 位 上 |
|------------------------------------|------------------------------------|---|---------------------------|
| 第一、二聲 | 第三、四聲 | 一、二、三、四聲 | |
| [- $\text{u}^{\text{e}}\text{i}$] | [- uei] | [uei] [wei] | $\text{u} \text{ei}$ |
| [- un] | [- $\text{u}^{\text{ə}}\text{n}$] | [$\text{u}\text{ən}$] [$\text{w}\text{ən}$] | $\text{u} \text{ən}$ |
| [- $\text{u}\eta$] | [- $\text{u}\eta$] | [- $\text{u}\Delta\eta$] [$\text{w}\Delta\eta$] | $\text{u} \text{ə}\eta$ |

表 9

韻母[-ən][$\text{u}\eta$]的音位結構可以從它們的所有語音變體的對比中得出：這些韻母不是完整不變的，而是可分裂成[- $\text{u} : \text{n}$]和[- $\text{u} : \eta$]，這裡的[u]是介音[- u -]的成音節變體，而[n]和[η]是韻母[-ən]和[$\Delta\eta$]的非音節變體(見表13)。②

§ 34. 韻母[- $\text{u}\text{ə}^{\Delta}$]，音位學上是“ə”類韻母圓唇音小系統中央的- $\text{u}|\text{ə}$ ，它的語音構造與聲調無關：有零聲母時，這個韻母發[$\text{u}\text{ə}^{\Delta}$]，舌根音後發[- $\text{u}\text{ə}^{\Delta}$]而舌尖音後發[- $\text{u}^{\Delta}\text{ə}$]；如[$\text{u}\text{ə}^{\Delta}$][$\text{xu}\text{ə}^{\Delta}$][$\text{ʃu}\text{ə}^{\Delta}$][$\text{d}^{\Delta}\text{u}\text{ə}^{\Delta}$]。

因此，在現代北京話里，(舌尖音後的)這個合口韻成分與唇輔音後的開口韻各成分的圓唇音變體造成了語音的相同性(見§ 21和表16,17)。③

§ 35. “零”類唯一的合口呼成分——[- u]；它是負擔韻母作用的介音，例如[ʃu]。在合口韻中，只有[u]才出現在唇輔音之後，例如[bu]。

齊口韻

§ 36. “a”類的齊口韻組成下列一個小體系：

由右面這個小表中可以看出，“a”類的齊口韻，在成音節元音的性質上一般與該類開口、合口韻沒有區別；只有[- $\text{i}\text{æ}\text{n}$]需要特別說明，在這裡[æ]受到了

| | |
|------------------------------|-----------------------|
| (iai)④ | - iau |
| | - ia |
| - $\text{i}\text{æ}\text{n}$ | - $\text{ia}\eta$ |

表 10

[- i -]的影響。至於談到介音，非成音節的[- i -]在舌尖輔音([t^{c} -],[d -],[n -])之後常常讀作[x -]，而在[l -]之後甚至讀作閉元音[- ə -]。

§ 37. “ə”類齊口韻(在與合口韻保持一定的並行關係時)大大脫離了與開口韻的並行關係，組成下列小

體系(接近這個小體系有“零”類唯一的齊口音[- i])。

| | |
|---------------|------------------|
| - | - iou |
| - ie | |
| - in | - $\text{i}\eta$ |

表 11

§ 33. 韻母[- in]和[- $\text{i}\eta$]是 $\text{i}|\text{ən}$ 和 $\text{i}|\text{e}\eta$ 兩個音位，在這些韻母中語音成分[ə](我們已見過，這是一個不太穩

定的音，試比較§§29—33)完全消失了。和韻母[- un]和[- $\text{u}\eta$]一樣，韻母[- in]和[- $\text{i}\eta$]不是一些完整的音，而可以分解成[- $\text{i} : \text{n}$]和[- $\text{i} : \eta$]，在這裡[i]是介音[- i -]的音節變體，而[n]和[η]是韻母[- an]和[$\Delta\eta$]⑤的非音節變體。韻母[- in]和[- $\text{i}\eta$]不需要特殊的闡述；某些方言里它們是不分的。在零聲母的情況下，介音常常發生摩擦，這就是說，除了[- in]和[- $\text{i}\eta$]以外，也讀作[jin]和[$\text{j}\text{i}\eta$]而無意義變化。

§ 39. 韻母[- iou]||[- $\text{i}^{\text{o}}\text{u}$]是音位 $\text{i}|\text{əu}$ ，在這裡語音成分[ə]讀法不一：或者讀作[- o]（第三聲和第四聲），或者讀作[- ə -]（第一聲和第二聲）。

§ 40. 最後，韻母[- ie]是音位 $\text{i}|\text{e}$ ，語音成分[ə]讀作開元音[e]（試把合口韻中的[- $\text{u}\text{ə}^{\Delta}$]，音位 $\text{u}|\text{ə}$ 與這點進行比較，§ 34）。

§ 41. “零”類中唯一的齊口成分[- i]；它是用作韻母的一個介音，例如[ni]。

撮口韻

§ 42. 在“a”類里，撮口韻只有一個韻母[- yan]，除介音[- y -]外，它與[- an][- uan]沒有什麼不同。

§ 43. “ə”類里撮口韻比較豐富，並組成下列小體系(接近這個小體系的有“零”類唯一代表[- y])。

| | |
|---------------------------------|--------------------------|
| -⑥ | -⑥ |
| - ye | |
| - $\text{y}^{\text{i}}\text{n}$ | - $\text{y}\text{u}\eta$ |

表 12

§ 44. 這個小體系中央的韻母[- ye]，即音位學上的 $\text{y}|\text{e}$ ，是與韻母[- ie]，即音位學上的 $\text{y}|\text{ə}$ 相對應的

① 在舌根音[k^{c}][g^{c}][x -]之後，四聲都往往保留[ə]。

② 在注音字母中，韻母[- un]和[- $\text{u}\eta$]以 $\text{u}+\text{ən}$ ($\text{x}\eta$)和 $\text{u}+\text{ə}\eta$ ($\text{x}\Delta$)來表達。

③ 在注音字母中，[- $\text{u}^{\Delta}\text{ə}$]在唇輔音之後由一個相當於 o 的注音字母(ㄛ)來表達，而在其餘情況下，則由相當於 $\text{u}+\text{o}$ 的字母組合($\text{x}\text{ㄛ}$)來表達。

④ 必須指出，三合元音[iai]只是現代北京話一個詞素(並且還是作為該詞素發音的一個變體：這一例說明收尾非音節成分與介音非音節成分相一致的三合元音在每個小體系中都已消失。

⑤ 在注音字母中，韻母[in]和[$\text{i}\eta$]由對應於 $\text{i}+\text{ən}$ ($\text{i}\eta$)和 $\text{i}+\text{ə}\eta$ ($\text{i}\Delta$)的字母組合來表達。試比較注②。

⑥ 在這裡(在“a”類的撮口呼中也一樣)沒有帶收尾非音節[- u -]和[- i -]的三合元音，因為介音[- y -]本身把這兩個音結合在一起了。

| | | | | | | | | | | | |
|---------------------------|---|-----|---------------------------|-----|-----|---|---|------|----|----|----|
| 原来的介音和 作为“零”类韵 母的介音 | 作为介音① | | 作为韵母 | | | | | | | | |
| | <table border="1"> <tr> <td>-零-</td> <td>-u-</td> </tr> <tr> <td>-i-</td> <td>-y-</td> </tr> </table> | -零- | -u- | -i- | -y- | = | <table border="1"> <tr> <td>-(u)</td> <td>-u</td> </tr> <tr> <td>-i</td> <td>-y</td> </tr> </table> | -(u) | -u | -i | -y |
| -零- | -u- | | | | | | | | | | |
| -i- | -y- | | | | | | | | | | |
| -(u) | -u | | | | | | | | | | |
| -i | -y | | | | | | | | | | |
| 音位及其变体 | 零 零 u (即 z, ȝ); | | u i y u u; i i; y 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类韵母 | <table border="1"> <tr> <td>-a</td> <td>-u a</td> </tr> <tr> <td>-i a</td> <td></td> </tr> </table> | -a | -u a | -i a | | <table border="1"> <tr> <td>-an</td> <td>-u an</td> </tr> <tr> <td>-i an</td> <td>-y an</td> </tr> </table> | -an | -u an | -i an | -y an | <table border="1"> <tr> <td>-aŋ</td> <td>-u aŋ</td> </tr> <tr> <td>-i aŋ</td> <td></td> </tr> </table> | -aŋ | -u aŋ | -i aŋ | | <table border="1"> <tr> <td>-au</td> <td></td> </tr> <tr> <td>i au</td> <td></td> </tr> </table> | -au | | i au | | <table border="1"> <tr> <td>-ai</td> <td>-u ai</td> </tr> <tr> <td>(i ai)</td> <td></td> </tr> </table> | -ai | -u ai | (i ai) | |
| | -a | -u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 | -u a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an | -y a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ŋ | -u a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a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a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i | -u a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a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音位及其变体 | a a | an an an | aŋ aŋ | au au | ai a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ə”类韵母 | <table border="1"> <tr> <td>-ə^</td> <td>-u ə^</td> </tr> <tr> <td>-i e</td> <td>-y e</td> </tr> </table> | -ə^ | -u ə^ | -i e | -y e | <table border="1"> <tr> <td>-ən</td> <td>-u ən</td> </tr> <tr> <td>-i n</td> <td>-y n</td> </tr> </table> | -ən | -u ən | -i n | -y n | <table border="1"> <tr> <td>-aŋ</td> <td>-u aŋ</td> </tr> <tr> <td>-i ŋ</td> <td>-y uŋ</td> </tr> </table> | -aŋ | -u aŋ | -i ŋ | -y uŋ | <table border="1"> <tr> <td>-ou</td> <td></td> </tr> <tr> <td>-i u</td> <td></td> </tr> </table> | -ou | | -i u | | <table border="1"> <tr> <td>-ei</td> <td>-u ei</td> </tr> <tr> <td></td> <td></td> </tr> </table> | -ei | -u ei | | |
| | -ə^ | -u 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e | -y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ən | -u ə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n | -y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ŋ | -u a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ŋ | -y u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i | -u e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音位及其变体 | ə e^ ə^ s | ən ən ən n n | aŋ aŋ ŋ uŋ② | ou ou u | ei ei ei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3

(見 § 49)。在某些詞根里除 [-ye] 以外，还發 [-yo] 的音，例如 [lye] || [lyo]。

§ 45. 韵母 [-y¹n] 和 [-y¹uŋ] 的讀法需要作某些說明：在韵母 [-y¹n] 即音位 y¹ən 中，語音成晰 [-¹-] 的發音很弱，很容易完全消失掉（但是在有些方言里，这个音發得非常清晰，并具有音节的功能，于是韵母讀作 [-y¹in]）；韵母 [-y¹uŋ] 即音位 y¹əŋ；常常讀作 [-i¹uŋ]。③

§ 46. “零”类唯一的撮口成分—[-y]，例如[ly]，它是用作韵母的介音，也是同 [-u] 相对应的齐口韵。

3. 元音系統的一般結構

§ 47. 至于談到音位結構本身，汉語普通話里有 14 个元音音位，其中“a”和“ə”类各占 5 个，“零”类占 4 个。后四个基本上是介音，但也可作韵母。至于“a”和“ə”类各个音位，本身可以是韵母（有零介音），或者包含在韵母結構之內（跟其他的介音相結合）。

在表 13 中，詳細地來說明介音、韵母和音位的关系。这里只考虑到与相邻的介音有关的語音变体；那些与声調和相邻的声母有关的变体，不包括在該表之內。

現在举几个把音节分为声母、介音和韵母的例子，音节用音素音标和音位音标拼写（“零”用减号表示）。

| 音素音标 | 音位音标 | 音素音标 | 音位音标 |
|------------|------------|------------------------|------------------------|
| x u an | x u an | ǝ u e ¹ | ǝ u e ¹ |
| s i ən | s i an | x u ə^ | x u ə |

| 音素音标 | 音位音标 | 音素音标 | 音位音标 |
|------------|------------|-------------------------|-------------------------|
| - i au | - i au | n u ə^ | n u ə |
| - w ai | - u ai | m u ə^ | m - ə |
| m - a | m - a | k ^c - ou | k ^c - əu |
| m i - | m i - | - i ou | - i əu |
| - y - | - y - | s u ən | s u ən |
| ǝ - - | ǝ - - | m - aŋ | m - əŋ |
| s z - | s - - | m i ŋ | m i əŋ |
| ǝ i e | s i ə | - y uŋ | - y əŋ |

从我們所列举的音位音标中可以明白地看出，汉语音节的第二个成分（介音）通常都是高元音——无论它是不构成音节的或构成音节的都一概沒有区别，至于韵母（即第三个成分）就其本身而言，都是中元音或低元音（單元音或二合元音）。

§ 48. 至于談到 35 个韵母的系統，从上面的闡述中可以看出，它的結構是很复杂的。

假如为了明显地描写这个系統，我們把韵母的差别作为坐标的第一根軸，可以說，在每一个坐标的中心我們就得到了它們在各类即“a”，“ə”，“零”类中的位

① 然而，在韵母 [-un] [-uŋ] [-in] [-iŋ]，介音是音节的負荷者。

② 在韵母 [-y¹uŋ] 里。

③ 在注音字母中，韵母 [-y¹n] 和 [-y¹uŋ] 由相当于 y+ən (ㄣㄣ) 和 y+əŋ (ㄣㄥ) 字母組合来表达。

置。其次，韵母的每种特点是由它的开头造成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见过 (§§ 5 和 27)，介音系统是以两个相互交错的因素——圆唇和顎化为基础的，有无这两个因素就会使每个韵母变成四个韵母（见表13）。“五項式”的每个小体系表明，韵母的收尾又同样地决定于两个相互交错的因素——第一，韵母的鼻化或非鼻化性质，第二，发音部位向前或向后滑动。

总合起来得到了五个坐标轴，由此可以得出这样

的结论：为了适当地表达这一系统的构造，不仅平面图不够，而且甚至某种立体（三度的）模型也不够，因为两个因素在这样模型里不能得到几何学上应有的表现。

下面这个图可以作为例子来说明，图中本质上相互联系的“a”，“ə”，“零”类是分散开的，而“五項式”的小体系伸延在一条线上，不在正方形里。这一类型的韵母系统的立体模型就综合了三个平行六面体：图上韵母的排列从左和从右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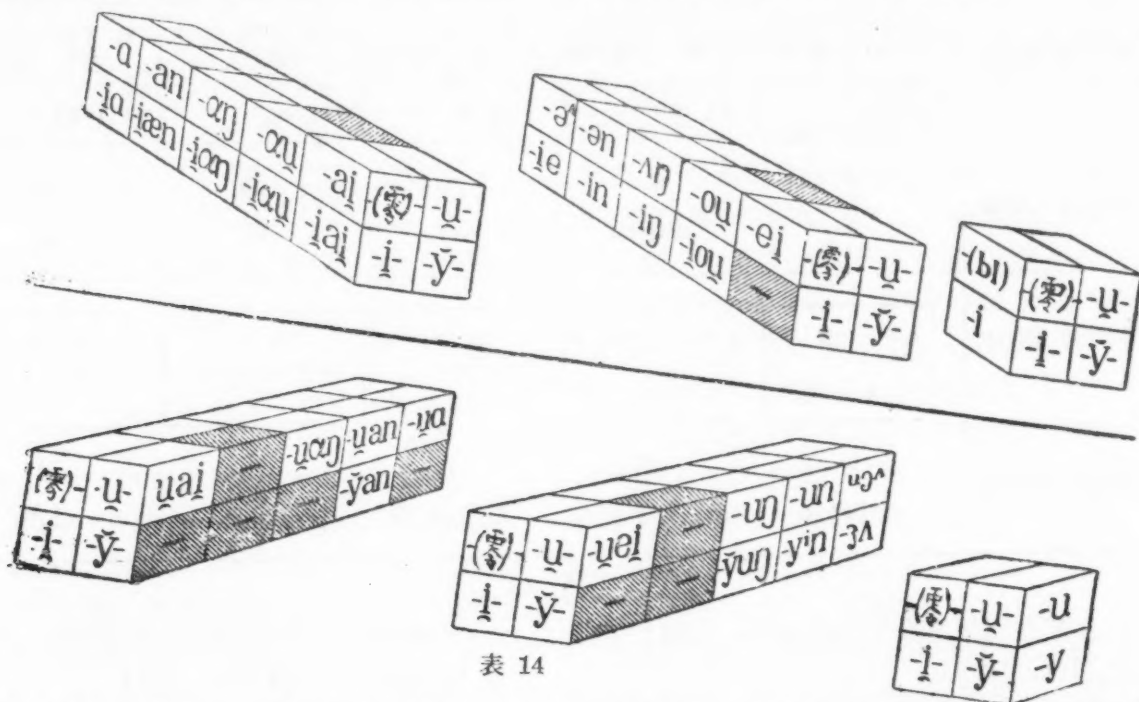


表 14

§ 49. 下表是韵母系统的二度配置表：由于各个介音都排列在垂直轴上（代替正方形），“五項式”的小体系排列在横线上，所以各类相应的韵母都结合起来了；用斜线分割每个方格，表明在纸平面上只想象有类的韵母，其实与它们相类似的“ə”类和“零”“a”类韵母正处在另一个平行面上。

“ə”类和“零”类的结合，赋予表格以最大限度的紧凑性，因为“ə”类的最后两个纵行里的空白是由“零”类许多韵母填满的，同时，虽然在表的右上角斜线下放了两个不同的韵母 [-ei] 和 [-u]，①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韵母的混合，因为在构成音节时，在一个韵母前面的是纯辅音，而在另一个韵母前面的只是喉音

和喉音（见 § 8 和表17）。② 用“零”类的韵母“e”类来填满空白的这种方法，将在下面所有描写汉语普通话音节系统的表格里使用，现在我们来谈谈音节系统。

VI 音节系统

§ 50. 下面几个表，实际上是说明北京话和汉语普通话多方面的音节系统，基本坐标是这样的：沿横线是音类的划分，而在音类内部，元音是以它的性质来划分；沿直线是把音节划分成介音的各种类型，③ 辅音按发音方法的不同划分成各种系统，系统内部又把辅音划分成发音部位相同的各种音组，最后，在这些音组内部又按发音的长短，有无送气等因素来划分辅音（见表2）。

假如从这些由于发音部位相同而结合在

| | | | | | | |
|---|---|----------------------|-----------------------|-----------------------|-----------|-------------|
| 硬 | 开 | -a/-ə ¹ | -an/-ən | -aŋ/ ¹ ŋ | -au/-ou | -ai/-ei(-u) |
| | 合 | -ua/-uə ¹ | -uan/uən | uaŋ/-u ¹ ŋ | -/-u | -uai/uei |
| 软 | 齐 | -ia/-ie | -iæn/-in | -iaŋ/-iŋ | -iau/-iou | iai/-i |
| | 撮 | -/-ye | -yan/y ¹ n | -/-yŋ | -/-y | |

表 15

① 关于 [-u] 的读法，参看 §26。

② 例外的词有 [dʒei²]“贼”（并行的标准音是 [dʒə²]）和 [sei¹||se⁴||sai¹]“塞”；疑问代词 [ʃu¹ei²]||[ʃei²]“谁”字的语音结构可以用大家都知道的助词倾向于语音简化的事实来说明；最后，[dʒei⁴]||[dʒei⁴]这种形式是指代词 [dʒə⁴]“这”和数词 [i²(gə)]“一”的融合。

音 节 系 统 一 覽 表

| 介 音 | 声 母 | 韵 母 | |
|------------------------------|------|--|---|
| | | “a” 类 | “ə” 和 “零” 类 |
| 开 口 (零介音) 呼 音 节 | 第一系统 | <div> <p>p^ca p^can p^caŋ p^cau p^cai</p> <p>t^ca t^can t^caŋ t^cau t^cai</p> <p>k^ca k^can k^caŋ k^cau k^cai</p> </div> | <div> <p>[p^cuə^h] p^cən p^cəŋ p^cou p^cei</p> <p>t^cə^h nən t^cəŋ t^cou lei</p> <p>k^cə^h k^cən k^cəŋ k^cou xei</p> </div> |
| | 第二系统 | <div> <p>ts^ca ts^can ts^caŋ ts^cau ts^cai</p> <p>tʃ^ca tʃ^can tʃ^caŋ tʃ^cau tʃ^cai</p> </div> | <div> <p>ts^cə^h ts^cən ts^cəŋ ts^cou tsz</p> <p>tʃ^cə^h tʃ^cən tʃ^cəŋ tʃ^cou tʃz</p> </div> |
| 合 口 (介音-u-) 呼 音 节 | 第一系统 | <div> <p>t^cuan</p> <p>k^cua k^cuan k^cuaŋ</p> </div> | <div> <p>p^cu</p> <p>t^cuə^h t^cun t^cuŋ t^cu t^cuei</p> <p>k^cuə^h k^cun k^cuŋ k^cu k^cuei</p> </div> |
| | 第二系统 | <div> <p>t^csuan</p> <p>tʃ^cua tʃ^cuan tʃ^cuaŋ</p> </div> | <div> <p>ts^cuə^h ts^cun ts^cuŋ ts^cu ts^cuei</p> <p>tʃ^cuə^h tʃ^cun tʃ^cuŋ tʃ^cu tʃ^cuei</p> </div> |
| 齐 口 (介音-i-) 呼 音 节 ④ | 第一系统 | <div> <p>p^ciaen p^ciau</p> <p>lia t^ciaen niaŋ t^ciau</p> <p>k^cia k^ciaen k^ciaŋ k^ciau iai</p> </div> | <div> <p>p^cie p^cin p^ciŋ mi^ou p^ci</p> <p>t^cie lin t^ciŋ ni^ou t^ci</p> <p>d^cie kin k^ciŋ ki^ou k^ci</p> </div> |
| | 第二系统 | <div> <p>tʃ^ciaen tʃ^ciaŋ tʃ^cau</p> </div> | <div> <p>tʃ^cie tʃ^cin tʃ^ciŋ tʃ^ci^ou tʃ^ci</p> </div> |
| 撮 口 (介音-y-) 呼 音 节 | 第一系统 | <div> <p>lyan</p> <p>k^cyan</p> </div> | <div> <p>lye ly^hn ly</p> <p>k^cys k^cy^hn k^cy^hŋ k^cy</p> </div> |
| | 第二系统 | <div> <p>tʃ^cyan</p> </div> | <div> <p>tʃ^cye tʃ^cy^hn tʃ^cy</p> </div> |

表 16

一起的三、四个辅音所组成的音组中，只要分别提取一个代表音，② 那末这个音节系统的全貌就会看得非常清楚；利用这种初步形式(表 16)，它可以帮助读者细致地了解这个详尽的音节表（仍然没有考虑到声调的区别）。

§ 51. 下面我们要指出几个位于辅音坐标 [-ř] 和元音坐标“零”的交点上的音节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些音节在音节系统中所占的地位已在表 17 中用星点标明。在这个表格里，[řz] 的发音局限于第四声，在北京话里只有一个词根“日”发这个音，例如 [řz^h t^cou] “日头”一词中的“日”。所有能够有这种发音音的其余的词根分属于几个不同的声调，同时读法也非常特别：第二声念 [əi]，第三、四声念 [ai]（在某些方言里，词根“日-”也这样读法）；在这种音节结构中根本没有韵尾，而在辅音 [ř] 前却有一个派生的“寄生”元音。

在形态学方面，还有这样一种更值得注意的情况，[əi]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后缀，它常常跟前面的词根拼成一个音节，于是使它的韵母读音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其结果在汉语中出现了一个派生的所谓“儿化”韵系统，也就是说出现了元音组织的第二系统，阐述这一系统乃是专门论文的研究对象。

(高祖舜 译自《苏维埃东方学》1955 年第 1 期)

① 根据 § 14 中阐述的见解，音节表中双重来源的“软”音节之间是有区别的。

② 为了表格在形式上划一起见，尽可能拿带送气的清辅音音节作为这样的代表音。

③ 表 17（见本期 524—525 页）中的介音分布在正方形的格里，跟表 1, 6, 13, 14 相同。（520 页注）

语文短评

519 这一对雌雄杀人的魔鬼，是牡丹江一带血债的老债主了，几十年来人们连他们的名字都不敢听。
(曲波：林海雪原，21页)

这里把“债主”和“债户”搞颠倒了。杀人魔鬼欠下人民血债，人民才是“债主”，他们是“债户”。还有，“雌雄”和“杀人的”的位置不妥，应该对调一下。(刘凯鸣)

520 国际学联部分代表离济去沪。(大众日报 1958年9月25日3版标题)

从文字上看，国际学联的代表还有一部方留在济南，实际上，国际学联代表到济南的只是一部分，去沪的也就是这一部分。如改为“国际学联代表来济部分去沪”，意义明确，还不影响字数。(王崇昌)

521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它的重要意义无法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斗争相比。(人民日报 1958年9月29日7版)

作者的原意是说“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这回事的重要意义要比“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斗争”大得多，可是原文的说法适得其反。可改作：“…，它的重要意义是资产阶级思想解放斗争无法比的。”(宣钢华)

522 ……通讯记者完全相信史密斯，他毫不怀疑这项事业会不会成功。(联星译：神秘岛，一册，175页)

动词“怀疑”本身就否定性质，它的后面不用再跟“会不会”。只有“怀疑会成功”，没有“怀疑会不会成功”，可以去掉“不会”二字。(潘力)

523 我们通过“七十岁入党的徐大妈”的一生，她跟敌人顽强斗争与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经历及“电影外面的故事”里的英勇的战士肖德龙同志，他虽受重伤，还要坚持战斗，双眼瞎了，还坚持学文化。(儿童时代 1958年第13号24页)

这个文句毛病很多，到底要表达个什么意见，不容易看出来。1)“通过”只是表示某种方式、手段，并不就是要表达的主要内容，因此，“通过…”之后，必须接上表示“做什么”、“怎么样”等等意义的話。现在“通过”落空了；2)这是編者的話，是給兒童看的，拖泥带水的長句不宜使用。来了个“及”字，更弄得冗贅不堪了；3)看来这是簡介作品的話，原来又打算用“及”連起上下两部分来，但是这两部分結構不同，表达方式也不同；4)“七十岁入党的徐大妈”是篇名，在它的后边連上“的一生”，說不过去，除非撤除引号。試改正如下：我們通过“七十岁入党的徐大妈”和“电影外面的故事”反映和歌頌无产階級战士的英雄气概与优秀品質。(“无产…”系原文中的字样。)“七十岁入党的徐大妈”中的徐大妈，跟敌人顽强斗争，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一生的经历是不平凡的；“电影外面的故事”里的英勇的战士肖德龙同志，…(以下同原文。)(刘凯鸣)

524 学员100余人，其中由小学教师中选拔的65人，其余是各乡选送的初中毕业生，大体相当初中文化程度。(人民教育 1958年第9期4页)

1)“大体相当初中文化程度”是说明“由小学教师中选拔的65人”的，应该放在“由小学教师…”这个分句的后边。

2)在整体中抽出一部分加以说明时，方用“其中”，这里既把“学员100余人”的两种来源都加以说明了，就不需要用“其中”。“其余”一般也是在把一个整体的绝大部分叙述完畢，只剩一部分时才用，这里的“其余”多余。

3)这句话試改为：“学员100余人，除各乡选送的初中毕业生外，由小学教师中选拔的65人，大体上也相当初中文化程度。”(刘琳)

525 他先根据酒瓶利用机器吹的作根据，请老师傅出主意。(中国青年报 1958年6月14日2版)

“利用机器吹的”是对“酒瓶”的陈述，“酒瓶”后面不可少一个判断词“是”。“利用”和“用”意义微有不同，这里該用“用”。“根据…作根据”，不妥。这一句可改为“他先根据酒瓶是用机器吹的为理由，…”(楊靜仁)

526 象一个小摊贩，无故地被恶人們撞翻了他的攤子，把貨物打得稀烂，却若无其事的揚長而去的那样的添加的場面，增加了故事的戏剧效果。(大众电影 1958年11期13页)

1)“揚長而去”无疑是“恶人們”，但“恶人們”在句子結構上却不是主語，应该在“却”字前加进“恶人們”，讓它做主語。

2)“若无其事”的“的”应改为“地”。

3)“場面”的修飾語包括好几个不同結構的詞句，显得拖泥带水。

可改成：“…把貨物打得稀烂，恶人們却若无其事地揚長而去，添加这样的場面，增加…”(潘力)

527 因为伯虎死后，葬在橫塘王家村，并没有把九娘的遺柩移去合葬。而且后来給准提庵的住持鑿成平地，竟至遺迹也消灭了。（范烟桥：唐伯虎故事，34頁。）

給准提庵的住持鑿成平地的是九娘的坟，但从原句結構上看，則被鑿平的就是葬在王家村的唐伯虎的坟了；这与原意不合，是缺主語的毛病，应在“給”字前添进主語“九娘的坟”。（潘力）

528 “爱斯不难讀”（Esperanto）一詞，書中說是英語从俄語吸收的，因为“爱斯不难讀为俄国 L. Zamenhof 博士所創造”（67頁）是錯誤的。（中国語文 1958年7月号349頁）

“書中說是英語从俄語中吸收的”这一論点怎样呢？正确不正确？沒有說明白。这样，“因为…是錯誤的”这句话就沒有着落，令人費解。应该在“是錯誤的”前面写出自己的見解。（楊靜仁）

529 但是一些書中还有着一些問題，为了提供有关方面作为改进工作向前跃进的参考，我想从古典文学选注方面的一些問題綜合起来談談。（光明日报 1958年10月12日6版）

“古典文学选注方面的一些問題”本是“談談”之后的宾語，“把”字可以把它提到“綜合起来談談”这些动词之前，构成“把…問題綜合起来談談”的格式；“从”字不能起这种作用。（余磊）

530 在劳埃德为美国的侵略作了一通辯解以后，接着就談到了約旦問題。（人民日报 1958年9月27日4版）
本句的主語“劳埃德”被扣在“在…以后”里，失掉了做主語的資格，而且“在”“以后”根本是多余的。（張正霖）

531 首先，我們要求注文中有观点，即在注文中貫徹批判的精神。（光明日报 1958年10月5日6版）

“观点”不是都有“批判的精神”，正确的观点才可能有，“正确的”不能省。（余磊）

532 老罗，你放心，我一定說服媽媽和你一同去。…（楊沫：青春之歌，168頁）

“說服”有时具有“指使”的意义，“說服誰作什么”相当于“叫誰作什么”，这里的原意是許宁可以說服媽媽允許自己和罗大方一同去，但从字面上也可以理解为：“許宁說服媽媽，要媽媽同罗大方一同去。”如果在“媽媽”后边添上“允許我”三个字，便沒有歧义了。（徐仲华）

533 这就是为什么英美帝国主义繼續在中近东集結軍隊的同时，加紧了政治的阴谋活动，策划着分化和瓦解中东人民的反抗斗争的力量。（人民日报 1958年7月27日1版）

“为什么”沒有着落；应在“力量”后加“緣由”之类的詞兒。（艾白薇）

534 隋阳帝修筑运河，分为数段举行。（人民日报 1958年6月3日8版）

“举行”用的不恰当，可改为“分段进行”（“为”字也可以省去）。（金有景）

535 先进与落后，偉大与渺小，分界綫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是如何对待公与私。（人民日报 1958年8月14日5版）

这里的“他”用得很突然，不知何所指。应该改成“在于一个人…”。（戴力）

本欄啓事

本刊从1956年8月开辟“語文短評”栏以来，許多讀者来信表示欢迎，并不断寄来稿件支持，或提出意見帮助我們改进編輯工作。現在这一栏已經發表了535条，全部檢查一下，虽然有些条目評得不很恰当，但是总的看来，对于促进祖国語言的純潔健康和规范化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为了滿足語文工作者（尤其是語文教育工作者）的需要，我們从本栏已發表的短評中選擇了一部分，并从《語文知識》“不規範的詞和句子”栏里也選擇了一些，依性質分类，加以簡單的說明，編成《語文短評选輯》，列为《中国語文叢書》之一，現已付排。

明年本刊的語文評論的工作將結合改进文風的討論談些比較大的問題，例如，关于某篇文章、文件或整本著作在邏輯上是否正确，意义是否鮮明，修辞是否生动，語句是否精煉，篇章結構是否严密，等等。过去只用“短”条形式“評”遣詞造句的毛病，今后这样的形式也还要采用，以便和上面所說的評論內容相配合。請关心本栏的讀者源源寄稿，并請隨時提供改进的意見。

| 介音 | | I 开口呼音节 (带零介音) | | | | | | | | | | III | |
|-----------------|--------|----------------|-------|-------|-------|-------|---------------------|--------------------|-------|-------|-------|-------|-------|
| 韵母 | 声母 | ‘a’类韵母 | | | | | ‘ə’类和‘零’类韵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硬音节：开口呼音节和合口呼音节 | 声母第一系统 | 唇音 | p'o | p'an | p'aŋ | p'au | p'ai | p'u ^o ^ | p'en | p'aŋ | p'ou | p'eŋ | p'eŋ |
| | 舌音 | 舌尖音 | ba | ban | baŋ | bau | baj | b'u ^o ^ | bən | baŋ | — | beŋ | beŋ |
| | 舌根音 | ma | man | maŋ | mau | maj | m'u ^o ^ | mən | maŋ | mou | meŋ | meŋ | meŋ |
| | 舌根音 | la | fan | faŋ | — | — | fu ^o ^ | fən | faŋ | fou | feŋ | feŋ | feŋ |
| | 舌根音 | t'a | t'an | t'aŋ | t'au | t'ai | t'e ^o ^ | — | t'aŋ | t'ou | — | — | — |
| | 舌根音 | da | dan | daŋ | dau | daj | de ^o ^ | — | daŋ | dou | deŋ | deŋ | deŋ |
| | 舌根音 | na | nan | naŋ | nau | naj | ne ^o ^ | nən | naŋ | nou | neŋ | neŋ | neŋ |
| | 舌根音 | la | lan | laŋ | lau | laj | le ^o ^ | — | laŋ | lou | leŋ | leŋ | leŋ |
| | 舌根音 | k'a | k'an | k'aŋ | k'au | k'ai | k'e ^o ^ | k'en | k'aŋ | k'ou | — | — | — |
| | 舌根音 | ga | gan | gaŋ | gau | gaj | ge ^o ^ | gən | gaŋ | gou | geŋ | geŋ | geŋ |
| | 舌根音 | xa | xan | xaŋ | xau | xaj | xə ^o ^ | xən | xaŋ | xou | xəŋ | xəŋ | xəŋ |
| | 舌根音 | a | an | aŋ | au | aj | ə ^o ^ | ən | aŋ | ou | — | — | — |
| | 舌根音 | ts'a | ts'an | ts'aŋ | ts'au | ts'ai | ts'e ^o ^ | ts'en | ts'aŋ | ts'ou | ts'eŋ | ts'eŋ | ts'eŋ |
| | 舌根音 | dza | dzan | dzaŋ | dzaü | dzaj | dze ^o ^ | dzen | dzaŋ | dzou | dzeŋ | dzeŋ | dzeŋ |
| | 舌根音 | sa | san | saŋ | sau | saj | sə ^o ^ | sən | saŋ | sou | səŋ | səŋ | səŋ |
| | 舌根音 | ts'a | ts'an | ts'aŋ | ts'au | ts'ai | ts'e ^o ^ | ts'en | ts'aŋ | ts'ou | ts'eŋ | ts'eŋ | ts'eŋ |
| | 舌根音 | dža | džan | džaŋ | džau | džaj | dže ^o ^ | džen | džaŋ | džou | džeŋ | džeŋ | džeŋ |
| | 舌根音 | sa | san | saŋ | sau | saj | sə ^o ^ | sən | saŋ | sou | səŋ | səŋ | səŋ |
| | 舌根音 | — | ran | raŋ | rau | — | re ^o ^ | rən | raŋ | rou | reŋ | reŋ | reŋ |

| 介音 | | III 齐口呼音节 (介音-i) | | | | | | | | | | | |
|-----------------|--------|------------------|--------|-------|-------|-------|-------------|-------|-------|-------|-------|-------|-------|
| 韵母 | 声母 | ‘a’类韵母 | | | | | ‘ə’类和‘零’类韵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软音节：齐口呼音节和撮口呼音节 | 声母第一系统 | 唇音 | p'iaen | p'iaü | p'ie | p'in | p'iq | p'iu | p'ie | p'in | p'iq | p'iu | p'iu |
| | 舌音 | biaen | biaü | bje | bin | biq | — | — | bje | bin | biq | — | — |
| | 舌根音 | miaen | miaü | mje | min | miq | — | — | mje | min | miq | — | — |
| | 舌根音 | t'iaen | t'iaü | t'ie | — | t'iq | — | — | t'ie | — | t'iq | — | — |
| | 舌根音 | diaen | diaü | dje | — | djq | — | — | dje | — | djq | — | — |
| | 舌根音 | njaen | njaü | nje | nlin | njq | nje | nju | nje | nlin | njq | nje | nju |
| | 舌根音 | lia | liaü | lje | lin | liq | lje | liu | lje | lin | liq | lje | liu |
| | 舌根音 | k'ia | k'iaü | k'je | k'in | k'iq | k'je | k'iu | k'je | k'in | k'iq | k'je | k'iu |
| | 舌根音 | gia | giaü | gie | gin | giq | gie | giu | gie | gin | giq | gie | giu |
| | 舌根音 | xia | xiaü | xje | xin | xjq | xje | xju | xje | xin | xjq | xje | xju |
| | 舌根音 | ja | jaü | je | in | iq | je | iu | je | in | iq | je | iu |
| | 舌根音 | ts'iaen | ts'iaü | ts'je | ts'in | ts'iq | ts'je | ts'iu | ts'je | ts'in | ts'iq | ts'je | ts'iu |
| | 舌根音 | džiaen | džiaü | dzje | džin | džjq | dzje | džju | dzje | džin | džjq | dzje | džju |
| | 舌根音 | šiaen | šiaü | šie | šin | šiq | šie | šju | šie | šin | šiq | šie | šju |

II 合口呼音节 (介音 -u-)

“a”类韵母

“o”类和“零”类韵母

| | | | | | |
|---------------------------------|--------------------------------|--|---|--------------------------------|-------------------------|
| | | | | p'u bu mu fu | |
| t'uan duan nuan luan | | t'uɔ ^Λ d'uɔ ^Λ n'uɔ ^Λ l'uɔ ^Λ | t'un dun nun lun | t'uɔ duɔ nuɔ luɔ | t'u du nu l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uan guan xuan uan | k'uαŋ guαŋ xuαŋ uαŋ | k'uai guai xuai uai | k'uɔ ^Λ g'uɔ ^Λ x'uɔ ^Λ uɔ ^Λ | k'uən g'uən x'uən uən | k'uɔ guɔ xuɔ 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s'uan dzuan suan | | ts'uai dzuai suai | ts'c ^Λ dzɔ ^Λ sɔ ^Λ | ts'un dzun sun | ts'c dzɔ s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s'uan dzuan suan ruan | ts'uαŋ dz'uαŋ s'uαŋ — | ts'uai dzuai suai — | ts'c ^Λ dzɔ ^Λ s'uɔ ^Λ r'uɔ ^Λ | ts'un dzun sun run | ts'c dzɔ su ru |
| | | | | | |
| | | | | | |
| | | | | | |

1)本表是《汉语普通話的音节結構》一文的附表17。

2)本表中和以前正文中的送气符号在苏联都用右上角的[']，即是我们常用的[']。

3)本表右面第五纵列第十三横行的ts'c^Λ应为ts'c^oΛ。

4)本文所用的[a]是中a，[α]是后a。

——譯者注

IV 撮口呼音节 (介音 -y-)

“a”类韵母

“o”类和“零”类韵母

| | | | | | |
|---|--|--|---|------------------------------------|--|
| | | | | | |
| l'yan k'yan g'yan x'yan yan | | nye lye k'ye g'ye x'ye ye | ly ^Λ n k'y ^Λ n g'y ^Λ n x'y ^Λ n y ^Λ n | ny ly k'y g'y x'y 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s'yan — s'yan | | ts'ye dzye sye | — dzy ^Λ n sy ^Λ n | ts'y dzy sy | |
| | | | | | |
| | | | | | |

收集和整理汉语方言词彙

詹伯慧

一 要糾正忽視方言詞彙的偏向

汉语方言的全国普查工作,經過兩年多来的努力,已經取得相当的成就。在普查的同时,最近一个时期,也有一些比較詳細的方言調查报告及專論陸續發表,这應該說是語言学界一种可喜的新气象。

过去几十年来,汉语方言的調查研究都着重在語音方面的描述,而忽略了,甚至于放弃了方言詞彙、方言語法方面的整理分析,这显然是一种偏向,必須大力糾正。尽管汉语方言的差別在語音上表現得最为突出,詞彙、語法方面的差別比起来要小得多。可是,我們今天在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說指导下从事語言的調查研究,就不能不紧紧記住“語言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是語言的基础,是語言特点的本質”^①这一重要的原則。方言有它自己的語音系統,同样也有它自己的詞彙系統和語法系統。就汉语各方言來說,虽然詞彙、語法方面彼此的距离不大,我們到底还是應該承認这些距离的存在,而且,这些哪怕是細微的差別,仍然有它的規律性、系統性。事实上,就詞彙方面來說,某些汉语方言跟普通話的差別是相当惊人的,絕不容許我們忽視。^②在决定一个方言區別于另一个方言时,詞彙上或語法上的特征,比起語音上的特征来,其重要性实在是有过之而無不及。

过去的汉语方言調查研究工作由于偏重于語音方面,所以在語音的調查方面积累下了比較丰富的經驗;而且借助古汉语語音系統(主要是中古的切韻系統)为桥梁,我們在整理汉语方音,进行橫約或縱約的比較研究时,有了一套比較可行的方法。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編的《方言調查字表》及《汉语方言調查簡表》可以說是这一方面調查的經驗小結,作为汉语方言調查的語音調查大綱是合适的,也是經得起实践考驗的。可是,在詞彙和語法的調查法方面,过去大家既不重視,也就难以分別總結出象《字表》和《簡表》那样令人滿意的調查大綱来。語言研究所虽然也編了一本《方言調查詞彙手册》(《簡表》后面也附有詞彙、語法例句),可惜这个手册的内容不够丰富,只不过是举例的性質列举了为数有限的一些普遍性較大的語詞和句子,为的是了解方言中詞彙、語法的某些比較突出的差別。以这些为数不多的例子去調查方言詞彙和方言語法,显然是不够的。至于如何把方言中的詞彙差別及語法差

別归納整理成为系統的东西(如同在語音方面整理方音間的对应規律),使之能够鮮明地显示出这一方言的詞彙特征和語法特征来,《手册》既沒有談到,过去咱們的方言工作者也沒有很好地把經驗總結过。这就不免使得許多缺乏經驗的方言調查工作者(特別是只經過短期訓練就参加工作的)在这一方面会感到心中無數,躊躇不前了。

因此,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汉语方言的調查研究工作,目前对于如何整理方言詞彙及方言語法,就有展开討論的必要。只有充分地交流意見,才能集思广益,把大家的經驗總結起来,提供給有关方面作为制定比較完善的方言詞彙調查大綱及方言語法調查大綱时的参考。

最近一年来《中国語文》比較重視汉语方言方面的研究文章,陸續發表了不少探討各地方言特点(包括語音、詞彙、語法)的文章。可惜的是这些文章大都就某一具体方言的特点来發揮,很少提升到就一般性的理論来闡述。至于如何开展方言語法、方言詞彙的調查研究,还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注意。本文作者在这許多描写方言語法、詞彙特点的文章啓發下,結合自己的点滴經驗,想在这里就如何收集、整理方言詞彙的問題提出一些粗淺的意見,供同志們参考。这些意見其实并没有什么个人的創見,只不过把大家过去在实践中的的一些做法加以初步地归納罢了。

二 方言詞彙材料的收集問題

汉语方言詞彙的研究,首先要收集足够的材料。一种語言的詞成千上万,一种方言的詞也有成千上万的。把方言中所有的詞都收集下来呢,还是有選擇地只收集其中的一部分,这就要看咱們的目的是如何了。如果是为了編纂方言詞典,那無疑地應該把这个方言中所用的詞一律收进去。可是,如果是为了找出方言詞彙的特点,配合普通話推广工作,为汉语规范化提供詞彙差异方面的材料,那么,咱們收集一定数量的詞就行了,只要这些詞能够全面地、概括地显示出这一方言在詞彙上的特点,并能使咱們初步掌握它們的規律。目前的汉语方言調查工作还是处在全面开花的普查阶段,它要求我們及时地指出方言各方面的特点及其与普通話間的对应关系,因此,我們就應該圍繞这一目的来进行方言詞彙的調查研究工作。

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編的《方言調查詞彙手冊》中收了几百个意义比較單純、範圍比較确定的常用詞，目的就是为了解漢語方言中的詞彙特点，咱們現在收集方言詞彙材料时，可以拿这个手冊作为基础，先把手冊中的詞在方言中的說法一一記錄下来。如前所述，《手冊》的詞彙是不能很好滿足詞彙調查的需要的。例如某些与生产有关的詞（例如農業生产及手工業生产的許多工具名称），在各地就可能有不同的說法，这就得結合具体的情况加以适当的补充。又如关于自然地理环境、山川河流等方面的叫法，各地也可能有所不同，也可以适当地补充进去。再如，由于各地生活習慣風俗不一样，可能某类事物在这一方言区有許多不同的詞，而在另外一个方言区里却很少这方面的詞。《手冊》的选詞标准大致是从普通話出發的，因而对于那些普通話中沒有，而其它方言中有的詞，就不可能处处照顧到。我們調查方言詞彙，正是要多收集这些屬於方言特有的詞，因此，就須打破《手冊》的束縛，灵活地补充我們所需要的詞。拿粵方言为例，由于南方气候溫和，水果蔬菜比較丰富，我們在調查粵方言的詞彙时，自然就会接触到《手冊》中沒有的許多水果蔬菜的名称，例如“西洋菜”、“苦瓜”、“瓮菜”、“菜心”……这样一些蔬菜，“荔枝”、“楊桃”、“木瓜”、“波蘿”、“番石榴”、“芒果”……这样一些水果。这些詞在粵方言区人民的生活中是習用的，我們当然應該收集下来，以便进一步整理研究。其他如粮食一类的詞也是这样。我們在調查各地的方言詞彙时，只有充分地注意地方的特点，从实际出發，对《手冊》中的詞彙加以增补，才能够更好更多地發掘方言詞彙，达到揭示方言詞彙特点的目的。

此外，还有必要通过一些成篇的語言材料（如民歌、民謠、故事、会話等等）来發掘方言詞彙的特点。成篇的材料在語言調查工作中的重要性是众所公認的，它不但对于了解方言語法特点是不可少的，就是对于了解方言詞彙特点，其作用也不容低估。方言中許多生动活潑的詞，甚至对于熟悉該方言的人也不是可以隨意憑空想出来的，只有通过搜集一些接近口語的民間文学材料，它們才栩栩如生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举个例子来看，广东省潮汕地区出版的通俗文艺月刊《工农兵》124期上的一首民歌《担梯》，就显示出不少方言的詞彙特色和語法特色：

担 梯
阿弟担張梯，
阿姪后面追，
大声母喉叫伊返，
惊伊形禍爬上高。
直直追到田蔭脚，

一时笑笑无开嘴，
天是担梯来除稗，
真是嚷嚷无所謂。

上面划綫的字跟普通話有出入，这里面有詞彙問題，也有語法問題。至于長篇的民間故事、傳說之类，那就更能發現問題了。目前全国各地正掀起收集民歌的热潮，咱們的方言調查工作者如果能和这一“采風”工作紧紧配合，一定能够相得益彰。

咱們在收集方言詞彙时，还應該注意有意識地收集一些流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俗話諺語，以及富有地方色彩的歇后語、諧謔語等。因为这些东西都能够体现方言的特色，在我們的方言詞彙描述中，應該有它們的篇幅。

至于，方言中的借詞成分，也是我們收集方言詞彙时應該注意的。每一个方言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一些外来借詞，这些借詞不一定是普通話中有的，咱們有必要尽可能地把它們都收集起来，以便于了解方言詞彙的全貌。

三 方言詞彙的整理問題

在整理方言詞彙材料的时候，我們首先要明确整理的目的，那就是要使零星的材料变成系統地显示这一方言詞彙特点的东西。最近兩年來，各地出版的一些指导方言区人民學習普通話的小冊子中，大都或多或少地列举了一些方言詞彙跟普通話詞彙对照比較，这对于方言区人民在學習普通話时避免方言詞彙这一点有啓發的作用；如果能在這個基础上进一步系統地歸納出这些方言詞彙的性質來，而不只是停留在單純的罗列对比上，那么，对于咱們掌握方言与普通話之間的詞彙差別，就必然会有更大的帮助。

怎样整理出方言詞彙的特点來呢？漢語方言之間的距离大小不一，要拟出一个适用于所有方言的詞彙整理大綱來，誠然是不容易切合实际的。不过，我們还是應該心中有数，不妨先从几个跟普通話差別較大的方言入手，看看方言詞彙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这样就可以为我們整理其它方言的詞彙特点时提供一些綫索。当然，我們只能把別的方言所具有的特点作为啓發我們思考本方言特点的参考。

下面我們以粵方言及閩方言的詞彙特点为例，提出一个整理方言詞彙特点的大綱，供同志們参考。

1) 方言与普通話詞彙相同的。任何一种漢語方言都有許多跟普通話相同的詞。所謂相同，是指詞的含义和詞的表現形式一样，只是各地讀音有別罢了。例如“人”这个詞。这类只是語音不同的情形，本来不屬於方言詞彙的研究範圍，我們在整理方言詞彙时沒有必要大書特書。不过，尽管各地方言詞彙跟普通話

相同的很多,而实际上就具体的詞來說,哪些跟普通話相同,哪些跟普通話不同,各地方言是頗有出入的。剛才所舉的“人”這個詞是各地都相同的,但是,如果說到“男人”“女人”這兩個詞,那各地就很有不同了。因此,為了讓人們了解這一方言跟普通話之間詞彙相同的具體情況,在整理詞彙特點時,先列上“詞彙相同的”這一項,舉些例子來看看,還是有必要的。

2) 方言與普通話詞形相同,詞義有別的,可以分兩方面來看:

a) 詞形相同,詞義範圍不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說,這一個詞在不同的方言中所代表的含義基本上屬於一個範疇,但範圍的大小不同。方言區人民學習普通話時,應該特別注意這一點,因為這種範圍的不同往往容易被忽略過去,以至於鬧笑話。例如“肥”這個形容詞在北方話中是指“動物肌肉脂肪長得多”,而在南方許多方言中(如閩、粵、客)却同時用來指人。因此,一個廣東人初學普通話後懂得了“肥”“胖”有分別,會把“這人很肥”“肥子”的“肥”改說“胖”;但是沒有很好地理解“肥”“胖”各自的適用範圍,也有矯枉過正的現象,連“肥肉”也說成“胖肉”了。這一類例子在各地方言中是屢見不鮮的。我們在整理方言詞彙特點時,可以把所有這一類的詞都搜集在一起,然後逐一跟普通話比較,加以說明。例如粵方言中跟普通話詞形相同,詞義範圍有別的就兩種不同的類型:

A. 方言的涵義較廣,普通話涵義較狹的。例如:

水[ui³⁵]——粵方言也可以用來指“雨”,“落水”=“下雨”。

B. 方言的涵義較狹,普通話的涵義較廣的。例如:

面[min²²]——粵方言單指“麵條”,普通話兼指碾成粉末的東西。例如“胡椒面兒”(=粵方言“胡椒粉”)。

菜[tʃoi³³]——粵方言單用時只指“蔬菜”,普通話兼指下飯的食品(=粵方言“餸”)。

b) 詞形相同,詞義有關,但差別很大的。這一類詞在意義上的差別,已經不單是範圍廣狹的問題了。儘管在形式上相同,在意義上却只不過表示同一類的事物罷了。至於它們的實際含義,在不同方言中可以达到風馬牛不相及的地步。這一類情形在方言詞彙中為數是較少的。

| 廣州 | 北京 |
|------------------------|----|
| 屋[ŋuk ⁵⁵] | 房子 |
| 房[fəŋ ³⁵] | 屋子 |
| 行[ha:ŋ ²¹] | 走 |
| 走[tʃau ³⁵] | 跑 |

此外,我們還應該注意到,粵方言中“跑”不單用,

只用在“賽跑”“跑步”等場合。“行”在北方話中却用在表示“可以”“能干”等和行走無關的意義上。

3) 方言與普通話詞義相同,詞形有別的。這一類的差別在方言中普遍地存在着,是方言詞彙與普通話詞彙不同的最主要的表現。詞形不同有種種不同的情況,大致可以歸納為如下兩類,下面我們舉出閩粵方言的例子看看:

(a) 詞義相同,詞形完全不同的:即同一個概念,在不同方言中用完全不同的形式來表示的。這一類詞在每一個方言中為數都不少,其中有的寫成特殊的方言字,有的還是從通用的漢字中找同音字來代替。我們在整理這一類方言詞時,最好能盡量發掘出群眾創造出來的方言字,實在沒有方言字時,才採取同音代替的辦法,這同音字的選擇,也要以當地人民群眾最常用的為準(有的可能同時有幾種不同的寫法)。找不到同音字代替時就不要勉強,可以用口號來表示,把這個詞的發音用國際音標注上。

| 廣州 | 北京 |
|---|-------|
| 攞[lo ³⁵] | 拿 |
| 搵[wan ³⁵] | 找 |
| 𠵼[k'am ³⁵] | 蓋 |
| 梘[ka:n ³⁵] | 肥皂 |
| 靚[leŋ ³³] | 漂亮 |
| 喊[ha:m ³³] | 哭 |
| 論尽[lœn ²² tʃœn ²²] | 麻煩,別扭 |
| 零舍[lɿŋ ²¹ ʃe ³³] | 分外 |
| 噉[ja:i ⁵⁵] | 浪費 |
| 𢳂[lek ⁵⁵] | 能干 |
| 𨋖[ŋak ⁵⁵] | 騙 |
| 响[hœŋ ³⁵] | 在 |
| 孤寒[ku ⁵⁵ hœn ²¹] | 吝嗇 |
| 而家[ji ²² ka ⁵⁵] | 現在 |

(b) 詞義相同,詞形部分不同的,這一項可以從幾個不同的方面來觀察:

A. 單音節和雙音節的不同:

| 廣州 | 廈門 | 北京 |
|---|------------------------|----|
| 窗[tʃ'œŋ ⁵⁵] | 窗[t'aŋ ⁵⁵] | 窗戶 |
| 尾[mei ¹³] | 尾[be ⁵¹] | 尾巴 |
| 蔗[tʃe ³³] | 蔗[tʃia ¹¹] | 甘蔗 |
| 福州 | | 北京 |
| 老蛇[laʊ ³¹ sie ⁵²] | | 蛇 |
| 眠床[min ⁵² tʃœŋ ⁵²] | | 床 |

B. 詞素的顛倒:

| 廣州 | 北京 |
|---|----|
| 欢喜[fun ⁵⁵ hei ³⁵] | 喜欢 |
| 紧要[kan ³⁵ jiu ³³] | 要紧 |
| 人客[jan ²¹ ha:k ³³] | 客人 |
| 齐整[tʃ'ai ²¹ tʃ'ŋ ³⁵] | 整齐 |

拥挤 [tʃai⁵⁵ jɨŋ³⁵]
宵夜 [jiu⁵⁵ je²¹]

拥挤
夜宵

C. 構詞成分部分不同:

广州

火烛 [fo³⁵ tʃk⁵⁵]
蕃薯 [fa:n⁵⁵ jɨ²¹]
电船 [tin²² jyn²¹]
湿碎 [ʃap⁵⁵ ɔy³³]
厦門

北京

火灾
白薯
汽船
零碎

狗蟻 [kau⁵¹ hia¹¹]
知影 [tʃai⁵⁵ iã⁵¹]
耳空 [hi³³ k'aŋ⁵⁵]
鳥鼠 [niãũ⁵¹ ts'u⁵¹]

螞蟻
知道
耳朵
老鼠

D. 詞尾的有無:

a. 普通話有詞尾, 方言沒有:

广州

鞋 [hai²¹]
梯 [t'ai⁵⁵]
椅 [ji³⁵]
鴨 [ap³²]
貓 [ma:u⁵⁵]
事 [i²²]
名 [mɨŋ²¹]
花 [fa⁵⁵]

北京

鞋子
梯子
椅子
鴨子
貓兒
事兒
名兒
花兒

b. 普通話沒有詞尾, 方言有:

厦門

兄弟仔 [hia⁵⁵ ti³³ a⁵¹]
姐妹仔 [tje⁵¹ mue³³ a⁵²]

北京

兄弟
姐妹

E. 詞尾的不同:

广州

鼻哥 [pei²² ko⁵⁵]
跛佬 [pai⁵⁵ lou³⁵]
打石佬 [ta³⁵ ʃek²² lou³⁵]
撐船佬 [tʃa:ŋ⁵⁵ jyn²¹ ke³²]

北京

鼻子
跛子
石匠
撐船的

四 方言中的特殊詞彙

除了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方言詞彙的特点外, 我們还可以从另外一些角度来观察汉语方言詞彙特点。例如有些方言保持了較多的古汉语語詞, 有些方言借入了較多的外来詞, 有些方言由于本方言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或某种習俗的关系, 因而产生了一些比較特別的語詞, 有些方言又有比較丰富的歇后語、諧謔語…等等。这样許多东西在構成方言詞彙的特殊性上, 都起着一定的作用, 現在我們籠統地把它們列在“方言中的特殊詞彙”这一項目底下。这些为数不少的方言特殊詞彙来源不一, 有的可以一眼看出它的来源, 有的却很难一下子考查出它产生的原因来。这需要我們进一步加以分析整理。因为是特殊的方言詞

彙, 所以这些詞在形式上大都跟普通話完全不同, 因此, 这一类方言詞从另一角度看, 也可以归到上述第三項“詞义相同, 詞形有別”中去。不过为了突出特点, 我們这里把它們单独归納出来, 另加說明, 还是有必要的。

这些特殊的方言詞彙, 大致可以分为兩类:

1) 来源清楚的特殊方言詞。这一类中又可以有种种不同的来源。

a) 外来詞——边疆方言多接触到少数民族語言。閩、粵等地近沿海, 出外华侨众多, 因而方言也容易受到外来的影响, 而使本方言中的外来借詞比其它方言要多一些。

| 广州 | 北京 | 外語 |
|---|------|----------------|
| 波 [pɔ ⁵⁵] | 球 | ball (英) |
| 巴士 [pa ⁵⁵ ʃi ³⁵] | 公共汽車 | bus (英) |
| 冷 [la:ŋ ⁵⁵] | 毛綫 | laine (法) |
| 碌柚 [luk ⁵⁵ jau ³⁵] 檮碌 [pɔ ⁵⁵ luk ⁵⁵] | 柚子 | luk (“子”) (僑語) |
| 厦門 | 北京 | 外語 |
| 雪文 [sap ⁵⁵ bun ²⁴] | 肥皂 | sabun (馬來阿拉伯) |
| 洞葛 [tɔŋ ³³ kat ³²] | 手杖 | tongkat (馬來) |
| 道郎 [to ³³ dɔŋ ²⁴] | 帮助 | tolong (馬來) |

b) 古汉语語詞——汉语各方言都是从古汉语發展而来的, 因此每一种方言都可能保存一些其它方言已經不用或少用的古汉语語詞, 因而增添了方言詞彙的特殊色彩。

| 广州 | 厦門 | 北京 |
|------------------------|--------------------------|----|
| 食 [ʃk ²²] | 食 [tsia ²⁵⁵] | 吃 |
| 企 [k'e ¹²] | 企 [k'ia ³³] | 站 |
| 翼 [ʃk ²²] | 翼 [sik ⁵⁵] | 翅膀 |
| 面 [min ²²] | 面 [bin ³³] | 臉 |

以上的例子是閩粵方言同时保存的古汉语語詞, 下面再举几个粵方言和閩南方言各自单独保存的古汉语語詞:

| 广州 | 北京 |
|-------------------------|----|
| 着 [tʃɔk ³³] | 穿 |
| 話 [wa ²²] | 說 |
| 厦門 | |
| 箸 [ti ³³] | 筷子 |
| 厝 [ts'u ¹¹] | 房子 |
| 目 [bak ⁵⁵] | 眼睛 |
| 寒 [kũã ²⁴] | 冷 |

c) 其它的原因——方言中还有一些因其它某种显而易見的原因而产生的特殊語詞。例如粵方言中就有因“忌諱”的心理而造成的特殊語詞:

猪紅 [tʃy⁵⁵ hoŋ²¹]——“猪血”, 因忌“血”。

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編出《毛主席論語言問題》

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組全体教师和进修生,通过整風和教学改革运动,解放了思想,鼓足革命干劲,经过几晝夜奋战,編出了《毛主席論語言問題》一書,作为国庆节向党献礼。現在这本书已于9月25日印出,开始内部發行。

本書除輯录了毛主席著作中有关語言問題的重要意見外,还有两个附录:1)根据苏联茲維金采夫(A. B. ЗВЕГИНЦЕВ)《19—20 世紀語言学史文选》第11章,輯录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論語言的重要意見;2)从《斯大林全集》中輯录了斯大林論語言的重要意見。全書除了《弗兰克方言》和《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两个專著外,包括了馬、恩、列、斯和毛主席有关語言的重要理論,可以作为語言教学和研究的原則指导。(彭維金)

猪潤 [tʃy⁵⁵ jœŋ⁵⁵]——“豬肝”,因“肝”“干”同音,不吉利,換反义的“潤”,其余动物的肝同样也叫“潤”。
通胜 [t'uŋ⁵⁵ ʃɪŋ⁵⁵]——“通書”(皇历),因“書”“輸”同音,不吉利,改反义的“胜”。

又例如南方的一些方言区(如粵方言区、客方言区),少見冰雪,就把冰雪的概念混淆。

广 州

雪条 [ʃyt³³ tʃiu³³]

雪糕 [ʃyt³³ kou⁵⁵]

雪藏 [ʃyt³³ tʃ'œŋ²¹]

雪櫃 [ʃyt³³ kwai²²]

雪花 [ʃyt³³ fa⁵⁵]

落雪 [lœk²² ʃyt³³]

北 京

冰棍

冰淇淋

冰鎮

冰箱

雪花

下雪

粵方言中“冰”“雪”两个概念都用“雪”一詞来表示。这实际上也是扩大了“雪”这个詞的意义范围(参看第三节第2項)。

这一类因特殊原因造成的方言詞彙特点,我們必須根据不同方言的实际情况,注意充分揭發。

2) 来源难以一一查出的特殊方言詞——除了上述来源清楚的特殊方言詞外,还有一些特殊的方言詞,一时难以查明它們的来龙去脉。这些方言詞長期积累下来,其中有的可能是在历史上受其它民族語言的影响而形成的,但更多的还應該說是为了适应本地区人民交际上的需要,反映本地区經濟上和文化上的独特面貌而由人民群众創造出来的。这一类的方言詞富有濃厚的地方色彩,有的很不容易在普通話里找到适当的語詞来对譯,有的沒有适当的汉字可以表示:

廈 門

头家 [t'au²⁴ ke⁵⁵]

报水 [pə³³ tsui⁵¹]

ta⁵⁵ pə⁵⁵

北 京

老板

密告

男子

爐煤 [tsa⁵⁵ mə⁵¹]

bi⁷³²

ŋiãũ⁵⁵

gian⁵¹

女子

躲藏

痒

愛

五 方言中的成語、諺語、歇后語、諧謔語

在收集方言詞彙材料的时候,我們会从中發現一些生动活潑而又富有地方色彩的成語、諺語、歇后語、諧謔語之类。这些詞語往往生动地反映了当地的風土人情及心理状态。我們在整理方言詞彙特点时,可以把它們分別列出,加以必要的說明,不要輕易遺漏了它們。例如粵語:

[歇后語]

秀才手巾——秀才的手巾常用來“包書”,“書”“輸”同音,因而轉以表示“包輸”,即“贏不了”。

老公撥扇——老公(丈夫)撥(搨)扇,妻子就涼快了。“妻”“凄”同音,因而轉以表示“凄凉”。

[諧謔語]

打斧头——揩油(指代人买物)。

电灯胆——不通气。

一塊 [kau²²] 飯——愚笨,不靈活。

甩晒鬚 [lat⁵⁵ ʃa:i³³ ʃou⁵⁵]——丟臉(甩即掉或脫,晒即完了)

本文主要是从显示方言詞彙特点这一角度来談的,全面深入的方言詞彙研究,还有許多工作可做,例如方言詞典的編纂工作就很重要,这里就不多談了。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24頁。

② 拿閩南方言的潮州話來說,根据周耀文同志的估計,就有30%以上的詞彙与普通話不同。参看《方言与普通話集刊》第一本,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

大跃进中汉语词彙的新發展

黎运汉 程达明

在这大跃进时代中，汉语随着祖国新事物新概念的產生出现了大量的新詞。有許多詞和語的意思改变了，获得了新的意义和新的用法。它們的产生不仅进一步丰富了祖国語言詞匯的宝庫，使祖国語言更向前發展了一步，并且还反映出，这一阶段我国人民在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生产建設各个战綫上的胜利成果。例如“大破大立”、“又紅又專”、“跃进派”、“促退派”等新詞或詞組，就是在整風期間提高了思想覺悟的体现。現在全国掀起了技术革命高潮，發明創造不断出現，新的詞語就敏感地直接地反映了这些奇迹。如显示全民办工厂、搞鋼鐵的面貌的，有“鋼帥”、“鋼軍”、“土洋并举”，等等。农民們在生产过程中創造了一种新的先进耕作方法，坐在木制的小船上插秧，于是“插秧船”这一个新詞产生了。农民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进行工具改革，創造了多种多样的車子，代替了肩挑，因而产生了“車子化”这个詞。又如人們都想为社会主义作出最大的貢獻，積極學習多种多样的生产技术和工作方法，使自己成为多才多艺的人，于是“多面手”、“万能人”这些新詞就跟着产生了。再如，在党的总路綫光輝照耀下，人們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發揚了敢想、敢说又敢干的共产主义風格，創造了千千万万过去被人認為不能實現的奇迹，于是“异想天开”“标新立异”这些成語就获得了新意义。現在祖国建設社会主义已进入了新的阶段，因而标示着这个阶段的“人民公社化”这个詞便应时产生。其他“如下放干部、幸福院、交心”等新語詞，都是最敏感地反映出在各个战綫上出現的新成就和新事物。

大跃进以来出現的新事物是很多的，标示这些新事物的新詞也極其丰富。而这里所談的新詞語，只是大跃进时期中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南方日报上所出現的某些書面詞語。对于群众的口头新詞語和出現在其它刊物上的新詞語还沒来得及作全面的收集。由于掌握的材料不多，因此談論問題的片面性是在所难免的。

二

汉语詞匯發展变化的情况是复杂的，新詞的产生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这里談的有两种：一种是以旧詞为基础，通过汉语构詞法，孳生出新詞。一种是旧詞获得了新的意义和新的用法，其中有个别的詞过去本

已产生，但用得普遍，現在普遍了。另外有一种固定詞組，这类詞組很有变成一个詞的趋势。

通过汉语构詞法孳生的新詞語，大致說来，可以归納如下列几种：

1) 联合詞組：联合詞組是由两个以上的并列成分(詞或詞組)組成的。例如：

又紅又專 多快好省 少慢差費 又穷又白
大破大立 勤工儉學 厚古薄今 重外輕中
鳴深放透 厚今薄古

2) 主从結構：組成这一类新詞或詞組的两个詞素(或詞)中，有一个詞素(或詞)的意义是主体，另一个詞素(或詞)的意义是从屬於这个主体的。例如：

万能人 幸福院 大跃进 試驗田 土專家
人民公社 反面教員 紅專道路 精神貴族

3) 动宾結構：这类新詞或詞組的結構形式是前一个詞素或詞是表示动作的，后一个是被前一動詞或動詞素所支配的宾语。例如：

交心 通心 梳辮子

4) 主謂結構：这一种結構很有成語化的趋势。例如：

土洋并举 知識公有 寸土皆收 分秒必爭

5) 加詞尾式：即由一个詞加上詞尾构成的合成詞。現阶段中出現了大量加上“派、化、手”这些詞尾的新詞。例如：

跃进派 促进派 促退派 观潮派 算賬派
苦學派 伸手派 水利化 人民公社化 滾珠軸承化
沼氣化 車子化 工分主义 好人主义 多面手
紅旗手

6) 簡称：簡称也可以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合成詞，因此我們也把它列为新产生的詞語。例如：

三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 五气
(官气、暮气、闊气、驕气、嬌气) 双反(反保守、反浪費)
二百(百花齐放、百家爭鳴) 五大(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报)
双改(教学改革、科学研究改革) 治安七害(写反动標語、流氓、賭博、貪污、走私、欺騙、盜竊)
三結合(教学与生产相結合、理論与实际相結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結合)。

汉语的构詞方法是多种多样，但發展很不平衡，有些格式能产力很强，有些格式能产力較弱。現阶段中，以通过主从結構产生的新詞語为数最多，在我們这次所收集的125个新詞語中，占40%弱，这表明它是汉

語構詞中最能產的类型。同時，加詞尾式的結構，也相當活躍，尤其是“化”和“派”能產力十分強。從現階段的詞匯發展情況看，更進一步證明這種格式有着廣闊的發展前途。簡稱是一種日趨發展的新形式。我們認為，如果不致發生誤解而又是“約定俗成”的簡稱，是應該受到歡迎的。簡稱有些會較快地消失，有些會逐漸固定下來成為詞或語。

三

談到第二種，舊詞獲得新義，其實應該說是詞義的擴展。它的產生是出於修辭的手段。例如：“鋼都放衛星”，“支援工業抗旱”，“力爭鋼鐵大丰收”，“工業戰綫上的出色標兵”，“反對甘居下游”，等等，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應該承認，這類新用法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一種可喜的現象。我們應該極力歡迎和愛護。特別是語文工作者，更應該在詞匯發展中做促進派。當然，新詞的產生和成長是有條件的：首先，只要有了新的事物、新的概念，原有的詞不足以表達的時候，人們就會創造出反映這些新事物的新詞。其次，創造出來的新詞還要看大家用起來是否合適，是否方便。如果適合了這些條件，新詞就會產生、成長。即使有人不歡迎，也絕對沒有力量去阻止它的產生和成長。反之，如果不合乎這些條件，即使新詞被“創造”出來，大

家也不會普遍地長久地使用它，它也就免不了淘汰。這是詞匯發展的客觀規律，是不以人們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可是，這只是一方面，我們還應該看到另一方面。任何客觀規律，人們都是可以了解它、掌握它的。人們一旦掌握了客觀規律，便可以發揮巨大的主觀能動性，根據客觀規律，推動事物向前發展。在推動語言詞匯不斷豐富的过程中，首先應該看到人民群眾的語言創造力量；而優秀的人民政治家、作家和語文工作者就是人民的這種力量的體現者。毛主席就是善於根據客觀需要來創造新詞並正確地使用新詞的語言巨匠。在漢語詞匯有了新的發展的今天，語文工作者應該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去，從人民的活語言中，發掘新詞，並進行研究，以掌握漢語詞匯的發展規律，幫助那些合乎條件的新詞成長起來，穩定下來。與此同時，我們還應該注意到，由於漢語詞匯發展很快，運用起來不免有困難。如果不加注意，就會出現混亂現象。因此，我們要掌握漢語詞匯的發展規律，注意新詞產生的條件，不要亂造新詞或給舊詞胡亂加上不合理的意思。我們要隨時注意新詞的生長情況，不要漫不經心，隨便採用。就是已經穩定下來的新詞，我們也要正確地理解它的意義和用法，準確地去了解和使用，不要望文生義，更不要生搬硬套。總之，我們要促進漢語詞匯的規範化，使漢語沿着健康的通路發展。

對“目的”和“為了”一文意見

毛西旁

王年一同志“目的”和“為了”一文（載《中國語文》1958年7月號）認為“目的”和“為了”不能同時用在一个單句里，認為這樣用在“道理上有欠缺”，認為是“重複”、“多餘”。我不同意這種看法。這種看法是片面的，不顧語言事實的。

不錯，“目的”和“為了”單用，可以起同樣的表達作用，但這並不是說這兩個詞的含義和用法就完全相等。在用“目的”的單句里，不一定能用“為了”來代替。如王同志舉的第七例，“日本帝國主義還在繼續侵略，它的目的是要滅亡中國”，改成“日本帝國主義還在繼續侵略，它是為了要滅亡中國”，就很別扭。這裡非用“目的”不可。相反地，這個句子倒可以同時用上“為了”，改成“日本帝國主義還在繼續侵略，它的目的是為了要滅亡中國”。“…目的是為了…”這種用法早已成了語言習慣，我們不能無視它。這樣說時，我們並不感到重複多餘，也不感到有什麼歧義。

語言是發展的，是約定俗成的，不能死板板地去評論它。我認為“…目的是為了…”這種用法能加重語氣，突出“目的”所指的內容，“為了”在這種句子里起了很大的作用。這種格式是既成的語言習慣，應該讓它為我們服務，讓它存在和發展下去。我認為王同志舉的1至6例都沒有可指摘的地方。除了“…目的是為了…”這種說法外，還有“為了…目的”這種說法，“目的”作為“為了”的賓語使用。“目的”前面往往有一個說明什麼“目的”的附加成分。如“為了侵略的目的，美帝國主義在世界各處建立軍事基地”，這種說法，現在也很流行。照王同志的看法，這種句子里的“目的”也是多餘的，重複的，因為可以說“為了侵略，美帝國主義…”。但是如果我們重視語言事實，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語言的話，我們就不會覺得奇怪了。

“和、跟、同、与”的用法和分工

賈崇柏

現代漢語中常用的“和、跟、同、与”四個詞，根據呂叔湘、朱德熙兩先生的解釋，“跟”字在北京話里用得比“和”更多，“同”字流行在華中一帶，“和”字最普通，文章里最常見，“与”字是從文言里繼承過來的……（《語法修辭講話》，101）。儘管來源不同，但是它們都兼有連詞和介詞的兩種用法。現在它們由於分工不明，往往造成使用上的不當和閱讀上的誤解。

為了語言的純潔和健康，黎錦熙先生建議“和”用做連詞，“同”用做介詞。（《新著國語文法》，267）呂叔湘、朱德熙兩先生也建議“和”用做連詞，“跟”用做介詞。（《語法修辭講話》，102）我國的根本大法——憲法和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幾個主要文件對“和”和“同”有了明確的分工，“和”用做連詞，“同”用做介詞。這的確是可喜的現象。最近中共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幾個文件，特別是劉少奇同志的工作報告和1958年5月5日及6月4日的《人民日報》的社論，根據分工原則普遍而準確地運用了“和”和“同”。這樣就給人們樹立了遵循的榜樣。

“和、跟、同、与”的詞性和意義如何區別呢？黃伯榮先生在《連詞“和”跟副動詞“和”的區別》（《語文學習》，1955年8月）里曾談到這個問題，對我們有所啓發。現在我把自己的一些體會寫在下面。

我們要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毛澤東選集，629）

你還別跟他要。（駱駝祥子，55）

我們爭取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首先同我們的所有鄰國建立睦鄰關係。（八大政治報告，59）

可是終日與車夫們打交待。（駱駝祥子，48）

這類例句很多。它們共同的特點就是“和、跟、同、与”前有修飾成分。根據黃伯榮先生的說法，可以判斷是介詞。因為連詞的作用就是連接兩個相等的詞或比詞大的單位。它們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做句子中的同一成分，因而在被它連接的兩部分之間是沒有修飾關係的，當然在連詞前就不會有修飾成分；如果在“和、跟、同、与”前有了修飾成分，就不能當連詞看。

介詞的主要作用是同名詞或代詞結合成介詞結構，主要用做狀語（此外還用做定語、補語、謂語），表示主語行為動作的對象。介詞結構本身可受副詞修飾，所以，在用做狀語的介詞結構前面當然可以有修飾成分。例如：

我同他只談過這個問題。

我只同他談過這個問題。

前例是說，我沒有同他談過別的問題（限制談的問題）。後例是說，我沒有同別人談過這個問題（限制談的對象）。顯然前例中的“只”限制謂語“談”，後例中的“只”限制介詞結構“同他”。因此，當“和、跟、同、与”前有修飾成分時，我們就判斷它是介詞。但是，這不等於說沒有修飾成分的就是連詞。當“和、跟、同、与”前沒有修飾成分時，怎樣區分它們是介詞還是連詞，就是本文所要談的問題。

區別“和、跟、同、与”是哪類詞時，還有比較明顯的標志，就是能否用頓號代替“和、跟、同、与”。可以用頓號代替的是連詞，否則就是介詞。這個標準還是不完備。例如：

黑人同白人不能在一起走路。（中國語法教材，57）

哥哥跟弟弟談話。（弟弟有些不耐煩。）

如果因為這兩例中的“同”和“跟”前沒有修飾成分，或者可用頓號代替，就判斷為連詞，那麼在第一例中就看不出是黑人不能同白人在一起走路的意思，也看不出白人对黑人的壓迫。在第二例中看不出是哥哥主動同弟弟談話，弟弟是哥哥談話的對象。介詞結構做狀語的句子，最容易誤解為聯合結構做主語的句子。所以區別時首先應從謂語方面着眼。

（一）合成謂語句：

1) 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都是脫離實際、脫離羣眾的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東西……（劉少奇：八大二次會議工作報告。）

2) 東間與西間是劉家父女的臥室。（駱駝祥子，47）

3) 寶貴跟春果都剛十九歲。（《漢語》課本三冊，138）

從上例中可以看出，凡是合成謂語句，謂語前的“和、跟、同、与”一般地說只能是連詞，而不是介詞。因為介詞同名詞或代詞構成介詞結構往往不做判斷詞的狀語。例3沒有判斷詞，是因為表示年令、籍貫等句子習慣上不用判斷詞。

（二）形容詞謂語句：

1) 哥哥和弟弟都很聰明。

2) 這里老師和同學都很熱情。

3) 祖國建設的成就和速度非常驚人。

4) 年老的娘和兒子一樣剛強。（中國語法教材，57）

5) 這種蘿卜跟梨一樣甜。（楊欣安：《現代漢語》三冊，208）

6) 土色灰白和冰一樣涼，一樣堅硬。（語法小組：《語法講話》）

从上面例句中可以看出,形容詞謂語句,前面的“和、跟、同、与”可做連詞也可做介詞。做連詞时,謂語前一般有表示範圍的副詞或表示程度的副詞做狀語,如:“都”和“非常”。做介詞时,在“和、跟、同、与”的后面,一般要求有“一样、一般、同样”等詞来呼应,表示比較或比拟。这时“和、跟、同、与”类似“象、如”。因此例4、5、6中的“和、跟、”都可以換用“象”字而不改变原意。

(三)動詞謂語句:

- 1) 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八大開幕詞,5)
- 2) 先生与太太們总以为僕人就是家奴。(駱駝祥子,43)
- 3) 香蕉和橘子这两种水果都出在南方。(呂叔湘:《語法學習》,76)
- 4)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見過一面。(毛澤東選集,63)
- 5) 我跟他講故事。

从上例中可以看出,動詞謂語句同形容詞謂語句一样,“和、跟、同、与”可做連詞也可做介詞。

做連詞时也同形容詞謂語句一样,在謂語前有表示範圍的副詞,如“都”和“总”(如果沒有时也可加上并不伤害原意)。另外还可以有表示总括的复指成分和表示範圍的副詞同时出現在句中,如例3中的“这两种水果”和“都”。

做介詞时,就不象形容詞謂語句那样簡單,如例4可以因为“和”字前后的詞类(代詞和名詞)不同和謂語前沒有表示範圍的副詞(同时也不能加上)而判断为介詞。但在動詞謂語句中,“和、跟、同、与”做介詞时的情况又是相当复杂,象例5可以有兩種看法:如果把“他”看做是主語“我”講故事的對象时(我對他講故事),那么“跟”就是介詞。如果把“他”也看做是“講”的主語(聯合主語)而充当句中同一成分(我和他兩人都講故事),那么“跟”就是連詞了。这究竟如何判断呢?我認为應該从下面几方面来考察。

(A)从語意上看:

- 1) 我跟你打听一件事。(鄭峻章:《漢語語法》,127)
- 2) 那你跟媽媽去解釋解釋吧!(張天翼:《蒼生》,在家里)
- 3) 他和母亲告別了。(中國語法教材,873)

例句中的謂語動詞,都是表示單方面動作的動詞。“打听”是說明主語的動作,“你”是打听的對象。同样道理,“媽媽”是解釋的對象。由于沒有另外的對象,所以一般不会理解成为“你跟媽媽兩人去解釋解釋吧”。

(B)从詞类上看:

- 4) 我們的耳朵和大众接近些。(中國語法教材,873)
- 5) 我們和自然作斗争。

“和、跟、同、与”作連詞时,一般是組成聯合結構的詞語必須是性質相同的(指詞或者詞組的类别),或用途相同的(《漢語課本第四冊參考書》,48),如“年幼的

和我都剥豆”(的字結構和代詞共同做主語)。做介詞时却没有这些条件限制。如果遇到“和、跟、同、与”前后的詞的詞类或用途不同,就可以判断为介詞,例2、3、5是代詞和名詞。有时詞类虽然相同,但所表示的内容类别不同,也应判断为介詞,如例4中的“耳朵”和“大众”虽然都是名詞,但是类屬不同。

(C)从結構上看:

- 6) 同羣众一起千方百计地实事求是地努力加以克服。(劉少奇:八大二次會議工作报告)
- 7) 同世界各国兄弟党在一起,巩固国际主义运动的战斗的团结。(同上)
- 8) 文化革命同技术革命一样,同整个社会主义建設事業一样,必須走羣众路綫。(人民日報,1958年6月9日社論)
- 9) 个人同个人、小組同小組、企業同企業,展开了学先进、赶先进、比先进的竞赛(劉少奇:八大二次會議工作报告)

从上例中可以看出:(一)凡句中的“和、跟、同、与”的后面,有“一起、在一起、一样”等詞語呼应时,它們后面的名詞或代詞就是主語行为動作的伴随对象。在“和、跟、同、与”前还可加其它修飾成分,因此例6、7、8、中的“同”都是介詞。(二)凡句中的“和、跟、同、与”的后面,有(或可以加上)方位詞“之間”就可以判断为介詞。因為它們可以同方位詞“之間”構成介詞結構,如例9就是。(三)凡句中的“和、跟、同、与”后的名詞或代詞可以移在謂語后作賓語时,便可判断为介詞,因为賓語有时可借用介詞提前的緣故。例3可改做“他告別了母亲”。

(D)从上下文看:

- 10) 我跟姐姐討論討論。(完了讓姐姐跟媽媽說罷。)(張天翼:《蒼生》,在家里)
- 11) 还是宏兒和他去走走。(宏兒听得这话便去拉水生。)(魯迅選集,1卷,53)

从上例中看出,遇到难以确定是連詞还是介詞时,要看上下文。从例10中的下文里看出“我”是主动者积极想办法先同姐姐討論,然后通过姐姐告訴媽媽,达到劝媽媽学文化的目的。从例11中的下文里看出,宏兒是主动者,所以兩例中的“跟”和“和”是介詞。另外這兩例中的詞类既不相同(名詞和代詞),又沒有共同用途,所以是判断为介詞的另一个原因。

任何一个句子都有上下文和具体的語言环境。孤單單的一句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样,象“我和他辯論”“王老五和爹爹来了”这样难以辨認的句子,把它放在具体的語言环境中(上下文)来判断,困难也就不太大了。虽然如此,但总难免帶來麻煩,因此它們的明确分工仍是必要的。

“和、跟、同、与”有必要分工

蔣蔭枏

目前“和、同、跟、与”这四个詞常常在一个作者的同一篇文章里同时出現，既作介詞又作連詞。用得很乱。例如：

- 1) 李虎臣見我們同馮子明翻了臉，正合他的心願。
(《解放軍文艺》1958年8月号，10頁)
- 2) 半年來，我們投奔了三个軍頭，和敵人明爭暗鬥，
…(同，11頁)
- 3) 我們跟数十倍于我部的敵人，激戰了二天。(同，11頁)
- 4) 薛自爽同志把胳膊一掄，…与敵人进行了頑強的抗擊。(同，13頁)
- 5) 我和史可軒同志走在隊伍後頭，這時才發現鄧小平、李林同志沒有跟隊伍來。(同，9頁)
- 6) 一天夜里，許祝中同我在趙杰三房子里閑談。(同，10頁)

从上面的例句，可以看到由于“和、跟、同、与”分工不严，用这些不同的詞来表示相同的語法作用，給學習的人無形中增加負擔。这是沒有必要的。因此我認為在同一篇文章里最好統一用某个字作連詞或介詞。

其次在一个句子里，不要用同一个字既作介詞又作連詞。否則不但使人不能一目了然地理解句意，而且很容易把意思弄錯了。特別是两个名詞联合作主語用“和”連結，後邊的謂語中心詞前有介詞結構作修飾語，这个介詞結構的介詞是用“和”的。例如，“小說和詩歌和散文是有区别的。”單看这句可以有几种理解。

1)“小說、詩歌”聯合，“和散文”是介詞結構；2)“詩歌、

散文”聯合，作第一个“和”的介詞結構的聯合成分；3)“和詩歌”、“和散文”作為两个平列的介詞結構。此外，还可以有其他理解。类似这种情形在文章中并不是罕見的。看下面一些書報上的例子：

- 1) 少数民族和国际友人 和我們的交往一天天頻繁起来。(《常州工人報》1957年9月3日，3版)
- 2) 石曉芬：哎呀！老伯，我說話你为什么不信，难道我会無中生有地在您面前扯謊嗎？剛才我跟我媽媽差点就在你这里跟我爸爸吵了起来。(《劇本》1958年7月号，37頁)
- 3) 为了使他不至終日盤桓在政治思想里面，我常常和他談談文学和艺术。(黃既：《关向应同志在病中》)

这些句子里的“和”或“跟”字，有的作連詞，有的作介詞，令人費解。假如我們只把“和”作連詞，“跟”用作介詞，就要清楚得多，例如：

- 1) 很多企業、机关、学校、部队和个人都主动地同別的單位和个人进行协作，以促进自己的工作 和別人的工作共同發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屆全国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
- 2) 我国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和領土完整的原則同任何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策，已获得成就，今后將繼續貫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

这些句子里面用“和”作連詞，“同”作介詞，联合結構和介詞結構便一目了然。

因此，我認為“和、跟、同、与”分工是很必要的。

揚州話里有“討喜”

刘培倫

在討論克萊同志《批改病句不要无视語言现实》一文时，对克萊同志提到的“討喜”这个詞兒，刘琳同志說“沒有被大家采用”，陆复中同志“不敢苟同”它的可能存在。(均見《中國語文》1958年9月号)其实，在揚州人看来，两位同志的意見都只是主觀臆断，沒有更多的进行調查研究。恰恰相反，在揚州話里，“討喜”这个詞兒不是“沒有被大家采用”，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形容詞，和“討厭”一样普通地使用着。例如：

这孩子真討喜！
这孩子不討喜
你討喜得很呢！
不跟你这討喜宝子說！
这鋼筆真討喜的。
这小猫子养得不討喜。

这朵花真討喜的。
这件褂子做得不討喜。
事情是做得討喜。
还有什么值得討喜的地方？

揚州人对人或事物表示非常喜爱时，就說“真討喜”“蛮討喜”，表示否定时，就說“不討喜”。揚州人在运用“討喜”这个詞兒时，是表示“撫愛”，也往往有些“輕佻”的意味。揚州話里的“你真討厭”和“你不討喜”有着区别。“不討喜”只是对那个人或那件事物表示“不喜爱”“不滿意”，厭惡的感情色彩很輕微，远不及“討厭”深。

既然“討喜”这个詞兒在揚州話里用得很普通，將來又有誰能限制它不被吸收到普通話里去呢。

程度副詞修飾動詞能不受限制嗎，

李春林 余立人

在1957年11月号《語文教學》上，林文金同志在《程度副詞不可以修飾動詞嗎？》一文中說，程度副詞和動詞組合不受限制。作者在列舉了“更”和動詞組合的例句後，作出結論說：“從上述例句里我們不難看出它和動詞組合的能力相當強，可以說它和動詞組合不受什麼限制。如果它和動詞的組合還有一點限制的話，那應當說是極其次要的一面，它和動詞組合的能力相當強才是主要的一面。”（着重點是本文作者加的。）

事實上，“很”“更”等程度副詞和動詞組合“不受什麼限制”或受限制也是“極其次要的一面”嗎？不是。我們認為初中《漢語》課本上“程度副詞一般不修飾動詞”的提法雖有些籠統，但林同志的看法又未免有些偏激。現在我們仍用作者的原文中的例子來仔細分析一下（例句不引全句）：

- 1) 只以為很是囉囉罷了。
- 2) 很讀過書的人。
- 3) 很起了同情。
- 4) 他們很守紀律，很講道理。
- 5) 運動是不很參加了。
- 6) 水聲又很听得出了。
- 7) 很合理的夫婦。
- 8) 很對不起自己的事情。
- 9) 很受動搖。
- 10) 很引人注意。
- 11) 很露出焦躁的神情。
- 12) 很得信任。

上面是“很”的例子，下面是“更”的例子：

- 1') 更感到這一句話的必要。
- 2') 老百姓更經過了組織，我們在沿途更看見了……標語和……開水。
- 3') 牌更打不好了。
- 4') 我更補足一句。
- 5') 他的成功更靠挑選的適宜。
- 6') 威信更提高了。
- 7') 更反對……文學有用論。
- 8') 面部更變得難於形容的可憎了。
- 9') 中間更夾着……聲音。
- 10') 更兼身體一頭一落地延續了半天的時光。
- 11') 更令人信服，更有力量！
- 12') 更引起別人的注意。
- 13') 更是苦惱。
- 14') 更象做梦了。
- 15') 更刺激了那白馬的興奮勁兒。
- 16') 更顯得模糊。
- 17') 更讓他難過的是沒地方去訴委屈。

（“·”是原有的，“。”是本文作者所加，表示動詞後面的賓語或補語）

從上列例子可以看出程度副詞在修飾動詞時都有這樣一個很明顯的特點：被修飾的動詞都帶有賓語或補語。有的賓語被提到動詞前面（如例5, 6, 6'）。所以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程度副詞在修飾動詞時，都比較嚴格地要求被修飾的動詞帶上賓語或補語。而且沒有一個謂語是單純謂語（不帶賓、補的單一動詞作謂語）。事實上，能被“很”修飾的動詞謂語句正是帶有賓語或補語的。我們若把賓語或補語抽掉，那些句子就不能成立。即使個別能成立，也只是在一定的語言環境中。就是林同志所說的“大都可以用‘很’來修飾”的“帶有感情色彩行為的動詞”，在被“很”修飾的句子中同樣是要帶賓語或補語的，並沒有幾個例外。

為什麼某些動詞在帶上賓語或補語以後，往往可以被“很、更”等程度副詞修飾呢？（關於帶數量詞補語的，《教學參考書》和林同志都談過，這裡不再談。）這是因為某些動賓、動補結構本身就存在着程度的差別，如“守紀律”，“講道理”，“引人”，“合理想”等。有些人在一般的情況下是“守紀律”的，但有時會不自覺地不守紀律，我們可說這樣的人“比較守紀律”，因此“守紀律”有程度的差別。

林同志沒有考慮到程度副詞在句子中的地位、作用，也沒有看看它們前後的和它們有密切關係的其他詞（如動詞後面的賓語、補語和動詞前面的賓語）。我們考察一個詞或一類詞的語法特點是要從它（它們）在句子中的地位、作用及與其他詞的關係出發的。

林同志的結論幾乎否認了程度副詞“很”鑒別動詞和形容詞的性能的存在。上文已經闡明單純謂語的動詞不能被“很”等修飾，個別能修飾的還得有一定條件。可是任何形容詞作單純謂語都能被“很”修飾。例如：

- 1) 小武的聲音很響亮，很干脆。
- 2) 在抗日根據地裡，大家的生活非常艱苦。
- 3) 她很聰明，很美麗。
- 4) 他很豪爽。

因此，我們說，在動詞和形容詞同是單純謂語的情況下，程度副詞“很”可以很容易地把它們鑒別出來。請看：

一式：名（代）+ × + 動 他很走。

二式：名（代）+ ○ + 形 他很美麗。

（下轉545頁）

略論語言學史的幾個問題

——評岑麒祥《語言學史概要》

黃心平

一

我國對於語言學史的系统研究，目前還剛剛開始，特別是在應用馬克思主義語言學觀點來正確地估計古今中外各種語言學派的成就方面，可以說還沒有做過什麼工作。因此，最近出版的岑麒祥先生編著的《語言學史概要》一書就不能不引起讀者極大的注意，並寄以這樣一些希望：

1) 作為我國自己編著的第一部語言學史，讀者希望對我國歷史悠久、材料豐富而且成績輝煌的語言學研究能夠有較為詳細的介紹和正確的評價。

2) 作為1958年7月、正當黨對學術界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時候出版的語言學史，希望對語言學史上兩條路線的鬥爭能夠清楚地介紹，並且對那些主要的資產階級語言學派的觀點予以明確而有力的批判。

3) 希望本書厚今薄古，能更多地介紹近代和現代的語言學的情況，特別是目前我國、蘇聯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語言學研究情況。

這些希望可以說是起碼的。但是，當我們抱著這樣的希望從頭到尾地翻閱了這部著作之後，卻大大地失望了。在它裡面，我們所看到的僅僅是一堆西洋的（還不能說是“外國的”）資產階級語言學史和一些極為零碎、片面的我國與蘇聯的語言學史料的極不調和的混合物。從它裡面，我們看不到語言學發展過程中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看不到對資產階級語言學說的強有力的批判，看不到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成长，更看不到我國語言學，特別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成长。我們得到的主要是關於西歐資產階級語言學的一些模糊的觀念。

或許有人不同意這樣的評價，我們還是從幾個具體的問題來討論吧。

二

象其他社會科學一樣，語言學的發展史實質上也是一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鬥爭的歷史。因此，在科學的語言學史上就形成了兩條路線的鬥爭。例如，我國古代有“名”與“實”的討論，古希臘有“詞”與“物”的

討論。語言與其所依存的社会以及作為社会成員的個人的關係是怎樣的？語言與其所反映的客觀事物的關係是怎樣的？語言和與其有密切聯繫的思維的關係是怎樣的？語言是如何產生和發展的？通過這些重大問題的討論而形成的各種學派，便構成了語言學史的主要內容。

不管是中世紀的唯名論者和唯實論者的爭論，還是近代各種語言學派的爭論，都清楚地說明上面說的這一事實。而科學的語言學，即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也是在這爭論中逐漸地成長起來的。因此，闡明語言學在歷史上兩條路線的鬥爭，揭開語言學史上各種形形色色的流派的真實面目，說明唯物主義語言學的產生、發展和成長的過程，就成為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史的首要的、也是基本的任務。

但是遺憾得很，在《語言學史概要》一書中，我們自始至終找不到這兩條路線鬥爭的明顯的錢索。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不厭其煩地介紹了各種資產階級語言學說，卻很少分析批判，或者只是加了一些不得要領的按語，叫人看不清這些學派的真實面貌。例如，作者在介紹了十八世紀法國感覺論哲學家韋迪雅克（Condillac, 1715—1780）關於語言起源的感嘆說之後，僅僅從單純的語言觀點來批評這一理論的矛盾，說：“可是表示情感的聲音只能成為一些感嘆詞，它們與語言的其他表示思想概念的詞有很大的差別，感嘆詞怎樣能變成語言的其他詞是很難加以解釋的”（88頁）。①而對這種學說的唯心主義的荒謬性，卻只字未提。事實上，韋迪雅克關於語言起源的感嘆說完全是建立在他對社會關係的唯心主義理論的基礎上的。在對社會的理解上，他認為“人們追求最大限度享受的意願在社會生活中起着決定作用”，②因而在語言起源的問題上他就認為語言產生於“一個人因為需要一樣東西得不到而感到痛苦，就不能自制地發出叫聲來”（87頁）。這種觀點顯然是極端個人主義的、唯心的。它完全否認

① 本文凡引用《語言學史概要》一書原文，只注明頁數，不注書名。

② 見羅森塔爾、尤金合編《簡明哲學辭典》，中譯本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46頁。

了劳动在语言起源中的作用和语言的社会本质，和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起源于社会劳动的学说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再说，龔迪雅克的这种理论和他同时代的启蒙运动者盧梭(1712—1778)关于语言起源的社会契约说也是对立的。当然，盧梭的社会契约说并不是唯物主义的，而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注意到了语言的社会性质，这是他进步的社会观点的反映。在这些方面，岑麒祥先生都没有加以必要的说明和批判。

更严重的是作者非但对某些资产阶级语言学家的唯心主义观点没有批判，而且用一些评语来为其吹嘘。例如在“穆勒的自然主义观点”一节中，作者介绍了穆勒的观点之后，紧接着评论道：

穆勒的这些说话当时曾引起了许多人的争论，尤以美国语言学家輝特尼(W. D. Whitney)反对得最力。他为了回答这些不同的意见，曾于1875年写成《德国工厂杂谈》一书，仍坚持语言学是自然科学……

尽管这样，穆勒的这本著作因为取材新颖，文笔生动活泼，很受读者欢迎，因此他的这个把语言看作一种有机体的观念一直在西方语言学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虽在他的反对者輝特尼的《语言的生命和生长》一书中也或多或少可以找到一些同样的论调。(第246页，我的着重点——笔者)

读了这段评语，我们不禁要问：1)輝特尼是根据什么样的观点来反对穆勒的自然主义呢？2)作者说穆勒的著作“很受读者欢迎”，到底是那些读者呢？3)穆勒的学说所以“一直在西方语言学界得到广泛的传播”，难道是因为它“取材新颖，文笔生动活泼，很受读者欢迎”吗？4)我们对于穆勒的学说，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呢？难道也应该“欢迎”吗？可是，除了上面的评语之外，在这一节中我们找不到作者对穆勒的其他任何评论，因此，从这仅有的评论中，我们就不难看到作者对穆勒的唯心主义理论是如何地偏爱了。

本书中类似这样的评论是屡见不鲜的。这里限于篇幅，我们不一一加以列举了。

其次，作者对语言学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忽视和歪曲还表现在过分重视方法论的发展，把方法论和作为它的理论指导的观点割裂开来，忽略了观点对于方法的决定作用。这样，就容易使读者产生一种印象，仿佛在方法论上，任何学派的成就和贡献都是巨大的、主要的，而他们理论上的错误或缺陷则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这二者之间似乎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例如作者谈到“新语法学派”(按即一般所谓“青年语法学派”)时，从方法论出发，对这个学派所坚持的两个原则——“语音定律的无例外性”和“类推作用”，列举了许多例证来介绍，极力赞许，说是“把历史比较语言学

大大推进了一步”(125页)，“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革新”(128页)，而没有提出它的缺点，使人仿佛感到，青年语法学派方法论上的成就是无可非议的，可以完全接受。事实上，青年语法学派在方法论上所坚持的两个原则，正是由其理论上的号称“个人心理主义”或“个人生理主义”的唯心观点所决定的。他们把语言看作是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现象，用生理的先天不变性来解释语音规律；用个人的心理上的联想来解释语法现象，才得出了“语音定律的无例外性”和“类推作用”这样的原则。他们完全忽视了语言的社会性。他们的原则尽管在反对旧的观点方法以及对工作实践有一定的贡献，也决不能概括语言的一般规律，而是片面的有严重缺点的，甚至后来这一学派的德尔勃吕克也提出应该加以修正。可是岑麒祥先生却把这个学派的观点和方法割裂开来，不仅过分地肯定了方法，对于观点也没有加以应有的批判。这种片面的介绍显然是作者认为方法可以脱离甚至超越观点而独立，是非常错误的。

历史上许多普通语言学家同时都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例如洪堡特、施莱赫尔、索绪尔、勃鲁格曼等青年语法学派的语言学家，等等)，他们都以具体的语言研究为基础，在一定的哲学观点指导下建立起他们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并进而把这种理论作为研究具体语言的指导原则。因此，在叙述历史的时候把这二者截然割裂开来，和历史事实也是不相符合的。

以上所述两点，仅仅是本书中比较突出的。事实上，岑麒祥先生对语言学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的这种错误的观点和态度远不只是表现在这两方面。例如作者用了绝大部分的篇幅来详细介绍各种资产阶级语言学说，而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介绍则仅仅用了3—4页的篇幅，而且内容极其简陋。里面除了关于对馬尔的批判的介绍之外，对于苏联、我国及各人民民主国家语言学界对资产阶级语言学的斗争和批判更是只字不提(例如甚至在谈到索绪尔和结构主义的时候，也不愿提到苏联关于这一方面的讨论)，结果也就使人感到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是贫乏的、枯燥无味的。这些，除了证明作者轻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成就和当前的语言学界的斗争，在学术思想上和各种唯心主义学说有许多共同之处以外，还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三

我国是世界上从事语言研究最早的国家之一。自从公元前八世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我国曾出现过许许多多语言学家和大量的语言学著作。尽管这些语言学家并不都专门从事语言研究工作，他们的著作也不都是专门的语言学著作，但是他们解决了许多语言学上的重大问题，从而建立了我国语言学研究的优良传

統，給我們留下了丰富的科学遺產。

岑麒祥先生在本書的“序言”中也指出：語言学史應該“既包括一般語言学的历史，又包括本国語言学的历史”。這話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从整部著作来看，这方面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首先，作者对我国語言研究的成就估計得就很不全面。在談到我国的語言学时，經常只是概括地叙述一下音韵学方面的研究情况，而对于其他方面的成就，只对于上古时期的少数几部著作（《說文》、《尔雅》、《方言》以及《釋名》）有非常簡單的介紹。仿佛我国的語言研究除了音韵学的成就之外，別的方面都是空白点似的。事实上，众所周知，我国語言研究的成就在音韵、文字、訓詁（这里面包括詞彙和語法的研究）三方面是并列的，而且都有非常优良的傳統。許許多多优秀的語言学家都根据汉语的特点，*针对实用上的需要，写出了大量杰出的著作（这些著作除了岑麒祥先生提到的以外，其他的如：魏張揖的《广雅》、晋吕忱的《字林》、梁顧野王的《玉篇》、明梅膺祚的《字彙》、張自烈的《正字通》、清袁仁林的《虚字說》、刘洪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經傳釋詞》，以及集体編輯的《康熙字典》、《駢字類編》、《經籍纂詁》等等），但是岑麒祥先生却没有看到我国历史上許多語言学家密切联系实际的优良傳統，而根据西洋語言研究的体例，把这些一律貶之为不“自成系統”（326頁）的东西，甚至連提都不願提到，这种只看到洋人的“系統”，輕視祖国語言学的优良傳統及丰富遺產的錯誤态度，显然是非常有害的。

其次，即使在音韵学方面，本書作者对我国这方面的成就估計也非常不足。由于作者在叙述語言学發展史时处处以西洋的語言学为綱，因而对具有自己的特点的中国語言学就处处显得格格不入。作者在談到我国的音韵学时，仅仅是限于“客观地”叙述，而对它在世界語言史上的貢獻，則是一点都沒有提到。事实上，我国的音韵学研究不論就历史的悠久或科学的成就說，世界上都是少有的。例如，早在公元五世紀时期，我国在音韵学的研究就逐渐形成为一門独立的學問，出現了專門的著作（这里指出的是沈約[441—513]的《四声譜》），而西方不管是古印度或古希腊，語言学却一向是附屬於語法学，沒有發展成为独立的学科，①西洋有專門的語言学著作，恐怕还是很迟的事。再如对上古語音系統的研究，西洋也不过开始于十九世紀初期，而且其研究絕大部分都是附屬性的、片面的，而我国早在十世紀（宋代吳域）就开始系統的研究，并在明清时期（十六世紀以后）就获得了極其輝煌的成就。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音韵学的研究一向都严格地貫徹着一种适合于汉语語音特点的音位学原則，尽管我国过去始終沒有出現过“音位学”这一术语，这种思想却一貫清楚地

体現在古代韵部方面的研究上面（关于这一点，这里暫不加詳細的說明，希望今后能有机会来專門討論）。只要我們不以西洋的体系为科学的最高标准，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历史上語言学各方面的独特的成就。遺憾的是岑麒祥先生並沒有注意到这一点，而处处以西洋的体系为标准，对我国音韵学等方面的成就，不願給以应有的估价。这种态度，我們是不能同意的。

四

象其他学科历史一样，語言学發展的历史分期间題也是語言学史的重要問題之一。关于这个問題，岑麒祥先生在本書中沿襲某些苏联語言学家的看法，以十九世紀头廿五年为界，划分为“科学前的时期”和“科学时期”，認為只有在历史比較語言学产生之后，“真正的語言科学”才建立起来，而这以前的語言研究都仅仅是“語言科学的醞釀期”的东西（4—5頁）。

这样的分期是很不妥当的。我們并不否認十九世紀是語言学發展的一个划时代的时期，并且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的，“历史比較法虽然有其严重的缺点”，仍然“还推动着研究語言的工作”，②其貢獻是肯定的。但是把它当作“科学前的时期”和“科学时期”的分水岭，則不仅不符合于語言学历史的真实情况，并且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極其有害的。

第一，从历史的事实看，古代語言学的研究會有惊人的蓬勃的發展和巨大的貢獻。我們前面已概括地說到过我国这一方面的情况。在西方，不管是古印度、古希腊或古阿拉伯，語言的研究都有巨大成就，給后来的語言学的發展奠定了基础。古代語言学者建立起来的許多語言科学的范疇都有深远的影响，并且直到今天还为語言学界普遍应用，例如詞类、性、数、格、人称、体以及詞根詞干等等語法范疇。古代語言学家对許多語言学的基本問題的研究所得到的科学成果也都丰富了十九世紀的語言学。甚至丹麦的比較語言学家托姆辛（Vilhelm Thomsen）也不能不給这些古代語言学的成就予以極高的評價，在談到古印度的語言学时，他說：“印度語言学所达到的高度是完全絕无仅有的，歐洲的語言科学直到十九世紀也还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③把具体有这样巨大成就的語言学都一律貶为“前科学”的东西，显然和历史事实相背弃得非常利害。

第二，根据这样的分期来衡量各个不同国家的語

① 參閱 Звичинцев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до XIX века», 見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ознания XIX—XX веков» 一書, 8頁, 12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 32頁。

③ 見托姆辛《十九世紀前語言学史》, 俄文本, 10頁。

言学,特别是我国的语言学,正如岑麒祥先生所做的那样,必然也就会产生对这些语言学的成就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例如我国的语言学,自古以来一直按照自己的特点和传统发展着,直到五四以前,和西欧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直没有产生过什么联系,难道我们能因此就说:在西欧的历史比较法介绍到我国之前,我国的语言学都是“前科学”的吗?

第三,岑麒祥先生认为,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以前,所有的语言研究都“并没有把语言当作研究的真正的、唯一的对象,而只是把它当做了解古代的典籍和风俗、习惯、制度等工具”,“不是为了研究语言而研究语言的,更与历史的原则无关”(5页),因此是“前科学”的。我们认为,这种公然提倡“为了研究语言而研究语言”,反对语言学必须有一定的实践目的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完全是西方唯心主义语言学家的观点的翻版。例如所谓社会心理学派的索绪耳就说过:“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语言,我们就语言而研究语言并且为语言而研究语言”,①岑麒祥先生不正是和索绪耳唱一样的调子吗?事实上,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密切联系实践,使科学为一定的实践目的服务,是我国和其他国家古代语言学的优良传统,科学要取得成就,必须坚决发扬这一优良传统,资产阶级的科学道路,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总之,诚如苏联兹维金采夫教授所说,把语言学的历史划分为“前科学的”和“科学的”,“如果说的仅仅是关于历史比较语言学,这样的分期是正确的;然而如果说的是关于整个语言科学,那就是不正确的了。语言学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基本问题(例如语言的本质和起源问题,词类和句子成份问题,语言的符号和意义的联系问题,逻辑范畴和语法范畴的相互关系问题,等等)在悠远的古代就已被提出过。前几个世纪(特别是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中制定的许多理论原理都成为十九世纪语言学的构成要素。此外,历史比较语言学也不是独断发展的结果;它的来源仍是由印度、古希腊罗马和阿拉伯这三个科学传统构成的,每一个传统在语言科学的发展中都作出了相当的贡献”。②岑麒祥先生不考虑实际情况,照搬契科巴瓦教授的理论,并且在实践中贯彻这种理论,因而产生极大的错误。

五

以上我们仅就语言学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岑麒祥先生的著作提出自己的看法。事实上,我们认为《语言学史概要》一书的缺点远远地不只是表现在上述几个方面,譬如:

1) 本书不但如上所说,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语言学研究成就介绍得很少,甚至对将大大地影响着

语言学研究和技术方面的改进的机器翻译所引起的许多问题也只字不提。(我们以为,随着机器翻译的发展,语言学的研究正在酝酿着一场极为深刻的革命。)这种只看到西洋和过去,而看不见现实和将来的厚古薄今态度,是不应该有的。

2) 本书对其他一些国家的语言学的介绍,往往也没有注意到它们的特点和主要的成就,而是以一般的西洋的框子来衡量这些语言学。例如,阿拉伯语文学最大的特点和成就,就是在于词彙学和词典学方面。阿拉伯语文学家在搜集和研究词彙(特别是同义词)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编纂了许多世界少有的大词典(例如阿里·非鲁闾巴德的60卷大词典)。③但这些作者连提都没有提到,只简单地叙述一下阿拉伯的语法研究。这也是令人不能满意的。

3) 本书对某些专有名词的译名往往不统一,甚至在同一页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译法,令人非常不解。例如“克勒特语支”的“克勒特”(Celtica),137页—140页都用“克勒特”,244页则用“克尔特”,141页则二者兼用,要不是仔细查对,真会叫人误会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这当然不是什么大事;但也可以看出作者的态度,特别是早已有人对岑麒祥先生提出过这方面的意见,④这种情况又出现是很不应该的。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一切科学的历史都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任何科学的历史都应该阐明这一斗争的发展,从而指出它今后发展的正确方向,语言学史在这一方面决不例外。而作为我国自己编著的语言学史,除了上述的任务之外,更应该以正确的观点估计我国语言学的独特成就,指出它在世界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和今后发展的方向,这是语言学史家无可推卸的责任。岑麒祥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似乎也企图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但是由于他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非常浓厚,实际上并没完成这一任务,相反地却散布了许多错误的观点,这是我们应该反对的。

当然,作为一部拓荒性质的著作,《语言学史概要》仍然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材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有许多帮助,这是应该感谢作者的。

以上批评是否有当,欢迎读者和岑麒祥先生指正。

① 见P. A. 布达哥夫《索绪耳和索绪耳学派》,《语言学论文选译》第七辑,33页。关于对索绪耳这种观点的批判,也请参阅此文。

② 同前页注1,5页。

③ 参阅Звичинцев《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до XIX века》一文,见《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ознания XIX—XX веков》一书,17—19页。

④ 见《西方语文》,1957年第3期,353—354页。

評岑麒祥《語言學史概要》

筱 文

岑麒祥先生編著的《語言學史概要》全書共分三大部分——古代語言學史、歷史比較語言學史、普通語言學史，再加上一個導論。在導論中，作者簡單地說明了語言學史的对象、任务；語言學史的順序問題，分期問題。古代的語言學史又分為上古、中古和近古三個時期。在上古時期里，作者敘述了初民神話和宗教故事中關於語言的問題；古印度人對於語言的看法和語法分析；古代中國人對於語言文字的看法和解釋；我國秦漢時代對於語言文字的研究（介紹了《說文》《爾雅》《方言》《釋名》等著作）和古希臘、羅馬哲學家、語文學家對於語言的看法和語法分析。在中古時期里，作者敘述了我國魏晉時代音韻學的興起及其以後的發展（介紹了我國最早的一些韻書，如《切韻》《唐韻》《廣韻》《集韻》《五音集韻》《詩韻》等著作）；阿拉伯語文學中關於語法的研究和歐洲中世紀關於語言的研究。在近古時期里，作者敘述了歐洲文藝復興時代關於語言的研究；波爾洛瓦雅年唯理語法（或普通語法）學派及其方法論原則；介紹了我國元明時代北音系統韻書的興起及其以後的演變情況（介紹了《中原音韻》《洪武正韻》《韻略易通》……）；討論了我國關於古音的研究及其所存在的問題（詳細的介紹了各個學者的古韻分部情況）；敘述了十八世紀歐洲哲學家、科學家對於語言起源問題的看法。在歷史比較語言學史里，作者敘述了歷史比較法產生的前提；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產生和發展；介紹了世界各語系語言的歷史比較研究情況。在普通語言學史中，作者簡要地敘述了普通語言學建立的經過，着重地介紹了在普通語言學史上的各種學派（如自然主義學派，新語法學派，心理社會學派，結構主義學派，現代美國語言學中的機構主義、觀念主義和“語義學”學派等）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及其主要論點，也簡單地說明了這些學派在語言學上的作用、影響。同時又在這一部分里敘述了馬克思主義語言學、蘇聯語言學和中國語言學（這樣安排是不妥當的，詳見下）。全書主要是敘述、介紹性質的。

岑先生此書的出版，應該肯定，對於我國的語文工作者和我國的語言研究是有所幫助的。此書的作用及其價值在於：第一，有一定的歷史價值。“語言學史”作為語言學中的一個學科還是很年輕，到目前為止，關於這方面的研究，無論在國內或是國外，都很不深入，專門著作寥寥無幾。現在大部分大學中的中文系還沒

有能把這門課開出來，而一般的語文工作者對於這方面的知識也了解得很不夠。可是，研究任何一門科學，如果不知道它的歷史，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許多語文工作者以及大學中文系的学生都很希望得到這方面的知識。岑先生此書的出版，無疑地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讀者的需要。而且，岑先生此書在我國可以算是個創舉，這對於我國語文工作者進一步去進行語言學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這是應該肯定的。第二，語言學史的專著既寥寥無幾，別的材料也很零星，不容易找到。岑先生費了很長時間和很大精力搜集了大量材料，把它編排成集，這給大家不少方便，特別是對於外文水平不高的讀者。材料豐富可以說是本書的特點，也是優點，這些材料大都是有用的，可參考的（儘管這些材料中很多來自別的作者）。

正因為這是一個創舉，只是初步的嘗試，因此問題也比較多。在這裡我們把我們所覺察到的幾個主要問題提出來，供岑先生參考。

一、嚴重的自然主義傾向和純客觀主義的創作態度 看完了這本書後，給人印象最深的莫過於作者的嚴重的自然主義傾向和純客觀主義的創作態度。作者只是就語言學的發生發展的历史作客觀的敘述，對語言學史上的各種流派作純客觀的介紹，自己不發表一點意見，更缺乏批判的精神。這種情況幾乎貫穿全書。例如，作者既認為歷史比較法產生以前的語言研究是“前科學”時期的，歷史比較法的重要就可以想見了。那末，就應該比較詳細地講解歷史比較法的特點、作用、基本原則，等等，並給它一個合適的評價，提出它的優點和缺點。遺憾的是作者在書里對這方面談得太少了，只是作了客觀的敘述，介紹了一些材料。又例如介紹普通語言學史上的各種學派時，作者的自然主義傾向、純客觀的態度尤其明顯。只是簡略地介紹了一下某一學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的主要論點和他在語言學上的影響。對於各學派所提出的論點，作者不發表肯定或否定的意見，更沒有什麼批判評價，而只是給他們帶上一頂帽子，如“自然主義學派”，“心理社會學學派”，“唯美主義學派”，等等。因此讀者看完之後，感到眾說紛紜，如墮入五里霧中。

問題在什麼地方呢？是岑先生沒有能力去批判呢？還是岑先生根本就不想去批判呢？我們感到是後者，而不是前者。（岑先生著有《普通語言學》一書，書中

对历史比较法作了詳細討論，对語言学史上的各种流派作了批判。)因为在岑先生看来(其实不只岑先生这样看，别的同志，包括一些苏联学者在内，也这样看)，“語言学史”的任务只是講解語言研究的历史，介绍各种流派及其主要論点，用不着分析批判，認為分析批判是《普通語言学》的事。不錯，“語言学史”与“普通語言学”是有所区别的，“語言学史”着重叙述，“普通語言学”着重批判(岑著《語言学史概論》“序言”)；但只是“着重”而已，并不是“專門”。而且有一个现实問題：作者在該書“導論”中說，語言学史的任务是研究語言研究的發展过程，“正本清源”，“明辨是非”，“指出今后發展的正确方向”，可是作者有沒有考虑到象現在这样写法能不能达到“正本清源”、“明辨是非”和“指出今后發展的正确方向”的目的？我看未見得。

“語言学史”講的是語言研究的發展史，对于語言工作者是不可缺少的知識。但是我們并不是为了学“史”而学“史”。我們学习、研究“語言学史”，其目的不仅仅在于了解語言科学是怎样产生和發展起来的，在它的历史上曾有那些流派等等(当然，这些也应该知道)，而且要总结經驗，以利于当前的工作，收到鑒往知来的效果。大家知道，任何一門科学，在它的历史上总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兩面，而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正是在这两方面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因此，只有在对語言学史上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观点、方法进行徹底的分析和严正的批判，才能进一步巩固和發展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說。也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我們对唯心主义語言学的辨識和分析批判能力，从而提高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修养。

二、厚古薄今的傾向 岑先生在該書“序言”中写道，要遵守“略古詳今”这一原則，这是正确的。但是岑先生並沒有真正貫徹。从全書內容来看，很显然地对于近代和現代的語言学發展情况过于簡略，很不全面，而一些古代的东西却講得很多。例如在講到近古

时期我国音韵学的兴起时，內容繁雜，不但逐一介绍韵書，而且詳細地介绍了各家的古韵分部情况；在講历史比較語言学史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了各語系語言的历史比較研究情况。就全書而言，份量極不相称。我認為这些都可以大大精簡，而在另一方面却應該大大增加。例如关于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發展；馬克思主义的語言学說；先进的苏联語言学說，特別是斯大林的《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發表以后对于語言学的貢獻和推进語言研究的情况；我国近代和現代語言学的發展史，特別是解放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語言科学的飞速發展的情况及其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这一部分正是應該加强的部分，可是总共只有十八頁，不到全書的十八分之一。关于中国語言学仅仅占有八頁，少得可怜！是不是这一部分没有什么可写的呢？显然不是，我看这一方面可写的东西很多，这只能說是厚古薄今的表现。

三、在內容安排上的两个缺点 1)岑先生把中国語言学史根据时代的不同分別安插在世界各語言学史(严格地說，实际上只能算是印歐語的語言学史)中，結果使中国語言学史搞得支离破碎，很难給人一个比較完整的历史輪廓。而且硬塞进去的这一部分与当时其它語言的研究情况几乎毫无关系，显得非常孤立，显得很不相称。这两者如何結合起来，大家还可以討論，象現在那样不倫不类地塞在里边，是不合適的。2)岑先生把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苏联語言学、中国語言学放在普通語言学史中，作为全書的第十四章，这样安排是不合適的。这样就很容易給人造成这么一个印象：觉得馬克思主义語言学也是普通語言学中的一个学派似的(因为它以前的几章都是介绍語言学史上的各种学派)。我看不如把这一部分独立出来，再大量地充实內容。因为从全書內容看，从第十四章的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起，与以前所有的語言学可以說是划时代的不同的。而且这一部分也应该当作一个重点来講解。

(上接512頁)汉族發展并無必然关系；……”我們要問，为什么只在今天，汉语规范化才大張旗鼓地搞起来而以前不能呢？这除了从社会方面来解釋外，別無他法。“汉语自身發展的結果”这种回答实在是受不住一句反問的，譬如，为什么以前规范化的要求渺小得不能与現在相比？林同志怎样来解釋呢？

最后，再向林同志提一点意見：沒有弄懂別人的論点时，且別忙着批判。譬如，謝尔久琴柯說：“但是这些要素(指民族的要素——作者)当时还是处在萌芽状态中，至多也不过是将来在某些有利条件下可以帮助民族的形成的一种潛在因素。”

這句話是斯大林說的，^①原意很清楚，是說民族形成以前，共同語言已經存在，但这种共同語还不能算为民族語——民族的四要素之一，而只是它的萌芽状态，只是一种有可能成为民族語的一种潛在因素——也可能消亡，也可能分化为几种民族語，也可能發展成为一种民族語。这自然是很正确的。但是林同志却誤解到謝尔久琴柯說語言本身是处在萌芽状态，而大加評論。这是不應該的。

^① 參見斯大林《民族問題与列宁主义》，莫斯科中文版，1951年，8頁。

評朱星《語言學概論》

趙振鐸

朱星先生的《語言學概論》是1957年出版的。這本書寫得很不好，有許多錯誤。

作者在“序言”中說：“本編雖字數不多，但把必須知道的有關語言學概論的主要問題幾乎都提出來了。文字力求簡明扼要，不作繁瑣的鋪張和太專門的問題研究。只求講明基本道理，解決問題。”這話是正確的。但是讀完這本書後，却是另外一種感覺。它不僅沒有說明什麼基本道理，解決什麼問題，有些地方反而把人弄糊塗了。且舉出一些事實來看。

關於語言的基本職能的問題，是語言社會本質的重要問題。馬克思主義語言學說在闡明語言是人類最主要的交際工具的同時，又確定了語言的基本職能是交際職能。至於用以體現思想表達思想的表達職能，則是服從於交際職能的。因為只有語言作為交際工具，有了交際職能，才能夠有表達職能。如果語言不用來作交際工具，也就不可能體現思想表達思想，就不成其為表達思想的工具，也就沒有表達職能了。但是作者沒有採用這個論點，相反的，作者認為：“……語言是表達思維的工具”（見該書15頁，以下均只注明頁數）。并說：“契科巴瓦以為交際工具的職能比作為體現思想工具的職能重要；這是不可理解的，是不合列寧斯大林同志的精神的，也是不符合實際的。因為語言之所以為語言，就是由於它表達思維，思想，就是為了交際；作為交際工具而沒有表達思維，思想，就不是語言”（14頁）。其實作者並沒有真正了解到契科巴瓦著作的精神，也沒有提出自己的什麼論點。到底契科巴瓦的論點怎樣不合列寧斯大林同志的精神，怎樣不符合實際，作者並沒有給以應有的說明。

我們認為，按作者的說法，強調語言的表達作用，勢必得出語言只為表達思想而產生。試問離開了社會，沒有交際的需要，人們能夠有表達的需要嗎？

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書中說：

文法的特点就在于它給以詞變化的規則，不是指具體的詞，而是指沒有任何具體性的一般的詞；它給以造句的規則，不是指某種具體的句子，例如具體的主詞、具體的賓詞等，而是指一般的句子，是與某個句子的具體形式無關的。因此文法把詞和語加以抽象化，而不管它的具體的內容。^①

這是非常正確的。因為在語言的各要素中，這個特點只是語法所特有的。

但是作者的理解卻和我們不同，他認為：“語法的特征首先是它的規律是有指導意義的規範性的。因為一種發達的語言單有豐富的詞匯還不行，還須有完整的語法。語法越完整，則指導意義規範性越強，否則就不成其為語法規律了”（141頁）。事實上，我們所談的語法特征指的是語言的語法構造的特征。而作者卻把語言的語法構造和研究語法構造的規律的語法學混為一談。我們不禁要問：只有語法才有規範性和指導意義嗎？難道說語音和詞匯就沒有規範性和指導意義嗎？

作者又說：“詞類是語法分析的基本材料。因此，這種詞類屬於語法學不屬於詞匯學”（150—151頁）。但是在“語法學的基本概念”一節中對詞類問題沒有專門的敘述，而在“詞匯學的基本概念”一節反而使用了較多的筆墨來說明詞的分類（133頁）。作者說：“習慣於印歐語的詞類分析的人，總認為漢語詞無定類，萬句無類，這是一個誤會。他們以為漢語的詞沒有形態變化，就說漢語無詞類，其實漢語中全有……”（133頁）。但是在“語言的起源和發展”那一章中卻又說：“在漢語中有些詞的詞性也必在句子中才能確定，當然詞各有它的詞類，如‘飛’這一個詞，本身就是動詞的詞類，這是由於概念範疇決定的。在‘鳥在天空飛’一句中當然是動詞，但在‘飛是鳥的特長’一句中卻是名詞（名詞‘飛’是由動詞‘飛’變來，但不可說把動詞當作名詞用）。在詞本身的形態上看不出區別來。至於‘飛的鳥’一短句中是形容詞，因為‘飛的’正是形容詞的形態”（67—68頁）。把兩段話加以比較，不难看出，作者的論點是前後矛盾的。雖然，作者也注意詞的形態，但具體分析一個詞屬於哪個詞類時，卻又把概念範疇搬出來了。同時作者忽視了漢語的特點，沒有看到漢語“飛”之所以為動詞，並不只是由概念範疇來決定，而是由於它有漢語動詞的那些特征，另一方面，漢語的動詞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作主語和定語。作者的論斷實際上是贊同了詞無定類、萬句無類的理論。

書中還提到“語言”和“言語”的又一區別是：“……語言的含義較廣，包括語言和文字，言語只包括說話”（11頁）。又說“語法是我們思維更完整的活動成果”（27頁）。“漢語在效聲詞外，還有許多表德（德指性質）聲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譯本，22頁。

詞，如齒音表示細小，如細小絲碎纖等詞。舌邊音表示柔軟如柔軟懦弱等詞”(85頁，標點照旧)。這些提法都是不能使人同意的。

作者不僅對一些語言學里的基本概念弄不清楚，而且主觀臆斷，牽強附會地解釋某些問題。在“語言的產生”一節，作者從春秋時外交官的講究辭令談起，認為：“孔子教學生分四門，好似分科，其中一門是‘語言’，論語上說：‘言語：宰我，子貢’，意思是說宰我、子貢兩個人是語言科的高材生”(3頁)。其實孔門四科中只有“言語”沒有“語言”，和今天的語言研究也完全是兩回事。所謂“言語，宰我，子貢”也就是《孟子》上的“宰我、子貢善為說辭”，意思是說他兩人能說會道，並沒有語言科高材生的意思。

“詞”和“詞匯”的概念，作者一直沒有弄清楚。雖然作者也說：“詞匯(лексика〔按應該是 словарный-состав——振鐸〕)和詞(слово)兩個詞的區別是：詞是指一個詞或和句對比時的一個名稱，詞匯是某種語言詞的總合”(133頁)。但在具體使用上卻沒有注意它的區別，許多該用“詞”的地方都用成了“詞匯”。就以134頁來看，這種錯誤就有三個：

因此每個民族語言中都有大量的借詞……。且有很多詞匯已成為國際詞匯。

詞匯則選擇性更多，它還要不斷吸取地方的或國外的有用的詞匯。

各民族語言詞匯的多少，又哪類詞多或少，都由各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情況所決定。

這些例子中凡是下面有着重點的“詞匯”，都應該改為“詞”。

作者對同音詞和多義詞的概念也是不清楚的。如說：“一詞多義的，用在某一句時只能有一義。用為雙關語的，如中國古樂府詩‘子夜歌’‘見蓮不分明’‘蓮’雙關為‘憐’這是例外”(134頁)。其實“蓮”和“憐”是同音詞，不是多義詞。

作者還把漢語和朝鮮語拉上了親屬關係，像煞有介事地談它們之間的語音對應規律(63頁)。其實談到的都是朝鮮語吸收的漢語成分。漢語和朝鮮語並沒有親屬關係。

在談語言的描寫研究和歷史研究時說：“當然，語言學也研究靜態的規律，但主要任務在研究語言的動態規律也就是發展的內部規律”(3頁)。為什麼說語言學的主要任務在於研究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它和靜態規律的研究關係如何，書中都找不到答案。又如談到劃分語言和方言的問題時說：“方言的特徵，普通說來必須是互相了解的，但互相了解的特徵，又不能成為劃分語言和方言的唯一標準”(49頁)。還有什麼標準？究竟根據什麼來劃分語言和方言？作者一直沒有說出

來。這種“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筆法還可以舉出許多來。試問這樣的敘述能講明什麼基本道理？能解決什麼問題？

作者在書中還羅列現象，把語言現象作了煩瑣的分類，如談到詞匯的變化，舉了轉借革新等十類(69—70頁)。詞匯發展中產生的偏向分了“太縮的詞”“太減的詞”等八類(73—74頁)。從意義上分析詞匯把詞分為本義詞、轉義詞、單義詞、多義詞等九類，每類中又包括若干小類。這種分類在語言規律的說明上沒有必要。比方把詞分為同義詞、類義詞、異義詞、反義詞以說明詞與詞間的語義關係，可以說是多餘的。因為其中有些差別實際上並不存在。作者說同義詞是“意義完全相同的詞”(137頁)，這和一般對同義詞的理解是不同的。按一般的理解，意義完全相同的詞在語言中非常之少，一般所謂同義詞是指意義上相近而有細致差別的詞。從作者舉的例來看，“教室”和“課堂”意義和用法並不完全相同，①“土豆”和“洋白薯”也有地方色彩的差別，它是不同方言的詞，俄語 вывоз(出口)和 экспорт(出口)也不盡相同，вывоз是本族語言的詞，而 экспорт 是外來詞(源於英語 export)。由此可見，作者的同義詞和類義詞實際可以合併為一類。作者所謂“異義詞是意義不同的詞”(同上)，在說明問題時作用不大，可以略去，剩下就只有同義詞反義詞兩類了。

煩瑣的分類對於初學語言學的人有很大的害處，它不僅把讀者的精力消耗在無謂的名詞術語的記憶上，而且會引導讀者走向為分類而分類的道路，忽略了學習語言學的目的在於掌握語言基本知識以指導語言實踐。這也和作者所說的“講明基本道理，解決問題”相矛盾。

在“序言”中作者還說：“本編力求簡明扼要，且結合中國實際，中學教學實際……。”這本書是否簡明扼要呢？前面的說明已經作了回答，至於結合中國實際、中學教學實際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還是讓我們用事實來作結論吧！

這本書在“語言的社會本質”、“語言的起源和發展”、“語言的分類”等章花了相當多的篇幅來批判蘇聯馬爾的所謂“語言新學說”。這是非常不必要的。我國語言學受西歐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語言學影響比受馬爾庸俗唯物論的影響大。作者不管這一事實，大量引用契科巴瓦的著作。我們知道，契科巴瓦的《語言學概論》是根據1950年末蘇聯部頒“語言學引論教學大綱”編寫的。當時蘇聯《真理報》關於語言學問題的爭論剛結束，馬爾的理論受到了批判，在這樣的形勢下，

① 參看《語文學習》，1957年2月號44頁，“詞義辨析”。

編写教材中加入批判馬尔学說的内容是必要的,也是切合实际的。但从1953年以来,苏联展开关于“語言学引論”課程的討論,許多論文都認為批判馬尔的理論不应再占課程中很大的比重。^①1954年苏联語言学家Ф.Ф.庫茲明作总结时也肯定了这点。^②而我国1957年出版的語言学著作却还在大力批判馬尔学說,这难道不是无的放矢嗎?

作者对我国当前的語言問題,如文字改革、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話、方言調查和少数民族的語文工作等都没有給以应有的說明。在書中这些部分占的地位真是少得可怜。对当前語言科学上的新成就表現出了出奇的冷漠,而对于已經过时的理論却津津乐道,例如談汉语方言的分类还采用过去五大方言区的方法,其实早在1955年現代汉语规范問題学术會議上,罗常培、吕叔湘两先生对汉语方言已經提出了科学的分类,这是目前比較正确的分类。作者竟連这一重要的文件也沒讀过,其脱离实际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举例方面,書中有不少古汉语和外語例子。其中有些是大家所不熟悉的。这不仅增加了讀者的負担,而且給讀者造成一种印象,仿佛学語言学就非要学許多古代語言和外語不可。其实書中的那些古汉语和外語例子絕大部分可换成現代汉语。

还值得注意的是,這本書中使用的術語和中学《汉语》課本不一样,举的例子也有許多不合中学教学用的。作者說联系中学教学实际,只是一句空話。

這本書大部分是抄襲拼凑来的。有些地方抄襲的痕迹还很明显。我曾經把書的前三章作了一个小統計,这一部分共八十頁,約四万五千字。其中有引号的引文一万三千字,占四分之一强,沒有引号的引文也在一万五千字以上。这个数字不为不大。这样的輾轉抄襲,东拼西凑,对于学习語言学的人說来有多大用处呢?对于語言科学的發展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書中有关汉语方言的标音是从《全国主要方言区方音对照表》(1954年12月中华書局出版)上抄下来的。只不过把“江南話”改成“上海話”,“閩北話”改成“福州話”罢了。但是这一部分的錯誤特別多,如62頁

(上接536頁)

可以看出,程度副詞“很”可以加到形容詞前面(符号为“○”),不能加到動詞前面(符号为“×”)。至于“是”这个詞比較特殊,有人叫它“同動詞”“准動詞”,它同“很”的关系,这里不討論。

帶宾补的動詞能受程度副詞修飾的很多,而形容詞一帶上补語,一般倒是不再受程度副詞的修飾。从这一个有趣的語法事实中,我們又可歸納出两个公式:

三式:名(代)+○动+宾(补)。他很守紀律。

四式:名(代)+×形+补。她很美丽極了。×

“北”字,把广州的ㄅㄨㄟ 錯成ㄅㄨㄟ,客家的ㄅㄨㄟ 錯成ㄅㄨㄟ,“猫”字,把广州話的 ㄇㄠ 錯成ㄇㄠ,福州話的 ㄇㄠ 錯成 ㄇㄠ,等等。这一頁共十三个方言例子,竟有八个弄錯了。此外,使用注音字母把“舞”写成XX(62頁),把“江”写成 ㄐㄨㄥ (64頁),也是極不應該的。

由于抄襲拼凑,也就出現了前后不一致的現象。如叙述語音变化时把朝鮮語看成汉语的親屬語言(63頁)。但在“語言分类”一章叙述中国境內的語言时,却又把朝鮮語列入阿尔泰語族(83頁,按这部分是摘录罗常培、傅懋勛《国内少数民族語言文字的概况》的材料)。“語言与文字”一节談到文字和語言有矛盾时,使用了章氏音标(31頁)。而“語音学的基本概念”(按这一节絕大部分是从罗常培、王均的《普通語音学綱要》上抄下来的)却又使用国际音标。看来作者抄完之后,沒有仔細校对,把不同的地方統一起来,就拿去付印了。如果我的推測沒有錯,作者的写作态度是否严肃也就值得討論了。

這部書的錯字特別多,簡直象沒有經過校对的样本。有些地方一場糊塗。如把孔恩錯成孔德(1頁),阿夫洛林錯成阿夫(82頁),馬圖謝維奇錯成馬圖謝維森(168頁),最使人奇怪的是把我国語言学家傅懋勛錯成傅懋績(181頁)。在外語的例子和人名上也一样,如第5頁的 Rasmus Rask, Franz Bopp, Jakob Grimm 中的 a 全部都錯成 o, Jakob 的 b 还錯成了 l, Восток-ков 的 в 錯成 b。又如 Дialect (方言) 錯成 Дале́кт (50頁), окно (窗子) 中后一个 o 錯成 д (60頁), ити 的后一个 и 錯成 н (137頁)。不論是作者的錯誤或是排字上的錯誤,都足說明作者对出版这样一本著作的态度是不严肃的。

象这样論点錯誤,东拼西凑的著作,不仅对讀者沒有好处,而且会造成許多混乱。希望作者能够徹底檢查這本書中的錯誤,加以修正。

① 参看1953年苏联《語言学問題》斯留薩列娃、申德列斯的論文(第一期)和姆切尼克的論文(第三期)。

② 参看《語言学問題》,1954年第一期,103頁。

公式中“○”可用“很”代替,“×”則不可,这恰与一二两式相反。这个变化是由動詞和形容詞帶上宾語或补語引起的。因此,動詞和形容詞即使都有了連帶成分,程度副詞“很”等仍然沒有失去它的鑒別性能。

綜合以上所說,我們的結論是:1)動詞一般不受程度副詞的修飾,如受修飾,后面得帶上宾語或补語,但帶宾、补的動詞不一定都能被程度副詞修飾。2)程度副詞“很”等鑒別動詞和形容詞的性能,并不因為它們能修飾帶上宾語或补語的動詞而消失。

语言学名词解释(二)

北京大学语言学教研室編

15 元音的和諧

元音的和諧就是元音与元音的一种远接同化现象。这种现象是粘着語(例如烏戈尔-芬兰語系、阿尔泰語系、滿州-通古斯語系的各种語言)的語音特征之一。在粘着語里,詞的附加成分(后加成分)中的元音与詞干中的元音取得和諧,換言之,附加成分中的元音决定于詞干中的元音。如果詞干中有前元音,附加成分中也必定有前元音,如果詞干中有后元音,附加成分中也必定有后元音。否則,附加成分中的元音必須改变。事实上,这也就是元音發音部位的一种前进同化。例如在哈薩克語中,-tap 为多数名詞的詞尾,at(馬)的多数为 att-ap,但 nt(狗)的多数則为 nttep;又如匈牙利語的 ház(屋)和 kéz(手)两个詞,后面加上附加成分-ban(在…內)时,在两者中的情况就不一样,“在屋里”是 ház-ban,而“在手里”却是 kéz-ben,在后者的情形里,-ban 中的 a 因受了詞干中前元音的影响而被同化为 e。在屈折語里(如印欧語系諸語言)也有少数元音的和諧的現象,但这种同化的方向却是后退的,例如德語的 Hat(帽)→Hätte(帽,多数)、Not(需要)→Nötte(需要,多数)、Hut(草房)→Hütte(草房,多数)等就是元音和諧的遺迹。(廿)

16 声音的唇化

人类發音器官中的嘴唇,可以收斂成圓形,也可以向两旁平伸成扁形,由于嘴唇的形状能够改变,因之嘴唇也是人类發音器官中的一个共鳴器。声音的唇化普通指的都是圓唇化。圓唇化对于元音來講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元音的一种分类法:即根据嘴唇的作用可以把元音分为圓唇的和不圓唇的两类(如[y]与[i]、[ø]与[e]等)。輔音也有唇化現象,但輔音的唇化一般都是由邻音的影响所造成的,例如汉语北京話的“短”[tuan],其中[t]受了圓唇元音[u]的影响而变成了圓唇化的[tʰ]。(在国际音标中,普通我們用“w”符号放在音标的下面来表示音的唇化。)在高加索的卡巴尔达語(Кабардинский)、阿布哈斯語(Абхазский)等少数語言中,輔音的唇化也有辨义作用。(廿)

17 声音的鼻化和鼻化音

在人們發音时,空气通过鼻腔出来而产生的現象称为声音的鼻化。鼻化程度的大小,須視軟顎下垂的程度和擋住鼻腔的通道的多少而定。軟顎下垂,并且完

全擋住空气通口腔的通道,空气只能从鼻腔流出来而产生的音称为鼻音或鼻輔音或鼻閉塞音,例如[m]、[n]、[ŋ]等。实际上,这些鼻閉塞音就是口閉塞音(如[b]、[d]、[g]等)的“完全鼻化”;軟顎略为下垂但不致完全擋住空气通口腔的通道,空气可以同时从口腔和鼻腔流出,这样产生的音称为鼻化音。(在国际音标中,普通用“~”符号加在音标的上面表示音的鼻化作用。)元音和輔音都可以鼻化:比方,[ē]和[ō] (例如西安話的“奔”[pē]和廈門話白話音的“毛”[mō]等就是[e]和[o]的鼻化元音;汉口話的[i] (例如“李”[lī]和“魯”[lū]等)就是边音[l]的鼻化輔音。有时軟顎下垂得不够,致使大量的空气通过口腔出来而仅留少量的空气随后渗入鼻腔,这样产生的音,仅在音素的末尾略带鼻化,所以有人称之为半鼻化音,例如上海話的“忙”[me~]、南京話的“安”[a~]等。(廿)

18 顎化作用

顎化作用,其实也就是元音或半元音(例如前元音[i]或半元音[j])对于邻近輔音的一种同化作用。前元音[i]或半元音[j]等是舌位較高、位于上顎中部的音,發音时是舌的中部往上顎的中部靠近。由于它的舌位較高,并和上顎接触的面积較广,因之容易产生强裂的摩擦,又由于它是位于上顎的中部,所以当它与發音部位不同的輔音接触时,就容易把这些輔音的部位带到上顎的中部来,并影响它們發生摩擦或增加摩擦,結果就导致輔音的軟化或顎化。輔音的顎化現象,差不多在任何語言中都存在,不过只是有程度或性質的不同而已。比方,汉语北京話的“基”[tɕi]、“欺”[tɕʰi]、“黑”[ɕi]、“西”[ɕi],就是由中古音[kɪ-]、[kʰi-]、[xi-]、[si-]变来的;俄語中 г、к、х > ж、ч、ш 的情况(如 могу “我能” ∞ можешь “你能”, пеку “我烤” ∞ печёшь “你烤”, пахатъ “耕” ∞ пахешь “你耕”等),也是顎化产物的实例。在斯拉夫語族的各語言中(如俄語、波蘭語、捷克語等),顎化輔音(即軟輔音)和非顎化輔音(即硬輔音)有辨义的作用:例如俄語的 брат [brat] (兄弟) 和 брать [bratʲ] (拿), суда [suˈda] (法院的) 和 сюда [ɕuˈda] (到这里)等。(在国际音标中,普通我們用“j”符号加在音标的右下角以表示顎化音或軟輔音。)(廿)

19 双音节詞

双音节詞就是由两个音节构成的詞,如汉语的“鸚鵡”、“蝴蝶”、“太

阳”、“月亮”、“工人”、“农民”、“工作”、“劳动”、“诚恳”、“老实”、“刀子”、“石头”，等等。这仅是就一个词是由多少个音节构成来说的。如果就构词法来加以分析，那么一个双音节词可能是简单词，如“鸚鵡”、“蝴蝶”，等等，可能是复合词，如“工人”、“农民”，等等，也可能是派生词，如“刀子”、“石头”，等等。

古代汉语的双音节词比较少，后来由于语音的简化，许多古代非同音的词都变成了同音词，如“难”和“南”，等等。为了补救这一点，许多单音节词都变成了双音节词，如“难”变成了“困难”，“南”变成了“南方”或“南部”，等等。这也是汉语发展的倾向之一。（岑）

把一个多音节的词或词组缩写成音节比较少的词叫做缩写词，例如把“中国共产党”缩写成“中共”，把“北京大学”缩写成“北大”，把“美国帝国主义”缩写成“美帝”，等等。这种缩写词，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缩写复合词。

在采用拼音文字的言语里，有些词的缩写可以只用各该词的头一个字母，例如俄语把 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缩写成 СССР，英语把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利坚合众国）缩写成 U. S. A.，等等。现代俄语里有些词是由两个词缩写成的，如由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й союз（职工会）缩写成 профсоюз，由 коллектив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集体农庄）缩写成 колхоз，等等。这也是一种缩写复合词。

缩写词的优点是能够把一些复杂的词或词组简单化，以便利于书写。但是这些词或词组必须是比较通用的，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缩写词不能随便滥用，以免造成语言上的混乱。

拼音文字的有些缩写词在口语里可以照着缩写的形式来发音，如俄语的 СССР 和英语的 U. S. A.，等等，但是大多数需要按照原有的形式来说。（岑）

语言中发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词叫做同音词（又称同音异义词），如汉语的“词”（语言中代表一个概念能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和“词”（一种长短句押韵的文体），“杜鹃”（一种鸟名）和“杜鹃”（一种花名），俄语的 коса（镰刀），коса（辫子），коса（沙滩嘴），英语的 shore（海岸）和 shore（一种房屋的撑柱），等等。同音词的发音必须是全部相同的。有些词虽然构成的音素相同，但是声调或重音不同，就不能叫做同音词。另外有些词，虽然发音全部相同，而写法不同，如英语的 write（写）和 right（正确，权利），等等，一般也不把它们看作同音词。

同音词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由于语音演变的结果，如古代英语 langian 是“渴望”的意思，lang 是“长”的意思，现代英语里都变成了 long；有些是由外

来语借词来的，如汉语原来有一个“站”，是“久立”的意思，后来由蒙古语借来一个“站”，是“驛站”的意思，所以现代汉语里有个“站起来”的“站”，也有个“火车站”的“站”；有些是由词在发展中失去了意义上的联系而来的，如汉语的“月”是“月亮”的意思，现在也有“一年的十二分之一”的意思；有些是由构词法或词形变化来的，如俄语的 ударник 有“撞针”（一种后膛炮的击针）的意思，也有“突击队员”的意思，前者是由 удар（打击）加后缀 ник 构成的，后者是由形容词 ударный（突击的）去尾加后缀 ник 构成的。现在任何语言里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同音词。同音词虽然有不同的意义，但是用在一个句子里或借助于语言环境，还不致弄到意义不明。（岑）

词的组成要素单位叫做词素。一个词往往是由许多要素单位组织而成的，虽然它也可以只有一个单独的组成要素。比方说：汉语的“起重机”、“电气化”都是由三个组成要素单位组织而成的，“起重机”是由“起”、“重”和“机”三个要素单位组成的，“电气化”是由“电”、“气”和“化”三个要素组成的。这些组词的要素单位就叫做词素。应当指出，词素是词的组成要素的单位，不是语音形式的组成要素的单位，虽然它也要有个语音的结构，因此词素不是音素或音位，而是包含有一定意义的语言成分的单位，不过这单位或要素是构词的单位或要素罢了。比方说，汉语的“天”是由 t, i, a, n 四个语音单位组成的，但这里的 t, i, a, n 并不包含一定的意义，它们只是音素或音位，而不是词素，虽然“天”这个词是由它们组成的。从构词的角度来看，tian（天）只是一个词素，因为它只包含有一个一定的意义。词素有的时候只具有一个音位或音素，例如汉语的“明儿”的“儿”只具有一个音位 r，但它却同时是一个词素，因为包含有一定的意义单位，具有一定的语法意义。词根、前缀、后缀、词尾都是词素，因为它们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构词的要素单位。（高）

语言里用作语法工具的词，叫做虚词。虚词又称为非全义词，又称为补助词。虚词和实词是对立的术语。语言中的虚词是一种特殊的词，它具有词的形式，但却用来表示某一个实词的语法的变化，或用来表示实词与实词，甚至于句子成分与句子成分，主句与从句之间的语法联系。虚词也具有意义，但这种意义是弱化了的词彙意义，因此，有的语言学家就称它为非全义词。比方说，汉语“我跟你一块儿去”之中的“跟”是个虚词，它显然也具有意义，但这种意义是“跟随”的“跟”的词彙意义的弱化，现在就拿他来表示“我”和“你”之间的并列关系，还带有一些“我跟着你”的意味，但已不是完整的“跟随”的意思了。虚

语言学名词解释(二)

北京大学语言学教研室編

15 元音的和諧

元音的和諧就是元音与元音的一种远接同化现象。这种现象是粘着語(例如烏戈尔-芬兰語系、阿尔泰語系、滿州-通古斯語系的各種語言)的語音特征之一。在粘着語里,詞的附加成分(后加成分)中的元音与詞干中的元音取得和諧,換言之,附加成分中的元音决定于詞干中的元音。如果詞干中有前元音,附加成分中也必定有前元音,如果詞干中有后元音,附加成分中也必定有后元音。否則,附加成分中的元音必須改变。事实上,这也就是元音發音部位的一种前进同化。例如在哈薩克語中,-tap 为多数名詞的詞尾,at(馬)的多数为 att-ap,但 nt(狗)的多数則为 nttep;又如匈牙利語的 ház(屋)和 kéz(手)两个詞,后面加上附加成分-ban(在…內)时,在两者中的情况就不一样,“在屋里”是 ház-ban,而“在手里”却是 kéz-ben,在后者的情形里,-ban 中的 a 因受了詞干中前元音的影响而被同化为 e。在屈折語里(如印欧語系諸語言)也有少数元音的和諧的现象,但这种同化的方向却是后退的,例如德語的 Hat(帽)→Hätte(帽,多数)、Not(需要)→Nötte(需要,多数)、Hut(草房)→Hütte(草房,多数)等就是元音和諧的遺迹。(甘)

16 声音的唇化

人类發音器官中的嘴唇,可以收斂成圓形,也可以向两旁平伸成扁形,由于嘴唇的形状能够改变,因之嘴唇也是人类發音器官中的一个共鳴器。声音的唇化普通指的都是圓唇化。圓唇化对于元音來講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元音的一种分类法:即根据嘴唇的作用可以把元音分为圓唇的和不圓唇的两类(如[y]与[i]、[ø]与[e]等)。輔音也有唇化现象,但輔音的唇化一般都是由邻音的影响所造成的,例如汉语北京話的“短”[tʃuan],其中[t]受了圓唇元音[u]的影响而变成了圓唇化的[tʃ]。(在国际音标中,普通我們用“w”符号放在音标的下面来表示音的唇化。)在高加索的卡巴尔达語(Кабардинский)、阿布哈斯語(Абхазский)等少数語言中,輔音的唇化也有辨义作用。(甘)

17 声音的鼻化和鼻化音

在人們發音时,空气通过鼻腔出来而产生的现象称为声音的鼻化。鼻化程度的大小,須視軟顎下垂的程度和擋住鼻腔的通道的多少而定。軟顎下垂,并且完

全擋住空气通口腔的通道,空气只能从鼻腔流出来而产生的音称为鼻音或鼻輔音或鼻閉塞音,例如[m]、[n]、[ŋ]等。实际上,这些鼻閉塞音就是口閉塞音(如[b]、[d]、[g]等)的“完全鼻化”;軟顎略为下垂但不致完全擋住空气通口腔的通道,空气可以同时从口腔和鼻腔流出,这样产生的音称为鼻化音。(在国际音标中,普通用“~”符号加在音标的上面表示音的鼻化作用。)元音和輔音都可以鼻化:比方,[ē]和[ō] (例如西安話的“奔”[pē]和厦門話白話音的“毛”[mō]等就是[e]和[ə]的鼻化元音;汉口話的[i] (例如“李”[lī]和“魯”[lū]等)就是边音[l]的鼻化輔音。有时軟顎下垂得不够,致使大量的空气通过口腔出来而仅留少量的空气随后渗入鼻腔,这样产生的音,仅在音素的末尾略帶鼻化,所以有人称之为半鼻化音,例如上海話的“忙”[mɛ~]、南京話的“安”[a~]等。(甘)

18 顎化作用

顎化作用,其实也就是元音或半元音(例如前元音[i]或半元音[j])对于邻近輔音的一种同化作用。前元音[i]或半元音[j]等是舌位較高、位于上顎中部的音,發音时是舌的中部往上顎的中部靠近。由于它的舌位較高,并和上顎接触的面积較广,因之容易产生强裂的摩擦,又由于它是位于上顎的中部,所以当它与發音部位不同的輔音接触时,就容易把这些輔音的部位帶到上顎的中部来,并影响它們發生摩擦或增加摩擦,結果就导致輔音的軟化或顎化。輔音的顎化现象,差不多在任何語言中都存在,不过只是有程度或性質的不同而已。比方,汉语北京話的“基”[tɕi]、“欺”[tɕʰi]、“熙”[ɕi]、“西”[ɕi],就是由中古音[kɪ-]、[kʰi-]、[xi-]、[si-]变来的;俄語中 г,к,х>ж,ч,ш 的情况(如 могу“我能”∞можешь“你能”, пеку“我烤”∞печёшь“你烤”, пахаты“耕”∞пахешь“你耕”等),也是顎化产物的实例。在斯拉夫語族的各語言中(如俄語、波蘭語、捷克語等),顎化輔音(即軟輔音)和非顎化輔音(即硬輔音)有辨义的作用:例如俄語的 брат[brat] (兄弟)和 брать[bratʃ] (拿), суда[suˈda] (法院的)和 сюда[ɕuˈda] (到这里)等。(在国际音标中,普通我們用“j”符号加在音标的右下角以表示顎化音或軟輔音。)(甘)

19 双音节詞

双音节詞就是由两个音节构成的詞,如汉语的“鸚鵡”、“蝴蝶”、“太

阳”、“月亮”、“工人”、“农民”、“工作”、“劳动”、“诚恳”、“老实”、“刀子”、“石头”，等等。这仅是就一个词是由多少个音节构成来说的。如果就构词法来加以分析，那么一个双音节词可能是简单词，如“鸚鵡”、“蝴蝶”，等等，可能是复合词，如“工人”、“农民”，等等，也可能是派生词，如“刀子”、“石头”，等等。

古代汉语的双音节词比较少，后来由于语音的简化，许多古代非同音的词都变成了同音词，如“难”和“南”，等等。为了补救这一点，许多单音节词都变成了双音节词，如“难”变成了“困难”，“南”变成了“南方”或“南部”，等等。这也是汉语发展的倾向之一。（岑）

20 缩写词

把一个多音节的词或词组缩写成音节比较少的词叫做缩写词，例如把“中国共产党”缩写成“中共”，把“北京大学”缩写成“北大”，把“美国帝国主义”缩写成“美帝”，等等。这种缩写词，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缩写复合词。

在采用拼音文字的語言里，有些词的缩写可以只用各该词的头一个字母，例如俄语把 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缩写成 СССР，英语把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坚合众国) 缩写成 U. S. A.，等等。现代俄语里有些词是由两个词缩写成的，如由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й союз (工会) 缩写成 профсоюз，由 коллектив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集体农庄) 缩写成 колхоз，等等。这也是一种缩写复合词。

缩写词的优点是能够把一些复杂的词或词组简单化，以便利于书写。但是这些词或词组必须是比较通用的，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缩写词不能随便滥用，以免造成语言上的混乱。

拼音文字的有些缩写词在口语里可以照着缩写的形式来发音，如俄语的 СССР 和英语的 U. S. A.，等等，但是大多数需要按照原有的形式来说。（岑）

21 同音词

语言中发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词叫做同音词（又称同音异义词），如汉语的“词”（语言中代表一个概念能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和“词”（一种长短句押韵的文体），“杜鹃”（一种鸟名）和“杜鹃”（一种花名），俄语的 коса（镰刀），коса（辫子），коса（沙滩嘴），英语的 shore（海岸）和 shore（一种房屋的撑柱），等等。同音词的发音必须是全部相同的。有些词虽然构成的音素相同，但是声调或重音不同，就不能叫做同音词。另外有些词，虽然发音全部相同，而写法不同，如英语的 write（写）和 right（正确，权利），等等，一般也不把它们看作同音词。

同音词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由于语音演变的结果，如古代英语 langian 是“渴望”的意思，lang 是“长”的意思，现代英语里都变成了 long；有些是由外

来语借词来的，如汉语原来有一个“站”，是“久立”的意思，后来由蒙古语借来一个“站”，是“驿站”的意思，所以现代汉语里有个“站起来”的“站”，也有个“火车站”的“站”；有些是由词在发展中失去了意义上的联系而来的，如汉语的“月”是“月亮”的意思，现在也有“一年的十二分之一”的意思；有些是由构词法或词形变化来的，如俄语的 ударник 有“撞针”（一种后膛炮的击针）的意思，也有“突击队员”的意思，前者是由 удар（打击）加后缀 ник 构成的，后者是由形容词 ударный（突击的）去尾加后缀 ник 构成的。现在任何语言里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同音词。同音词虽然有不同的意义，但是用在一个句子里或借助于语言环境，还不致弄到意义不明。（岑）

22 词素

词的组成要素单位叫做词素。一个词往往是由许多要素单位组织而成的，虽然它也可以只有一个单独的组成要素。比方说：汉语的“起重机”、“电气化”都是由三个组成要素单位组织而成的，“起重机”是由“起”、“重”和“机”三个要素单位组成的，“电气化”是由“电”、“气”和“化”三个要素组成的。这些组词的要素单位就叫做词素。应当指出，词素是词的组成要素的单位，不是语音形式的组成要素的单位，虽然它也要有个语音的结构，因此词素不是音素或音位，而是包含有一定意义的语言成分的单位，不过这单位或要素是构词的单位或要素罢了。比方说，汉语的“天”是由 t、i、a、n 四个语音单位组成的，但这里的 t、i、a、n 并不包含一定的意义，它们只是音素或音位，而不是词素，虽然“天”这个词是由它们组成的。从构词的角度来看，tian（天）只是一个词素，因为它只包含有一个一定的意义。词素有的时候只具有一个音位或音素，例如汉语的“明儿”的“儿”只具有一个音位 r，但它却同时是一个词素，因为包含有一定的意义单位，具有一定的语法意义。词根、前缀、后缀、词尾都是词素，因为它们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构词的要素单位。（高）

23 虚词

语言里用作语法工具的词，叫做虚词。虚词又称为非全义词，又称为补助词。虚词和实词是对立的术语。语言中的虚词是一种特殊的词，它具有词的形式，但却用来表示某一个实词的语法的变化，或用来表示实词与实词，甚至于句子成分与句子成分，主句与从句之间的语法联系。虚词也具有意义，但这种意义是弱化了的词彙意义，因此，有的语言学家就称它为非全义词。比方说，汉语“我跟你一块儿去”之中的“跟”是个虚词，它显然也具有意义，但这种意义是“跟随”的“跟”的词彙意义的弱化，现在就拿他来表示“我”和“你”之间的并列关系，还带有一些“我跟着你”的意味，但已不是完整的“跟随”的意思了。虚

詞总要帮助說明某个实詞,或是某个句子成分,或是某个句子的某种語法作用,因此,又被称为“補助詞”。比方說,在漢語“我要去上海”这个句子里,“要”帮助說明“去”这个实詞的某种語法作用,因此,它是補助詞或虛詞。也正因为虛詞总要帮助表示某种語法作用,虛詞就被理解为語言中作为語法工具的詞。(高)

語言里具有独特的詞彙意义而能作为句子成分用的詞,叫做实詞。实詞是和虛詞对立的術語。語言里作为語法工具用的詞,叫做虛詞,虽然虛詞也具有弱化了了的詞彙意义,但却被用来作为表示語法作用的語态成分。語言里的实詞都具有完整的詞彙意义或完整的詞彙部分,它并且是以这种詞彙部分的作用而成为語言里的詞彙單位的。比方說,漢語的“階級”、“飞跃”、“紅”、“天”等都是实詞,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完整的詞彙意义,一个完整的詞彙部分,并且以这种詞彙部分而成为了漢語的一个詞彙單位。实詞当然也可能具有語法部分,比方說,俄語的实詞 *листва* (树叶),其中的 *-а* 是个詞尾,它是这个詞的語法部分,表明这个詞是陰性名詞。但 *-а* 不成为詞彙單位,它只是属于这个詞的一部分,而这个詞之所以能够成为詞彙單位,主要是由于它具有一个詞彙部分,它之所以成为实詞主要是由于它具有一个完整的詞彙意义或完整的詞彙部分。因为詞是語言建築材料的單位,而語言結構單位的句子是由詞組織而成的,所以,能够作为句子成分(即句子构造的材料單位)用的詞才是完整的詞,而具有完整的詞彙部分的实詞才能作为句子成分用。比方說,在漢語“北京有电视台”之中的“北京”是句子中的主語,“有”是句子中的謂語,“电视台”是句子中的謂語的賓語,它們都是句子成分,因此,都是实詞。然而,“北京和南京有高等学校”这句话里的“和”却不是任何句子成分,因此,它是虛詞。(高)

25 句子成分 句子成分是語法学的術語,属于句法的範圍。句子是由語言的建築材料在語法結構規則的支配下組織成功的。依照句子結構的語法規則,組成句子的这种材料要在句子里担負一定的結構作用,它們都构成成为句子的組成成分,簡称为句子成分。比方說,在“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这个句子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等詞都是語言的建築材料,现在就依照句子結構的語法規則把它們組織起来,于是这些詞(即語言的建築材料)就担負了某种句子組成成分的結構作用。因为語法是語言中各語言成分之間的結構方式的一般規則,作为語法学术語的句子成分不是指的这些具体的詞,而是指的这些詞在句子中所起的句子組成成分的結構作用。例如,“毛主席”在这个句子里起的是句子結構中的主語作用,因此,我們就把“毛主席”这一类在句子里具有

同样結構作用的詞,如“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之中的“共产党”,都叫做主語。主語就是一种句子成分。句子成分一共有六种:主語,謂語,定語,狀語,賓語和補語。在这些句子成分之中有的是句子的主要成分,有的是句子的次要成分。句子的主要成分是一般的句子結構所不可缺少的,句子的次要成分不是一般的句子結構所不可缺少的。除了特殊情形的獨詞句和單部句之外,一般的情形,一个句子都要有一个主語和謂語,并且句子的其他成分也都是用来限定或补充主語或謂語的,所以主語和謂語就构成成为句子的主要成分。至于主語部分(包含有主語的句子部分)和謂語部分(包含有謂語的句子部分)以外的其他的句子成分(賓語、定語、狀語和補語)則是句子的次要成分。句子成分只指句子中由实詞組成的成分,不指虛詞,因为虛詞不能单独作为句子結構的組成成分用,它只是帮助表明各句子成分的語法作用或各句子成分之間的語法关系的。比方說“我們学了語言学”之中的“了”并不是句子結構的組成成分,只是表明句子結構中的謂語“学”的某种語法作用的。(高)

詞形变化是語法学的術語,它指的是用詞的形式的变化去表示詞的各种語法作用的方法或規則。比方說,俄語的 *путь* (道路), *пути*, *пути*, *путь*, *путём*, (о) *пути* 就是陰性單數名詞 *путь* 的各种“格”的变化,同一个詞由于詞的一种形式的变化(詞尾变化)而表现出詞的語法上的“格”的不同。一般的說,詞形变化有几种情形:(一)詞根的屈折,用詞根中的元音或輔音的替換去表示不同的語法作用的变化,例如漢語的“弟”(dì)和“悌”(tì)就是用詞根的輔音的变化来表示語法上的变化的;(二)附加成分的添加,在詞根之上或在詞根前后添加表示語法作用的附加成分,使詞的形式發生变化,例如漢語的“面子”就是在詞根“面”后面加上一个后加成分或后綴“子”,使詞發生語法上的变化而构成另外一个詞的;(三)詞內的声調的变化,在詞內的某一音節上变化其声調,使其發生語法上的变化,例如漢語的“好”(hǎo)和“好”(hào)就是由于声調的不同而起的語法上的变化,构成不同的詞,一个指的是“善”,一个指的是“爱好”;(四)詞內重音的变化,在詞內某一音節上变化其重音,使其發生語法上的变化,例如漢語的“老子”(哲學家李耳的別名)和“老子”(父亲),前者在“子”上不讀輕音,后者在“子”上讀輕音,結果就起了語法上的变化。詞形变化可以是構詞法的,也可以是構形法的。構詞法的詞形变化指的是使詞由于語法上的变化而构成另外一个詞的情形,例如漢語的“弟”和“悌”就是由于詞根的輔音屈折而构成不同的詞的情形。構形法的詞形变化指的是使同一个詞保留其同一

的詞彙意義，然而却發生了語法上的變化的情形，例如俄語的 *путь* 和 *пути* 由於詞尾的變化，使同一個詞發生了“格”的變化，但詞彙的意義並不發生變化，兩者的詞彙意義都仍然是“道路”，不象漢語的“弟”和“悌”有不同的詞彙意義（一個指的是“弟弟”，一個指的是“為弟之道”）。現代的語言學家還有外部詞形變化之說，認為詞之外加上補助詞，使詞起語法變化的情形，也是一種詞形變化，不過不是詞的內部形式變化，而是詞的外部形式變化罷了。例如俄語的 *буду писать*, *будешь писать*, *будет писать*，其中的 *писать*（寫）並沒有發生形式上的變化，但在 *писать* 外面却有一個補助詞 *буду* 的不同變化（*буду*, *будешь*, *будет*）使 *писать* 這個詞的語法作用發生變化，首先把 *писать* 變成了將來時，其次變成了第一人稱將來時，第二人稱將來時，第三人稱將來時。這種用詞外的補助詞及其變化來使詞發生語法變化的情形，稱為詞的外部形式變化，也是詞形變化之一種。詞形變化又稱為形態變化，因之，詞的外部形式變化又稱外部形態變化。（高）

27 附加法

附加法又稱詞附法，附加作用，或加詞綴。它是語法手段之一，屬於詞法的範圍。在詞里，除了詞根代表基本的詞彙部分之外，其他附在詞根上面或前后的成分都叫做附加成分或詞綴。這些成分的作用在於改變詞的意義或詞的語法作用，然而卻沒有破壞詞的單位，並沒有因此而成為兩個詞。這種成分是詞的附加成分，因此稱為附加成分或詞綴，而這種語法手段就稱為附加法或詞附法或加詞綴。比方說，漢語的詞“信兒”就是在詞根“信”後面加上附加成分或詞綴“兒”而形成的的一個單位，這種附加法就使這個詞的詞彙意義起變化，它已不是指的“書信”，而是指的“消息”。“有信兒沒有？”意思就是“有消息沒有？”。附加成分或詞綴可以分為四種：前加成分或前綴，中加成分或中綴（又稱為“詞嵌”），後加成分或後綴，詞尾。附在詞根之前的叫做前綴，例如漢語“阿姨”之中的“阿”；嵌在詞根內部的叫做中加成分或中綴或詞嵌，例如印度尼西亞語 *gerigi*（鋸齒）之中的 *-er-*，即嵌在 *gigi*（牙齒）之中的中加成分；附加詞根後面的叫做後加成分或後綴，例如漢語“小人兒”之中的“兒”；能夠起屈折變化而去表示各種語法意義的變化的，附於詞的尾巴上的，叫做詞尾，例如俄語的 *супруга*（主格單數之“婦”），*супруги*（屬格單數之“婦”），*супруге*（與格單數之“婦”）之中的 *-а*, *-и*, *-е*。有的語言學家不把詞尾列入附加成分之中，而只把它看成詞的屈折。附加法可以作為構詞成分用，也可以作為構形成分用。漢語“老師”之中的“老”，俄語 *входить*（“走入”）之中的 *в-*，都是作為構詞成分用的前綴；印度尼西亞語 *pelatuk*（啄木鳥）之中的

-el- 是作為構詞成分用的中綴；漢語“瓜子”之中的“子”，俄語 *горел*（山中居民）之中的 *ел* 都是作為構詞成分用的後綴；俄語的 *написать*（完成體之“寫”）之中的 *на-* 是作為構形成分用的前綴；拉丁語 *findo*（現在時之“戰勝”）之中的 *-n-* 是作為構形成分用的中綴；俄語的 *играл*（過去時之“玩”）之中的 *-л* 是作為構形成分用的後綴；詞尾是一種特殊的後加成分或後綴，它只用作構形成分。（高）

28 內部屈折

內部屈折是語法手段之一種，屬於詞法的範圍，亦即詞的內部形態之一種。在詞內的詞根部分拿語音替換的方法來表示詞的語法變化的，叫做內部屈折。所謂“內部”指的是詞根的內部，與詞內詞根之外的地方拿語音的替換來表示詞的語法變化的“外部屈折”是對立的術語。英語名詞往往利用內部屈折表示單數和複數的區別，例如：

foot（單數之“足”）——*feet*（複數之“足”）

goose（單數之“鵝”）——*geese*（複數之“鵝”）

tooth（單數之“齒”）——*teeth*（複數之“齒”）

但廣泛應用這種語法手段的則是閃美特諸語言。閃美特諸語言中阿拉伯語的 *kataba*（他寫了），*uktud*（寫吧），*katibu*（寫的人——作家），*kitab*（寫成的東西——書）就是拿詞根 *ktb*（寫）的內部屈折去表示不同的語法意義的。內部屈折可以是元音的屈折，也可以是輔音的屈折。德語的 *Buch*（單數之“書”）——*Bücher*（複數之“書”），除了利用後綴 *-er* 之外，還利用詞根內部的元音的屈折（*u—ü*）來表示語法的變化；德語的 *du*（你自己）——*sich*（他自己）就是利用詞根內部的輔音的屈折去表示語法的變化的。（高）

29 外部屈折

外部屈折是語法手段之一種，屬於詞法的範圍，亦即詞的內部形態之一種。在詞內詞根以外的地方，拿語音的替換來表示詞的語法變化的，叫做外部屈折，與詞內詞根內部用語音替換來表示詞的語法變化的“內部屈折”是對立的術語。詞尾就是外部屈折之一種，因為它是拿語音的替換來表示詞的語法變化而居於詞根之外的語法成分。例如俄語的 *черта*, *черты*, *черте*, *черты*, *черты* *ой* (*ой*), (*о*) *перте* 之中的 *-а*, *-ы*, *-е*, *-у*, *-ой* (*ой*), *-е* 都是詞根 *черт-* 之外的語音的替換，用以表示 *черт-*（特征）這個詞彙部分的各種“格”的變化的，這種語音的替換或屈折就叫做外部屈折。（高）

本刊降低稿酬啓事

本刊響應最近出版界關於降低稿酬標準的倡議，已自十月號起，一般按原定稿酬標準降低百分之五十。

厦門大学中文系为了更好地貫徹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結合的方針，为了实现“爭取在三年內从根本上改变面貌，建成共产主义的中文系”的行动口号，全系师生倡議落戶三明——福建重工业的心臟。到三明两个月来，全体师生和民工、技工、軍工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工作，一道为鋼鐵而战，爭取早日出鋼，讓鋼水淹死美国强盜！

三明工地的建設者，来自四面八方，操着不同的方言，相当大部分人不会說普通話，交际上存在很大的困难，而群众學習文化的要求很迫切。要冲过文化关，摘掉文盲帽，学会普通話，就必须立即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文化革命高潮。工地党委和教育部門接受我們的建議，以推广汉語拼音方案为中心环节，决定开展以汉語拼音字母为扫盲工具，把扫盲、推广普通話、推广汉語拼音方案三者結合起来进行群众性扫盲运动。年底以前要扫除三明工地全部文盲，使原有文盲达到能認識两千个常用汉字，掌握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詞彙和三明建設上專用詞彙，能写家信，打下學習文化科学技术的牢固基础；年底以前，三明工地上要形成說普通話的热潮，达到人人会說普通話；年底以前，三明工地上要普及汉語拼音字母，达到大多数人能讀拼音讀物，50%能用拼音字母拼写。为了达到上述指标，語言教研組成立了文化普及委员会，具体协助这方面的工作。配合工地宣傳机构开展多样性的宣傳鼓动，协助教育部門編写“职工拼音識字課本”和教学参考書，协

厦門大学中文系 师生为工地服务

王尔康

助开办培訓班，組織教学力量。现在，培訓工作初告一段落，前后开办两期，一共培訓了四百多个學員，他們即将成为机关中推广普通話的骨干，民工、技工中的扫盲师资。第二期培訓班的教学和輔導工作由二、三、四年級負責，經過教学实践，同学加深了对方案的理解，有的說，“五天的教学收获，超过了过去上一学期的語音課”。

为了巩固广大干部、工人、本系师生學習拼音方案的成果，定期提供拼音讀物，介紹拼音知識，試驗汉語拼音文字，建立培养拼音干部的場所，語言教研組倡議出版拼音刊物。中共厦門大学中文系支部非常重視和支持这项倡議，并作出决定：刊物定名为“拼音报”，發行对象暫限三明工地的干部、工人、本系师生，考虑以后逐步扩大滿足社会需要。內容有时事綜述，工地建設报道，扫盲、推广普通話經驗介紹，本系师生在“三鋼”活动报道，文艺創作的拼写（重点放在三明工地），汉語拼音知識介紹，等等。

来到三明，我們找到了科学研究的源泉，更加認清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反对單干，強調集体，师生合作，破除迷信，青年教师在这里相当活跃。配合活动，我們將进行科学研究，写出

論文；面向政治，面向生产，搞科学研究也是为了更好地开展活动，为工地服务。比方配合上述工作，我們要搞“扫盲、推广普通話、推广汉語拼音字母經驗总结”，“汉語拼音文字实验总结”，“拼写法研究”，等等。

另外，語言教研組將繼續进行方言調查。在調查工作中，走群众路綫，改变工作方法，大量培养新生力量，使得凡是語言学專業化的学生都能具有熟練地进行方言調查的能力。結合此项工作，要搞“方言調查經驗总结”，并写出四本學話手册。

課程設置方面也是紧紧結合实际，开得少，开得好，每門課程都要讓学生掌握全面知識，打破陈規旧套。比如为了培养方言調查新生力量，在三年級先開設“方言調查与汉語方言”，使学生具有發音、辨音、記音的能力，以便从事汉語方言的調查整理工作，后講方言理論与汉語方言發生、發展、现状和趋势。四年級開設“文風問題討論”，探討目前存在的文風問題，分析文風問題的实質，研究文章的三性，研究毛主席的文風及对文風問題的指示。这門課程由教研組青年教师集体討論开出，并将深入學習毛主席的理論，特别是有关語言学的理論，結合教学，进行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写出論文。

总之，来到三明，一切还只是开端。語言教研組的同志决心在这革命的熔爐里，把自己鍛煉成为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紅在“三鋼”，專在“三鋼”，一切为了“三鋼”。

(1958, 9, 26)

每册定价人民幣 0.24 元 (訂閱刊費預付, 按季整訂)

中國語文

月刊

1958年11月号

总第77期

1958年11月22日出版

編輯者 中国語文編輯委员会
北京西城端王府夹道7号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印刷者 北京京华印書局
北京虎坊桥

总發行处 北京市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

代訂另售处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定价：三个月 0.72 元，半年 1.44 元，全年 2.88 元；寄費 1. 平郵寄費不計，2. 挂號郵費由訂戶負担。

1—16, 460 册

代号 2—44